

A BUBBLE THAT BROKE THE WORLD

压垮世界的泡沫

[美] 加雷·加勒特◎著 李思璇◎译



多角度解读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

重现华尔街信贷危机 还原金融泡沫破灭的历史真相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一生力推

20世纪轰动美国 畅销近一个世纪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目 录

[封面](#)

[版权页](#)

[笔者的话](#)

[第一章 泡沫的根源](#)

[第二章 大泡沫](#)

[第三章 拯救欧洲（大冻结）](#)

[第四章 援救德国（8月大危机）](#)

[第五章 金鸡下蛋（大冻结之后）](#)

[第六章 黄金发明](#)

[第七章 债务账簿](#)

笔者的话

本书谈到的事情大部分都在去年的《星期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出现过，尽管它们讲述起来有一些差别。本书以倒叙的形式进行叙述，以便读者能立足当前，从现在往回看。通常来说，杂志上的文章不能直接拿来成为一本书，因为书是连贯的、一体的，而文章不是；反之，正是杂志上文章的这一特性，使得一本书具有了局部的即时性价值。倘若深究这种即时性的价值所在，那就是作为一个个局部的小个体，它们都各自独立成章；对于一个大整体，即一本书，它们则是其上面的一个个零件，并且每一个都耀眼夺目，是无可厚非的热门话题，它们有的具有话题自身的特性，有些话题我们却还没有真正重视起来，事实上，这都无关形式。

加雷·加勒特1932.6.1

第一章 泡沫的根源

上帝赐予人类繁殖，而人类却发明信贷。

群体性错觉穿插在人类历史之中，并不是偶然出现的。错觉的产生因素广为人知；错觉迅速转化为“狂热”亦是因此。通常狂热呈区域性分布，就如同多年前荷兰对郁金香的狂热，抑或是如今华尔街对普通股的狂热。但是，每次产生全世界范围影响的错觉之前，都不能被人们察觉。我们对此的认识也都停留在原始粗糙的层面。

下面说的是关于信贷的错觉。从信贷的性质上来看，债权人和债务人在观念上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再看借贷关系，这里存在着长达十几年的不合理事实，债务人和债权人全都陷入同样的错觉中。事实将会证明，信贷双方的错觉，贷方的愚蠢更胜借方的挥霍。

通过下面三个相似的特征，我们试着勾勒出群体性错觉的大致轮廓。

第一个特征，依赖信贷解决债务。

世界大战后开始逐渐产生巨大的债务，并达到目前的数量级。如若没有信贷，战争持续不到四个月；而正因为有了信贷的帮助，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胜利伴随着信贷而来，同时付出代价的是惊人的债务。欧洲欠下的战争债务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美国的战争债务仅限于国内。作为唯一一个没有举债的战争参与国，美国不仅没有举债，还为欧洲盟国提供了超过 100亿美元的贷款，这与它在战争中投入的武力规模相一致。这仅仅是欧洲政府与美国财政部之间的债务，

除此之外，欧洲各国政府还互相借贷，向本国的人民举债。欧洲通过信贷来处理国内外的债务。它请求美国出借巨大数额的私人信贷——这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声称除非美国的信贷为它提供摆脱债务负担的方式，不然它将无法还债。

结果是，欧洲欠美国的私人债务的重负比其原先的战争债务还要大；而加上利息，如今的战债比和平协议签订时的数额更大。这不仅限于欧洲。战争结束后，债务是整个世界的经济恐惧点。如何偿还成了一个大问题。尽管如此，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州、市、镇或者区，它们的债务都在战后成倍增长。这些增加额的总和是巨大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债务增加额的产生是由于这些国家通过信贷来避免偿还债务。

第二个特征，一个如今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政治学说。该学说认定的前提是人们享有对生活做出一定改善的权利。假如他们不能马上改善生活质量，即假如他们自己无力改善生活，而由于改善生活是人们的权利，那么信贷必须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为了避免让这听起来不合理，该学说的结论是假如信贷能提高生活标准——当然信贷可能在短期内达到这一目标，那么人们就能成为更好的债务人（原文误写为债权人——译者注）、更好的顾客，最终能心甘情愿地轻松还债。

结果是，西方文明世界可能有半数的政府，包括国家政府和市政府，在根据这一学说过度举债后，要么破产，要么陷入深深的困境。首先，该学说摧毁了那些原本非战债债务国的信誉、那些从战争贸易中获得巨额财富的国家的信誉，以及那些战后新建国家的信誉。如今信贷失败了，原本由信贷支撑的高生活水准也一落千丈，政界也一片阴沉。你会听到政府本身也处于危险之中。政府应该如何避免社会混乱，如何在没有信贷的帮助下存活呢？人们该如何在没有信贷的支持

下，过着被宣扬的那种权利之内的生活呢？应该让他们的生活倒退吗？他们不会倒退，他们会率先奋起反抗。于是标示情感立场的辞藻出现了。这些辞藻并没有说人们拒绝偿还大肆消耗的信贷。当他们依靠信贷过着难以维系的生活时，债务让他们深陷囹圄。假如他们自己省钱支付债务，那就标志着生活要倒退一些。假如他们拒绝偿还，那么他们的信誉就将终结。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甚至连债权人都被建议说，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提供更多的信贷、更多的债务。

第三个特征，认为繁荣是信贷的产物。然而自有经济学说以来，人们就认为繁荣是由财富的增加及交换带来的，而信贷只是它的产物。

这种颠倒的思维是产生错觉的根本原因，它使整个错觉变得合理。其最惊人的虚拟成功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普遍认为逐步增加信贷可以扩充国际贸易，并以此来解决国际债务。所有的债务国都要获得有利的贸易平衡来偿还外债。

对一个国家来讲，有利的国际贸易平衡源于出口大于进口。但每个国家都拥有有利的贸易平衡，都是向他国多出口、少进口，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那么如何实现这一不可能的目标呢？依靠信贷销售。通过给予对方信贷来销售各自的产品。当然，所有的国家不可能同等出借，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其自身实力放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是主要的债权国。事实上，它的确是。

由于美国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名，每年提供给欧洲国家的信贷达10亿美元以上，引起了人们不解，他们不禁要问：“你为顾客提供贷款，然后让它们来购买你的产品，这种贸易的方式，你的利润是从哪里产生的？”

答案是：“假如我们不借钱给它们，那么它们就无力购买我们的产品，而我们过剩的产品该怎么处理呢？”

而事实是，欧洲国家利用美国的巨额信贷来发展它们的工业设备的生产能力，使其提高到与我们比肩的程度，欲以此来生产大量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所以有时人们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用美国的信贷来让欧洲发展，以生产出与我们类似的过剩出口产品，难道我们提供信贷就是为了使欧洲复制我们，给自己培养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吗？”

答案是：“没错，确实如此。你必须认识到，你所谓的竞争国家同样是我们的债务国。它们还欠我们许多钱，假如我们不给它们提供信贷，来发展他们过剩的生产能力，增加世界贸易的出口，那么它们将永远无力偿还我们的债务。”

假如要说债权国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还有其他答案的话，那么有一位可以解答。那是一位杰出的德国思想家，他凭借其种族天赋，运用逻辑克服了在一个大错觉内部的所有复杂联系。他就是德国国家银行的前行长沙赫特（Schacht）博士。讨论这些问题时，他正在美国演讲。

由于相信“对外贸易中无限额的信贷会产生无止境的世界繁荣”这一观点，美国信贷被数以亿计地出借给了我们的债务人、竞争者以及顾客，同时我们开始为落后地区的人民提供一些贷款；我们为竞争者提供信贷，而他们又把贷款借给他们的顾客：我们贷款给德国，而德国为了让其产品出口到俄罗斯，包括它们生产的化工产品，又把贷款出借给了俄罗斯。那几年里，这种对外贸易上的狂热“高烧

不退”。所有代表世界繁荣的统计数据曲线疯狂上涨，像一条长蛇一般腾空而上。

结果得来的是更多的债务。世界范围内的外贸也由此崩溃，这是进入现代历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数据曲线像冬眠的长蛇一样完全俯伏在地上。在美国和欧洲，价值数以百万计的巨额信贷也冻结在被闲置起来的工业设备上。这些设备之所以被闲置，是因为其生产的产品价格里包含了工厂支付债务的利息，而这是人们所担负不起的。有些国家可能想要赖掉债务，以便让设备自由地生产，然后让自己生产的价格低廉的产品涌向世界市场，通过这一违规行为消除大部分的竞争。显然每个国家都想要这么做。因此冲动之下，所有国家都设置了高额关税壁垒，以限制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这些措施被视为本能反应。这些迹象可能预示着外贸的重组：首先，竞争性产品间的交换将会减少；其次，非竞争性产品间的交换将会增加。然而，大部分人会相信，是这种关税壁垒造成了外贸的崩溃，而不是信贷通胀，也不会认为是由于支付自身信贷债务引起的，而这种债务正是试图通过信贷创造国际出口总量大于国际进口总量，以便每个国家都能拥有有利的贸易平衡而欠下的。造成这一切的正是这种愚蠢的想法：人们只想出口，不想进口。

研究错觉发展的历史，找出它们产生的原因、成长的过程、衰老以及灭亡的历程都将是一项有意思的事。它的发源和成长可能易于寻觅，那就是战争、新发现以及事件的巧合，这三者带来了现在的局面。

透过世界战争，人们才发现了美国震惊世界的生产能力，连我们自己也为此感到惊讶。面对欧洲诸国可能会出售他们手中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形势，我们业已忘记这是多么的令人难以置信。在战争刚开始

的几个星期中，我们为欧洲诸国寻找战争资金的事感到恐慌。假如他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出售这些债券，那我们也只能买下它们。

那时，欧洲持有的美国债券总额不超过50亿美元。然而，一想到要从国外回购价值50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和债券，是那么令人恐慌，甚至一些资深的华尔街国际银行家提议美国暂停黄金支付，以防止这种状况出现。可见我们对本国的经济实力知之甚微。没有人会想到，在后面的五年中，我们除了买回欧洲持有的所有美国债券——通过提高纽约证券交易所相关债券的报价，我们还在花费250亿美元参加欧洲战争的同时，向我们的欧洲盟国出借超过100亿美元的战争资金。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一切就像在田地里发现宝藏一样；而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自我揭示。

造成错觉的巧合这时出现了，在欧洲战争前的数月，这是多年错误地朝着这个信贷方向发展积累后一蹴而就的——我们发明了史上最高效的信贷系统。这就是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这一体系的创建法案是在1913年12月通过的。这个体系最初构想的最惊人优势在于它首次考虑实施浮动货币，就是根据贸易和工业的需求来决定货币的升值或贬值，让商业需求来创造其专属的金融，就是构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随着它的运行，原来通过季度和周期来为商业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体系和48个相互独立的州银行体系的信贷资源，现在被投入其他目的中，应该说是不管什么目的：投资、推广、投机。

新秩序来得恰逢其时。假如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如此轻松地回收欧洲所持有的那些债券，也无法为战争贸易提供资金以及在早期为战争参与国提供私人贷款。这其中，英法的5亿美元贷款便是新秩序力量的第一次明显考验。而在新体系刚接受这数亿美元的考验时，为美国

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考验又接踵而至。政府借这笔钱既是为自己，也是为我们的欧洲盟友。

当战争结束时，美国在两个方面成了最强大的国家。显然，一是它有着无限的工业能力，一是有着世界历史上最优越的信贷系统。这些因素无疑是十分强大的；而美国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同寻常的。

我们中的少数“世界级智者”很喜欢这一主题，那就是作为世界公民的我们应该学会“用国际的眼光思考”。而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做到这一点。突然之间，在形势的推动下，没有任何预兆、没有合理升级的政策，使得没有经验的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国际主导地位。假如要定义“用国际的眼光思考”这一概念，那么理应是除了要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到其他人，因为大家都同属于一个世界。急切地接纳了这一思想的我们却做得过了火。“用国际的眼光思考”变成了不优先考虑自己，而是优先考虑世界、考虑世界大格局中的其他人以及我们要对他们负的责任。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这样思考过。假如一个国家真的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它会在不久的将来不复存在。接下来的这个错觉的第一迹象就是：哪怕采取这种他人优先的思维，只要这个国家保持理智，那么它也能长久存活下去。

受一系列互不协调因素的影响，产生了这个错觉。首先是情感因素的影响。在停战将近两年后，美国政府持续为欧洲国家提供贷款，来为它们的各种困难提供救济，甚至对以前的对手也发放贷款。政府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许多地方采用欧洲的乡镇模型。对于欧洲的复苏，我们的担忧不只体现在经济帮助这一层面上，我们还承受着情感上的焦虑。国际主义思想作为当时的政治思潮，在开明的民众中广为流传。情感上亲近欧洲的朋友们组成了许多杰出的团体，来支持取消欧洲战争债务的诉求，这是以牺牲美国纳税人利益为代价

的。其次，欧洲的直接影响也是非常有力的。“我们对欧洲复苏有着无限的道德和经济上的责任”这一思想在被推动时，只有一种旧世界的声音响起。这个声音运用所有的欧洲语言，在耳边萦绕着，有意或者无意，它宣传了一种虚假的信贷来源。就像预测到的那样，最终美国的金融业带着一种新型的学说走向世界，虽然其中的一些是不合理的，但却受到热捧，因为美国的工农业只关注自身利益。当时的工农业正陷入产品过剩的噩梦中，于是很容易相信，用美国信贷来购买美国产品是解决外贸困境的唯一方案。

农业和工业都不在意买方是怎样购买它们产品的，似乎只要有人付钱就好。最终，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些产品埋单。整个国家背负着私人投资者所背负的损失。通过出口摆脱过剩产品，这是我们渴望的，但最终这却让我们耗资巨大。

说我们只能通过放贷的方式处理过剩产品的问题，这相当于说，我们的幻想破灭了。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是为过剩产品提供信贷。

产品在满足全体人类后过剩，这种事其实根本不存在。我们确实生产出了自己吃不完的食物，或者制造出了自己用不完的汽车，但这并不是产品过剩，除非你用那种特别的、呆板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生产力的无限多样的用途是它本身具有的。假如我们需求小于当前生产力的产出，那么我们可以用多余的生产力来建造服务将来的大型公共工程，而不是继续用于制造过剩产品，然后再通过外贸卖给他国。抑或可以通过经济上的策划，把多余的生产力转化成存款储存起来，就像用水库储存水资源，来应付未来的干旱一样。转化并储存这种生产力的方式就是偿还公债，以便在将来的紧急情况中，政府能有

强大的自由借贷能力，不必为财政预算担忧。但像泄洪一样释放生产力却更为人们所接受。

我们一直为过剩的产品担忧，并且不住地为摆脱这些过剩产品提供过多的信贷，却忽略了我们国家中的那些低收入城市居民还没有足够的合适住房。虽然居民的需求巨大，可供购买这些住房的信贷却很难获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信贷随意地借给了其他国家，帮助它们去达到这个目的。这里面尤为突出的是德国，政府用信贷资金建造了模范经济住房，取代了贫民窟，或许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收益，或者说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收益，但他们就是这样做了。假如我们把这笔贷款用于同样的目的，哪怕这是赔钱的买卖，我们仍旧得到了模范公寓；假如我们用这笔贷款来建造金字塔，至少我们还有金字塔可以欣赏；假如我们把这笔贷款投入私人营利目的的项目中，即使项目亏本，债权人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使其出售项目财产来收回资本。那样，虽然我们会损失一些信贷额，但我们至少还保有其基本的部分。

提供信贷给其他国家是不同的。假如我们把信贷借给了其他国家，它们拿这笔钱来建造金字塔，那么我们就要花钱出国旅游才能看上金字塔一眼；假如我们借款给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拿这笔钱建造高楼、铁路以及发电厂，一旦这些项目亏本，或者说进展不顺利，我们根本不能派司法长官前去没收这些财产，也就无法回本。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es）在哪呢？你可能不会知道。可是我们给了米纳斯吉拉斯州1 600万美元的信贷，不幸的是，我们得知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债券如今处于违约状态中。假如得克萨斯州（Texas）的阿马里洛市（Amarillo）违约了一笔1 600万美元的美国信贷，我们至少知道这地方在哪儿。

当然，虽然我们所谓的美国的过剩信贷不断被违约，每年在海外的蒸发额达到20亿美元，这些钱借给了那些我们不了解甚至不知道的地方，有些信贷的用途也未能明确，就是在这种盲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同样的公债巨大。在国内，许多州和城市借的钱可能超出了它们的偿还能力，致使处于违约状态。同时美国的私人借贷也很疯狂，就像用在其他地方一样无度。即便如此，对于谁是你的债务人，知道和不知道仍旧有很大差别；对于他用这钱干什么，知道和不知道也是有差别的。在自己的国家，债权人可以没收债务人的财产，而他却无法在听到巴西债券违约后采取任何行动，这也是有区别的。他只能从美国银行机构收到打印单上的消息，因为银行出售债券而今成了巴西财务代理人。巴西在美国出售的许多种债券中，他可能只拥有银行家招股简介中的一只巴西债券：“巴西在美国发行2 500万美元（1922年的中央铁路电气化贷款），30年，7%，黄金债券。”现在这些债券处于违约状态，而中央铁路也未能完成电气化。这笔信贷被用在了哪里，只有巴西知道，而身处美国的银行家们却并不知晓。债券人对此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外国债券的持有者购买一只债券，肯定只是简单地信任它而没有其他方式：个人投资者怎么能凭个人能力去检查另一个国家的经济来源，然后分析其财政预算呢？又怎么能得到一家外国公司的私人账户信息，审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然后判断其在某领域的前景呢？

已故的德怀特·莫洛（Dwight W. Morrow）写过一篇美妙的论说文，就美国海外投资的科学性、惊人性、浪漫、个人投资者在信任方面的危险境地以及银行家的道德责任展开了讨论。他曾就职于摩根大通公司（J. P. Morgan and Company），是一位国际银行家，随后担任了驻墨西哥大使，后来又成为美国参议员。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

的展望国际事业的美国季刊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在这一年，我们对外的贷款超过了美国全国各地的大小借款总额）。文章发表后不久，便成为投资理论中的经典之作，不断地被那些想要为我们的行为套上一个理论或者哲学观的人所引用。在写这篇文章前，德怀特·莫洛正在一列火车上看着一份芝加哥报纸。他看着列在报纸每日债券表上的债券，表上共有128只债券，通过询问他了解到，10年前只有6只债券。于是，他写道：

“审查了这128只债券的冗长列表后，发现它们分属30个不同国家的政府，我们的自治市政府或是企业发行的债券也在其中，这些国家分布在世界各地。这个列表包括我们这半球的国家：加拿大、古巴、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包括与我们并肩作战过的国家，也包括曾敌对攻击过我们的国家：有诸如日本及荷属东印度等远东政府；还有一些相隔万里的城市，如哥本哈根、蒙得维的亚、东京、马赛等。”

“就美国海外债券投资的范围及种类我进行了探究，由此我产生了三个问题：购买了这些债券的是谁？为什么要买？购买后他们得到了什么？”

他在文章中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购买了这些债券的是谁？从所获得的数据中，他得出结论：4/5的债券购买者是小投资者，购买的数额不等，从100美元到5 000美元。关于这一点，他说道：“这些外债投资代表了投资者的储蓄。他们收入的比自己花费的要多，因此能多出一部分资金，可以借给国内或国外借贷者……我们这里谈到的投资于外国债券的投资人，并不是什么纽约、芝加哥或是波士顿的大型机构，这些人是教师、军官、乡村医生、速记员以及普通店员。”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买？“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数据中没有任何可供分析的价值……大多数投资者考虑的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是本金的安全性，其次是利息率的大小。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投资者投资后生活中少了点东西。他少了一些原本眼下可以享受的，而这样做就是为了在将来他离世时，他的家庭能有一些保障，或者可能是为他的儿女上大学提供一些保障。这类投资者想确定，他将能持续地从购买的债券中获得收入。他们既想获得大的回报，又想保持资金的安全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想在债券到期时收回本金。然而，我们得承认情感因素在影响我们的投资。确实如此。我们国家的许多人在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的成功出台后购买了德国债券，这不仅因为德国债券所具有的诱人的利息率及貌似安全的本金，还因为这些投资者感到他们正参与一个帮助欧洲复苏的优秀项目。”情感因素确实有着其合理的分量，然而莫洛先生认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还是安全。他同时发问：“假如是这样，那么投资者如何从投资安全的角度出发进而做出明智的判断呢？假如被问及这一问题，我想投资者给出的首要原因会是：他信任建议他做这项投资的银行家。这使得银行家担负着巨大的责任。”

第三个问题：购买后他们得到了什么？针对这点，他继续写道：“1924年，西部的一个城市有40人购买了一只1954年到期的债券，每个人投资100美元。这些人从这次投资中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得到了一个承诺。请注意，这个承诺是由与居住在地球另一端（指日本——译者注）的有联系的一群人做出的。此外，这只债券承诺的支付债券本金的兑现时间超过了一些许诺者的有生之年。那么，这个承诺就将由这些人的子女来兑现。而就提供这只债券的银行家和后来购买它的投资者而言，他们都依靠日本人对下一代进行征税，把债券的本金偿还给如今的这些投资者的子女。乍一看，这个想法十分惊人，尤

其当时人们都认为各国彼此间已经失去了信任。而在今天，我们却从这张中西部的报纸上看到了有128只外国证券在发行。美国人正在拿出购买商品和服务的钱投资，就是把钱的使用权转给地球另一端的那些国家。作为回报，投资者得到一个承诺。也许有人回答：只能得到一个承诺吗？也许有人会答：至少会有一个承诺……那些真正为了自己的国家建设而从美国借贷的国家，那些有民族团结感、了解国家信贷的意义和价值的国家，那些借贷数额在其偿还能力内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可能是可以偿还他们的债务的。责任再次重重地落在介绍投资项目的银行家的肩上。银行家必须放缓追逐利益的脚步，顶住名声的诱惑，放弃推荐任何一项他不看好的投资。”

两年后，水晶破裂了。四年内，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失利，蒙受的损失无法估量。

由顶尖的华尔街银行及其下属的债券销售机构向投资者推荐的那些最新拉美债券中——仅仅是拉美债券中，已经违约的债券有45只，总额达8亿美元；其他尚未违约的债券也是前途未卜。在欧洲，战争债款的偿还及赔偿已经普遍中止，德国单方面中止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亦是如此，战争债务和私人债务陷入了政治争议的大漩涡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当前或未来的投资所拥有的价值是无限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出售的德国政府债券价格是30~60美分，普鲁士州债券价格是25美分，柏林市债券价格是20美分，而匈牙利的债券价格是15~40美分，欧洲工业的许多私有债券的价格也大同小异。这些就是在随后五六年内被以90美分、95美分以及100美分卖给美国投资者的所有债券。

一个又一个国际银行家随后接受了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质询。这些银行家都承认他们先前看好这些债券，但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并未对债券做出担保，也没保证过这些债券的

合法性，所以他们不会对资金的去向负责，在此过程中购买者承担一切责任。至于美国对海外债券的疯狂抢购，这是人们自主的行为，换句话说，现在结果是私人投资者自作自受。

华尔街第二大国民银行，同时代表着世界上最能销售债券的机构的负责人，出现在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前，他说：“我们是商人。通常，在涉及债券时，我们只是商人。”

最大的一家私有国际银行的一名员工，对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说道：“我们是商人。这就是我们的职业，和所有的其他商人一样，不管他交易的是谷物、棉花还是其他。”

华尔街最大的国民银行（也是债券销售巨头）的行长接受了参议院制成品委员会的质询，当时，委员会就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的问题对银行家进行了听证。委员会询问该行长：在信贷崩溃前，银行家们对制止美国信贷的滥用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他答道：“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投机的气息，投机者想要买、买、买！从事债券的银行家和掮客满足了这种社会需求……也就是说，我认为不应该让银行家们来承担这个肆虐全国的投机狂潮的责任。我认为他们只是尝试着提供客户所想要的……我认为银行家就像杂货商一样，他只是为那些顾客们供应他们想要的东西。”

华尔街第二大国民银行的行长在华盛顿接受了两次质询——一面对同样的话题，即关于在海外债券中疯狂使用美国的信贷问题，他说道：“可以这样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公众对投资和投机的兴趣及狂热，一部分是由于外国对资金的需求以及美国民众对在那些国家进行投资的欲望引起的。而投资银行在其中仅是满足买卖双方需求的工具之一。”

在莫洛先生看来，杂货商以及银行所充当的工具都是出于自愿的原则，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需求而进行的活动，承担所有相应的结果和影响也无可厚非。其充当的更多的是信息的收集者和分享者，目的是为投资者和贷款提供尽可能多的可靠的信息。

对于信息的准确性，银行家甚至都没能担保。

在此之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已对商业银行家们的交易了解颇深。它知道华尔街是如何发明海外债券的，这些债券又是如何从华尔街转到个人投资者手上的。就如通常的贸易一般，债券交易由几部分组成，至少有三部分，一般包含四部分，每部分有相对应的参与者，分别是制造商、交易商、批发商、零售商。

首先，银行发现并首创了债券发行。比如借贷人是一个外国政府，银行以90美分的价格从这个外国政府中大量购买某一种债券。然后可能会在公开发售后的第十天来支付这些债券。然后，这家首创银行招徕了一个由另外的两三家银行共同组成的证券交易商团，并对它们说：“这债券不错，我们将以90.5美分的价格和你们分享。”这样，这个证券交易商团就以90.5美分的价格承包了这一债券的发行，这是第一个转接过程，即从制造商转到交易商的过程。接下来证券交易商团又组成一个大型批发商团体，以92美分的价格向这个批发商团体出售债券，这是第二个转接过程。批发商精通零售贸易，这是他们的本行业务。每个批发商都有全国各地债券零售商的销售明细，详细记录着每个零售商能向所在地区的银行及个人投资者卖出多少某种债券。通过信件、电话以及电报的形式，批发商以94美分的价格把新债券卖给零售商，这是第三个转接过程。然后，零售商以96.5美分的价格把这些债券卖给大众，以便零售商的利润能有2.5%，这就是债券交接过程的最后一步，即第四个转接过程。

当所有的这些步骤完成时，就要公开发售了——证券交易商团在报纸上登出这些债券的广告，同时在债券场外交易市场上提供一个比零售价略高的公开报价，比如说上面例子中的债券，可能标注96.625美分的报价。这个过程就是：债券首先被首创银行机构转给证券交易商，接下来被后者销售给批发商，然后又被批发商再散发给零售商，最后被小镇银行的行长们及莫洛先生所写的所有人购买——在数以千计的债券销售员的游说下。债券销售后，资金将经过与债券相反的路程转到华尔街——从地方或个人的投资来源开始。公开发售10天后，批发商与证券交易商结清账目，后者与始发机构结清账目，而后外国政府得到资金。债券发行的各个步骤的价格都会有浮动。假如债券的发行量小、利润大，证券交易商可能会自己同时扮演批发商的角色，直接联系零售商，这样可能就只有三个步骤，而不是四个。尽管会有这些微小的变化，但上述交易方法仍是通用的。

看吧，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交易过程中承担的唯一风险就是判断公众需求。假如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借债方拿到资金前，他们就能售出债券并且获得利润。这种完美的流程解释了所有的债券机器是以怎样的速度，在何种高压下运转的。委员会理解所有这一切。仅就国际银行家认为自己像杂货商，认为美国民众对他们的产品需求无法遏制这一观点而言，委员会可以理解华尔街的银行代表们会如此疯狂地在全世界来回奔波，不遗余力——把美国的信贷推销给外国政府、外国城市、外国公司，说服它们发行债券来满足美国人的需求的原因，可以理解曾经出现29个这样的银行代表游说同一个拉美小国在华尔街发行债券的原因，甚至可以理解美国的银行家会私下给那些可以让他有新股发行的国外达人支付大额佣金的原因，这通俗来说就是贿赂。委员会收到了一家私有银行行长对既成事实的错误的承认，他说：“的确，但这些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拉丁美洲，而是整个世界，

其中牵涉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的利益。换句话说，美国的资本积累需要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银行家们是制造这一出口的工具。他们是资本的供应商。这些银行家竞争得如此激烈，然而在事后看来，这些完全是错误的。我指的并不是道德上的错误。”

然而，那些似乎可以用来证明这些观点的简单证据反而让事情更加模糊。委员会为此十分不安。既然美国投资者有着令商业银行家满世界寻找借贷者的狂热需求，为什么银行家们还要采取密集的商业推销手段来销售他们的商品呢？面对这些证据，人们会想，这些债券很容易就能销售一空，甚至销售速度比他们出炉的速度还要快，那为何还要为外国债券做如此昂贵的广告呢？又为什么要让高收费的销售机构通过挨家挨户的游说，甚至有时还要通过广播的大吹大擂来把债券转嫁在投资者身上呢？这类问题似乎总让目睹银行家活动的人无言以对。关于上述两个问题，参议院委员会得到的最清晰的答案来自华尔街最大的银行的行长，他说：“哦，毫无疑问推销技巧和广告能促进商业繁荣；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假如产品没有销售市场，没有公众要买，那么银行家便不能从他的广告和推销术中获益。”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参与这种债券销售。除了美国政府给欧洲战争盟友的贷款外，还有令人瞠目结舌的约150亿美元美国私人信贷借给了外国——没有任何政策引导。

假如说政府确实介入对外贷款的话，那也是态度不明确的。仅有一次政府态度公开明确过，也是国务院与对外贷款扯上关系的开端。当美国财政部不再为欧洲国家提供战后直接贷款时，这些国家就把目光转向了华尔街，开始从那里大量借入私人信贷。同时它们不同意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即根据战争贷款合同上的条款，把战时应允的期票转化为长期债券。因此政府宣布，对于那些不愿遵守与美国财政部的

契约的国家，它将不赞成再对其提供私人贷款。政府禁止不了这些国家在华尔街借贷的行为，它只能表达它的不满。但是这已经足够了。随后，美国财政部迎来了所有的债务国，按照战时同意的条款处理了它们的战争债务。

从此就产生了在外债发售前提交政府过目的惯例，以此来了解政府对此有无任何政治上的反对，这个惯例一直在持续。假如没有反对意见，那么国务院会说没意见，然后债券就继续发行。即使国务院的意见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也还是保密的。当政府对一种外债的发行不表示政治上的反对时，不代表它同意了这项贷款或者是对此承担任何道德责任。银行家们清楚这一点。尽管如此，由于人们普遍知道所有的外债发行首先要提交政府，不知怎么的，人们渐渐地认为是在政府应允的情况下发行的这些债券，而事实上从未如此。

事实上，政府非正式地对华尔街要发行的用于法德对碳酸钾垄断的贷款表示过反对意见。在除银行家之外的所有人的眼里，其中缘由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大战之前，普鲁士垄断了碳酸钾，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肥料，而整个世界都要依赖德国来提供。如何在德国胜利后利用这一点统治世界，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分子精心谋划过的。但战后，法国夺回了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进而获得了阿尔萨斯的碳酸钾矿床。法德两国就此达而协议，同意联合垄断碳酸钾，瓜分世界碳酸钾市场。战争期间，美国的碳酸钾价格从40美元/吨上涨到了400美元/吨，因为我们被切断了来自德国的供应，又急需碳酸钾。而仅仅十年后，正当美国人努力发展化学技术，发展美国的本土碳酸钾来作为重要的国家资源时，要不是当时政府的反对，华尔街差一步就可能借出了2 500万美元的信贷来加强法德的垄断。

如同所有旁观者一样——那些没有利益牵扯、思想未被错觉占据的人，政府一直不安于在道威斯贷款计划后德国在华尔街的大肆借贷。首先，假如德国的海外私人债务继续扩大，那么偿还华尔街的债务就可能会与德国对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的债务清偿产生冲突，事情确实是向着所担忧的方向发展的。其次，如此无度的贷款还会把德国的整个金融结构推向破产，后来确实如此。然而，却没什么能阻止这一切发展与发生。

道威斯计划中的美国赔款支付总代理人帕克·吉尔伯特（Parker Gilbert）先生为表示公开抗议曾致函德国政府，抗议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我在前几页内容中整合如今越来越多地显示德国政府机构过度开支、过度借款的证据，以及一些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人为刺激经济和过度扩张的迹象。假如放任其发展而不加以制止，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趋势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反应及经济萧条，另外，也很可能会加深一种印象，那就是德国的行为违反了其赔偿义务所规定的。”

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华尔街对吉尔伯特先生的这一警告不予理睬。1926年11月3日，吉尔伯特先生在巴黎再次写信给美国的银行家们，他说道：“我一直对美国的银行家轻率地向公众提供德国各州的债券这一事实感到很惊讶，这是完全根据德国对《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第248条的解读来进行的。要知道，从德国各州的金融当局获得陈述德国观点的信件是很容易办到的。我轻轻松松地就能知道德国当局对签署陈述德国观点的信件是多么的愿意，但是我似乎很难理解美国银行家的行为，他们根据此类信件向大众推荐债券，而没有对协约国政府不接受德国观点这一事实做出任何暗示。事实上，协约国的观点与德国是截然相反的。”

吉尔伯特先生的观点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威廉·利斯（William Leese）的支持，他通过分析两次重大的德国贷款中美国投资者的代表权证实了这一观点。他的分析结论如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这两只债券的招股章程是非常不真实而且是具有误导性的。”他所提到的两只债券，其中一只来自汉堡市（City of Ham-burg），另一只则来自普鲁士州。

而这也改变不了什么。虽然没有对任何一笔德国贷款表示反对，但政府还是给华尔街的发行机构发了一封信。信中说：“目前我们还不能断定总代理人及转交委员会未来的行为不会影响德国借款者偿还本息……有一点政府认为你们应该进一步考虑的……是《凡尔赛和约》的第248条款。德国及其各州所有财产和收入要优先偿还赔款及其他条约支付项……本院认为，你们在采取任何行动前，要先排除投资民众所面临的这些显而易见的风险。假如不能明确地消除这些风险，那么本院相信你应该考虑你们是否完全有义务向未来的客户说明情况。”

但是，只要政府不明确表示反对，华尔街则继续发行德国债券，发行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包括德国的州、市、地区、工业、农业、港口以及任何德国机构所发的债券。此外，华尔街还往德国派遣数百名代表，以拉来各种客户，发行以美国民众为目标群体的债券。

在许多借给欧洲的贷款中，尤其是借给德国的，我们有一种表示友好的感觉。感觉是遥远的美国在用数目大得惊人的信贷回馈其贫穷的祖先所在国。无论是莫洛先生在其笔下的小投资者身上发现的这种情感游走到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思想里，还是华尔街本身需要情感上的理由，然后自然地得到了这些理由，事实是银行家们对德国有坚定的信念：的确，若考虑到德国赔偿款对他们在美国新创的德国债务的

影响，他们可能会现实地联想到众所周知的德国对赔偿的看法；但是他们想的不止这些，他们更多地考虑了赔偿对战后出生以及尚未出生的德国人的心灵和思想所造成的影响。

这一状况是由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名最杰出的银行观察家发现的。此人说：“现在德国上大学的年轻人在世界大战开始时都尚未出生。而这些年轻人现在发现不仅他们一生要支付赔款，他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也要支付，接连好几代都要为一个他们作为个人没有责任的债务承担责任。他们感到自己戴着重重的枷锁，我的感觉是他们对支付战争债务滋长着反抗情绪。”

参议员里德（Reed）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些与战争毫不相干，战时甚至都还没出生的美国人的后代要支付战争债务，而发动战争的那些人的后代却分毫不出呢？”

银行家的回答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问题本身就存在着争论。”

假如你曾让一位国际银行家回答美国是否有管理外债的政策，任何时候他都会回答有。接下来假如你问他这政策是什么，他会回答说：“我们的繁荣越来越多地依赖对外贸易，未来也将是如此。我们对外贸的投资就集中体现在美国的海外贷款上。”

然而这并不是是一种政策，它仅仅是一种理念，还是一种存在巨大谬误的理念。我们跟法国不一样，没有制定相关的国家政策，规定借给他国的信贷所应该得到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回馈；也不同于英国，没有把外债和外国合同捆绑在一起的惯例。美国基于那些隐晦的设想而

借出信贷：信贷会带来对外贸易；借款人在得到信贷后可以随意支配这笔资金。

在这方面我们的信贷确实增加了美国的出口贸易，但有人在事先想过该如何收回贷款吗？假如债务人打算用我们不需要的竞争性产品来抵扣债款，强调说他无力偿还只能如此——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那该怎么办？当我们把美国的信贷借给其他国家，提高了它们生产竞争性商品的能力时，发生这种情况是必然的。问题来了，假如我们继续对债务国的出口产品设置关税，那么我们该如何收回贷款？

但是事实上，连通过发放用美国信贷以加速我们的对外商品的销售，以此释放美国剩余资金的想法也没有得到连贯的执行。下面看一些典型的例子。

例如：一方面，美国政府把借来的信贷以低利息率出借给人民，让他们发展船业，建造船只，以此来扩大美国的船队；而另一方面，美国又把大量信贷借给德国的造船公司，这些公司用借来的钱在德国的造船厂用德国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来建造德国的船只，并以此与美国船只竞争。

例如：一方面，美国的化学科学快速发展，以实现其研究目标，使美国独立于德国的合成化学；而另一方面，美国又把信贷出借给德国染料托拉斯，加强了其在贸易或战争中的进攻能力。

假如这些不是能说明我们不应该出借美国信贷的例子，那么出借贷款对我们的外贸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美国信贷大量地借给英国-智利硝酸盐托拉斯并不能增加美国的出口量，也不能使我们研究合成化学更快地成功，以摆脱对进口含氮肥料及重要的硝酸盐化学产品的依

赖；美国发放给德国和意大利公司的信贷，让它们建造固氮工厂也是一样的道理。把4 000万美元的美国信贷借给一家外国石油公司，使其用于开发石油钻探，这并不能算作我们对外贸的投资，同样，荷属东印度为支付其流动债务而借的1.5亿美元的美国信贷也是如此。对于把大量的美国信贷借给企业巨头瑞典火柴托拉斯，人们很难解释说这种行为能帮助美国产品的海外销售。因为该托拉斯又将贷款转借给了欧洲国家的政府，以换取垄断贸易特许权。而为一个拉美共和国提供信贷使其能支付欠欧洲的军火费这一行为，肯定从中找不到一丝可以施惠于美国外贸的地方。或者看另外一个例子，为一家德国银行提供2 000万美元贷款，而其目的正如银行家们所说的，是“为德国出口企业提供资金”，难道说这一贷款会有利于美国出口贸易？纯粹是空想。

看着美国信贷大笔大笔地为扩张以及改善欧洲的农业提供资金，而美国政府却因为欧洲对美国谷物的需求下降而借钱来维护美国的小麦价格，这是多么自相矛盾啊！站在双方农业的立场上，可能可以用虚情假意或者见利忘义来描述这一情况。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并没有指导贷款的政策。假如说我们要借钱给欧洲助其发展农业，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在不对本国农民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用信贷和经济方案同比例收缩美国农业。

只有当你认为美国的工业产品需要的是更多竞争的时候，贷款给欧洲，尤其是德国，助其调整工业秩序引进美国大规模生产技术，才会让美国工业在外贸上获利。

但是在所有美国对欧洲的信贷不能惠及美国出口贸易的原因中，最惊人的是我们的债务人用我们借出的贷款来支付欠我们的债务。美国对德国的贷款使其能向协约国支付赔款；而德国的赔款使协约国能支付欠美国财政部战债的利息，基本上不用掏自己的腰包。我们是用

自己的钱来还给自己。长久以来，这种简单的结构被隐藏于精心制造的金融迷雾中，而且没人承认。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一直让其银行家观察者们面对这一点。奥拓·卡恩（Otto H. Kahn）作了一个极佳的答复，他说道：

“这一点不容置疑，假如德国没能借到钱的话，它早就无力支付赔款了。因此，从这一层面上看，说德国用借来的钱支付赔款大抵是正确的。”

而最终，为了证明德国无力支付赔款，德国政府自己公开宣布赔款都是用借来的贷款支付的，假如德国不能继续借贷，那么它将不能继续赔款。

债务也许永远无法支付；债务偿还也许无限期延长；持续加大对债务国贷款的债权国也许用自己的钱来支付自己——这就是这个信贷错觉的逻辑。

自从发生约翰·劳（John Law）主导的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后，许多带着新包装旧诡计的个人不断出现。原理非常简单，你只要有呈立方增加的债权人，然后用他们自己的钱支付他们那呈平方增加的金额就行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你就是富翁。比如说，把1条鱼切碎当诱饵能钓到3条鱼。把其中的2条切碎做诱饵能钓到8条，也就是2的立方。用其中的4条做诱饵能钓到64条，即4的立方。用其中的16条做诱饵能钓到4 096条。而用16的平方，也就是256条做诱饵能钓到16 777 216条，这是256的立方。

这一诡计的致命之处在于你不能停止运转。当新债权人加入的速度比旧债权人要求被偿付的速度慢时，泡沫就破裂了。到那时，你要

为此走进监狱，如庞氏（Ponzi）；或者选择自杀，如伊瓦·克鲁格（Ivar Kreuger）。

这一诡计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新颖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世界都卷入其中。全世界无法被投入监狱，也无法通过自杀来逃避后果。

当幻想破灭时，所有人将立即囤积钱财，所有银行将立即囤积信贷，原来的债务仍旧存在，因为它们从未被偿还。然而仅仅不久前，我们还在谈论和考虑美国有大量过剩的信贷，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出借。现在再回头看时，这听起来多么荒唐啊！其实这本来就很荒唐。

我们以前、现在以及未来长期内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足够的信贷，来完成该完成的工作，只有这些才是我们当前要做的。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必须全部更换我们的交通工具。在这方面，我们的旧资本将面临巨大损失，也将需要补充巨额新资本。我们已经明白必须建立起各能源资源间的联系，并把它们合理地整合起来，把煤炭、天然气和石油这三种碳氢化合物集中到几个巨大的池子中，使它们能相互转化生成对生活、工业以及商业来说最佳的能源形式。在这些池子里，我们也许设法毫无浪费地、更有效地分配这些能源，直到燃料、光、热以及能量可以变得和水一样廉价。我们还有许多城市需要翻新，这还远不是为了迎接未来，仅仅是为了适应美国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使郊区脱离自由膨胀的无序状态。我们要通过庞大的工程研究，把郊区融入区域规划中。

科学几乎每天创造的新材料和新方法正以此前无法想象的速度淘汰旧事物。尽管随处可见物质上的进步，但事实上，目前的科技知识以及我们的创造力都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的国家比上一代更

落后，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赶超；许多宏伟蓝图已经设计完毕，可却因为缺乏信贷而一直消沉。

第二章 大泡沫

那么，到底是谁提供了所有的这一切呢？去寻找他吧，你会再次发现这个“被遗忘的人”……“被遗忘的人”默默地辛勤奉献，支撑着他的家庭，缴纳税款，在选举中投票，资助教堂和学校，看着他的报纸，为他敬仰的政治家呐喊，然而他是这场大争夺和阵营对立中唯一一个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的人。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

拥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就能铸就金字塔，那时候的世界经济是很简单的。当然那时也有高利贷，但却没有银行体系、没有信贷，也没有为建设金字塔向投资者发行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刻印好的债券。有的只是法老的心血来潮，他对金字塔的构想以及左右劳动力的权力，还有就是足以支撑这些劳力从农业转向巨型砖瓦工程的过剩粮食。

据说，仅仅为基奥普斯（Cheops）建的一座金字塔就耗时20年，动用10万劳力。而当这座金字塔完工后，埃及可以向外界展示的这个用6亿天所完成的是一座冻结的资产。假如好好地利用这么多天的劳动的话，比如说用于住宅或者火炉石，用于服务大众的项目或者国防项目的话，那么这么多天的劳动可以大幅提高埃及人的生活水准，并且保证埃及文明有更长久和更有竞争力的生命。但是一旦这些劳动被用于建造金字塔，使法老之名永垂不朽的话，那么这些劳动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人们不能使用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也就是说，金字塔无法满足他们吃穿住和其他需求，甚至连法老都无法对它进行出售、出租或是变卖。

历史并未记载，在基奥普斯金字塔完成后这10万劳工何去何从。他们失业了？他们返回原先所从事的农业了？假如是这样的话，这就像今天的埃及突然有四五百万人从工业转到农业。

不管怎样，你可以猜想在基奥普斯金字塔竣工之后，埃及出现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没有耸人的数据，没有报纸上大跌的指数，没有证券交易所的恐慌，也没有银行破产，有的只是失业以及隐蔽的社会动乱，也许还有待救济的人群。就如同后来的每次危机一样，这场危机最终由创造不能消费的东西的那些人承受。他们的劳动被吞噬在这堆石头上。他们对这次危机至多只有朦胧的认识。他们就是那些被遗忘的人们。

这个关于金字塔的故事一直含有寓言般的真实寓意。尽管继埃及文明消失之后，许多国度也已不复存在。尽管自这个金字塔之后，世上还出现了许多以相同形式、相同手法以及相同权力构建的新奇迹，但是埃及那些被遗忘的人们所遭遇的那一幕仍重现在如今的诡计中。威廉·G·萨姆纳经典散文中的“被遗忘的人”也经历了这一劫难，原因如出一辙。

当今世界已不存在一个法老凭几句话就能动用劳工的事情了：在这个世界上，劳工是自由的，是有工资的。然而你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追求通过劳力和物质材料来为个人或集体谋利的激情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而用自私及高耗费的方式追逐这一目的会带来注定的后果，古今都一样。

每出现一位负责任的法老，然后就会出现许多不负责任的法老。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无论是大型政府或小型政府，州或市，大型私有或公有机构，它们都有着法老式的激情，都用同一种方式寻求自我

夸大。也许它们是出于贪婪，也许它们的动机有好有坏，也许是由于国与国间的敌对感，或者是为了民众的幸福。也许这样说很怪，但从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上看，动机并不重要。金字塔仍然是金字塔。当人们把太多的劳动投入金字塔或者其他在经济意义上毫无用处的金字塔时，人们每天的生活就会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劳工就如同苦力一样无助。他们不能消费自己创造的产品；由于把劳动投入金字塔中，他们没能享受同样的劳动可能带来的其他所有服务，而且他们永远都要不回这些失去的服务。就算拆毁金字塔，流失的劳动也不能失而复得。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劳动力是自由的。假如他们不愿意，谁也不能调动他们。那么他们是如何被说服投入为公共或私人谋利的项目上去浪费他们的劳动的呢？现在的我们是如何建造金字塔的呢？我们有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新方式是不了解银行业的古人们、法老们所无法了解的。这种新方式的名字叫信贷。我们的世界经济是一种金钱经济，拥有信贷就拥有了劳动力和物质材料。也许在这个经济过程中穿插着一些复杂因素，也许明显的事实会被掩盖，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事实最终都将如此。事实上，除此之外，信贷没有其他用途。

自人们有彼此之分的感觉起，借款和贷款就已存在，因此，从简单意义上来说，信贷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所知的现代信贷——或者我们自认为知道的，是一股神奇的新力量。这股力量一直在演变，一直未被驾驭。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释放信贷的力量，利用这一力量，而不是控制它抑或是理解它，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以前假如没有法老式的对劳动力和物质材料的控制，就根本不会出现私人或公共的自我扩张。而今已找不到与信贷不沾边的人了。

各种各样的自我扩张都是如此，当今世界的人类生活归功于信贷的力量。我们所有的工业现象都是由信贷引起的。当初就是因为信贷，机器才得以建造的；因为信贷，机器才有操作人员，才有原材料，才能运转；因为信贷，机器生产的产品才得以分销；因为信贷，普通家庭的分期付款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才能购买越来越多的机器生产的产品。这样，信贷的力量被积极地用于贸易的扩张上。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危险尚未被发掘，比如，突发危机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个人和团体的贪婪、公民奢侈的自私行为、国家的雄心、具有创造性和毁灭性的构想、伟大的社会目标和大谬论，甚至包括战争，对所有这些事物来说，信贷是极佳的原动力。除此之外，人们因为各种原因借助于信贷构建金字塔。这一点是很令人费解的，也是我们所要研究的。

信贷不应该用于构建金字塔。使用信贷的两个限定因素是利息和分期偿还。分期偿还还是为了付清债务，最终消除债务，或者说，就是为了让债务消亡。我们尚未提到债务。我们利用信贷所犯下的蠢事大多数是由于我们忘记信贷的背面就是债务，有多少信贷就有多少债务。也就是说，你通过信贷所拥有的劳动力和物质材料是借来的，你是一个债务人。作为债务人，你必须为所借款项支付很多年度利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偿还本金，以此让债务消亡。我们一般认为利息和分期付款只与借方和贷方有关。债权人借出这笔钱会索要借款收益，而且要保证一定时间内能收回本金。事实便是如此，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从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角度看，利息和本金偿还有着某种实用性，唯独这两者可以防止大量信贷的滥用或者过度浪费由信贷得来的劳动力。

借贷者会说：“我打算用信贷创造的这个东西是会有创造能力的。我是说它会有生产能力，会带来利润。我将用利润来支付信贷的利息；我将用利润来结束债务。我将把剩下的纯利润留为己用。”

这种描述可以用于一项钢铁工程、一个纺织厂、一条铁路、一个发电厂以及所有那些你也许想不到的事情，但他不能把这种描述用于一座金字塔。

准确地说，除了借方或贷方的私人忧虑外，利息和本金偿还的功能是限制金字塔的建设。尽管如此，人们会看到现代世界充斥着各种金字塔。当年法老用独裁权力调用劳动力和物质材料建造了一个金字塔，而今信贷筑造了成千上万座这样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与法老建造的形状不尽相同。我们现代的金字塔有着无数种形体，许多是清晰可见的；有些并不明显，因为它们有着似是而非的用途；而有的根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金字塔最具吞噬性。

假如把我们的金字塔进行分类的话，它们有哪些种类呢？最明显的是公共工程类，如用于纪念的建筑、展现城市宏伟的建筑、装饰华丽的林荫大道、体育场、娱乐中心以及公共浴室等。在这一类别中，利息和本金偿还的限制功能是松弛的。这并不是说此类建筑是有生产能力的，而是说它们能为人们带来幸福和舒心，这也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一般来说，事实的确如此。此外，还有一种声音在说：“既然人们可以通过信贷马上享受额外的幸福和舒适，为什么要等到存够钱之后呢？他们会支付债务的利息，在还款日到来时付清本金。”

但是，即便这些金字塔在这一层面上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假如因为急于拥有而做出鲁莽的行为，则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事情确实如此）；假如利用信贷一次性调动过多的劳动力建造这些金字塔的

话，那么你可以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为了支付债务利息及偿还债务本金，税收将会上涨，直到人们无力缴税。人们到时候会说，他们不能纳税的原因，首先是他们无力消费这些值得拥有却没有生产能力的事物：要么人们在建造这些事物前不知道这一点，要么他们根本不在乎。最后，他们也许会拒绝偿还债务，但是当你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时，结果都一样，因为整个社会仍旧需要其他所有的可交换的用于满足人类需求的事物。原本同样的劳动可用于生产比这些观赏和娱乐更重要的事物，而不是用于建造这些精心制作而又不合时宜的金字塔。

另一类是那些后来才变成金字塔的事物。那些使用信贷的人判断失误、把过多的信贷投入了一个特定的目标、没有诚实地使用信贷，或者是创造一种到头来没有需求的东西，导致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理性范围内可发生的现实，而是虚假的利润幻觉——而且投入的还是他人的劳动和他人的钱财，在这些情况下，原先的事物就会变成金字塔。尽管如此，被建造的事物也许非常宏伟，如大城市中最高的摩天大楼，其建筑和工程特点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人们不远千里前来，只为欣赏它的那股震撼。无论情况是否如此，建造这些事物的目的是赢利，而不是为城市增添色彩。赢利或亏损将决定每座新建筑奇迹的经济地位。假如它能赢利，那么它可以支付利息、清偿债务。或者说，假如它可以把借来的信贷归还到原来的大众信贷来源，那么它就不是一座金字塔，而是有生产能力的，是可以带来增益的。但是假如它亏损了，它的产出不足以支付利息和本金，假如确实不能达到这些标准的话，那么这东西就是金字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资本流失了。资本流失标志着劳动的流失。道理还是一样，无论究竟是谁承受了这笔损失，整个社会缺少了用钱财、人力原本可以创造的所有其他事物。

在同样的定义下，工业过度生产，超出任何对该产品的需求，那么这就标志着信贷被吞噬了。在这点上，自我扩张的精神就如同一种生物学定律一样，每个独立的机构都试图超越本国同行业的其他机构；而该国这一行业又试图超过其他国家的竞争行业，如此往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信贷，直到最后——问题到底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信贷太多。也就是说，劳动被困住了，被冻住了，被锁在全球的工业机器上了，工业产品包含其债务利息，而这一价格是人们所无法负担的。这也许是人类天赋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涉及面最广的金字塔了。

想要看清这个问题，你也许要把它置于最愚蠢的镜片下观看。例如，假设把世界上一半资本投入制鞋机器中。你每天能生产的鞋子是比所有人的脚都多许多，可是由于需要支付全世界一半资本的利息，你为鞋子设定的价格非常高，以至于没人有能力购买。答案就是所有投到过多的制鞋上的资本流失了。这可是将近全世界资本的半数啊！也许投到这笔数目的一半才是正确的投资选择。确实，资本被流失了。这些资本所代表的劳动也流失了。这些劳动原本可以创造的所有其他有用的东西也失去了，而且是永久地失去了。正如法老不能通过拆除金字塔，找回他浪费的埃及劳动一样，你也无法通过拆除机器，收回所有的劳动。

那么那些无形的金字塔又是什么呢？

疯狂的股票投机交易，如1929年那次崩溃的投机狂潮便是此类金字塔。堆砌它的石块是贪婪、大众的错觉以及狂热；它的标志便是一张张印刷出的纸票。这些纸票或是代表那些真实的事物，或是代表那些虚幻的事物，如代表那些尚未被赚取也永远无法赚取的利润。这些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一个快速转动的昙花一现的倒立金字塔会毁在其

自身的速度上。然而它以失控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吞噬了信贷，直至它的消亡。是信贷维持了它的速度。

在两年内，仅纽约证交所的掮客们借入的贷款就增加了5亿美元。这是掮客们代表投机者所借的信贷，用于每日在证券交易所中抬高那些或真实或虚幻的纸票的报价。原本这些信贷可被用于也许有产出增益的目的。这些信贷所代表的劳动和物质材料可以建设一条从纽约到

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百来英尺  宽的高速公路，接下来再建一条从芝加哥（Chicago）到墨西哥城（Mexico City）的相同的高速公路，之后还有剩余。或者假设工资是6美元一天，这些信贷代表着超过法老用于建造基奥普斯金字塔的劳工6亿天的劳动。但把这些信贷用于抬高证交所的价格并不能为这个国家带来哪怕1美元的实际财富。

你也许认为既然盈利只是虚幻的，那么亏损也肯定是不真实的；假如本国的财富得不到一点增加，那也没有减少。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第一，把信贷从所有也许有产出的用途转至无产出用途的投机中，会造成直接损失。第二，两三百万大小投机者消耗了大量的信贷。这些散发财气的人仅靠纸面上的利润借取了信贷，然后使用它。在这种微妙的过程中，虚幻的财富换取了真实的财富；而这些得到真实财富的人力在消耗之后，并没有继续创造。第三点要谈到的是巨大的损失。从金字塔顶端猛然掉落的恐慌造成所有敏感的信贷源流在恐慌中收缩。它们越收缩则越恐慌，越恐慌收缩也就越厉害，因果相互作用。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恐慌。

这仅仅是无形金字塔最戏剧化的例子。这类事物是任何需要信贷支撑的人工或被浮夸的价格结构。联邦农业委员会（Federal Farm

Board) 在农业领域构建了两座巨型金字塔，一座是关于小麦的，另一座则是关于棉花的，并称它们是稳定的。该委员会利用政府从民众那借来的信贷支撑小麦和棉花的价格。然而，小麦和棉花的价格注定要下滑，于是信贷就流失了。人们一直称“金字塔”是用于稳定作用的。为了孤注一掷地支撑价格，人们建造了数十座私人或公共的“金字塔”，资金都来源于信贷。而由于明显的原因，这些价格注定是要下滑的。

用我们出借给外国顾客的信贷扩充的外贸是一种特殊的巨型金字塔，半有形，半无形，半真半假。贸易是有形的；通过这贸易达到赢利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幻觉。我们几乎忘了我们是用自己的信贷扩充贸易的。

此外，从美国信贷资源借给外国的贷款总额达到了150亿美元这一天文数字。其中有许多被外国借贷者用于建造他们自己的金字塔，而不是扩展外贸。这里先稍微提及这个极为古怪的现象，本书后面的相关部分还会继续探讨。

这个时候也许会开始出现某种困惑。再一次，还是关于被简单视为可调动劳动力和物质材料的信贷。在这种定义下，我们可以轻易把它与可估量的事物联系起来，例如，公共建筑或过度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一类“金字塔”，因为它们只是特定的物体，代替了原本可以用同样的信贷创造的其他事物。然而，我们很难将其与同样称为金字塔的不可估量的事物联系起来，如华尔街的狂热。那么信贷是如何产生的呢？信贷最先由谁借出的呢？如何获得信贷呢？它是如何从始发者一步步到后来产生惊人后果的呢？

所有这些，事实上也许比你想象的要简单。你只要前往离你最近的银行，花半个小时坐在那儿仔细观察，你就可以了解信贷是如何从源头一步步发展的，了解最先是谁开始的，了解它是如何从源泉分散到各溪流，再流到各处，甚至流到大漩涡中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萨姆纳笔下的“被遗忘的人”。去任何银行都可以了解到这些。你只要去一家就行了。

首先，观察银行里的结构布置。沿着柜台会有一系列的小窗户，每个窗口都坐着一位传奇人物。有一个窗户的上面写着“储蓄”。相邻的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窗户上会写着“出纳”。接下来还有一个写着“贴现和收款”。在柜台尽头的一边，你会看到栏杆后面有几张椅子，上面贴着金属板，板上写着“行长”，另一张写着“副行长”，再一张写着“出纳员”。一般都是如此，除非是一家很小的银行，那样的话，出纳员会坐在一个窗户后。

接下来你要观察来银行的人，看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有些人会径直走向标有“储蓄”的窗口。这些人都会把现金存入银行获取利息。其中有个是穿工作服的。他存的是自己的工资。另一个是一位农民的妻子，她存的是卖牛奶或奶油赚来的钱。下一个是饲养家禽的男子，来储存一些利润。接下来是两三个家庭主妇，显然她们是那种经常在家家庭预算中挤出一笔钱来储蓄的人。再后来，一个铁路上的工头和一个汽修厂修理工等。每个人都从一本小书的书页中取出夹着的钱，然后把钱推入窗口；窗口内的人清点钞票，把数额记录在小本子上，接下来把小本子推回给储户。一整天都是如此循环往复。一天结束前，这个窗口收到的钱要被清点，接下来束成一捆捆扔进保险柜，然后作为“定期存款”被记入银行的大账本中。

那些走向标有“出纳”的窗口的人们与先前的有些不一样。他们代表着当地的贸易和工商业。他们的账户是经常账户，称作“支票账户”或者是“信贷平衡账户”。这些人既存现金，也存信贷；除了存款外，他们也会进行支票兑现，通常是同时进行的。例如，一个经营肩带和百叶窗工厂的男子没带任何东西，仅仅带了支票来存款；每个负债于他的人都用支票偿还他。可是他雇用了10个工人，今天恰好是工资结算日。因此，需要现金结算工资的他在自己的支票上写下了工资单的数额，接下来从柜台换取现金。但是他现在从银行取走的这些钱又会在以后经别人的手返回银行。肩带和百叶窗工厂的职工们用工资向杂货商、肉贩以及百货商店购买东西。而后三者将立即把钱带到银行，到钱的最初来源——“出纳”窗口储存。肩带和百叶窗工厂的职工们也把自己剩余的钱带到银行，在“储蓄”窗口储存。这就是货币流通。从银行取出的钱也许在一周内经过两三次存储又回到银行手上。1美元在行使其职能后又返回到银行，这一过程的速度就是货币流通速度。

最后，“出纳”窗口的职员在纸上一栏里写上他们的收款总额，在另一栏里写上支付总额，然后把二者的差额作为“活期存款”的增加额或减少额记录在银行的账本上。其中的定律是他们每天的收款会比支出要多，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储蓄额每天都会增加。正常的情况是，所有代表当地商业的人为“出纳”窗口带来的钱要多于取走的，因为他们各自的商业活动都是具有生产性的，总能带来一些增益，增益的多少则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

然后，每日的“出纳”窗口“活期存款”的增加额以及“储蓄”窗口“定期存款”的增加额将会被扔进保险柜。由此，银行积累了存款——也就是钱。它如何处理这些钱呢？银行是支付存款利息

的；因此，它必须赚回利息，而且赚的利息还必须比支付的多，不然它就无法赢利。因此银行必须借出它的存款。支付存款利息、收取贷款利息——这就是银行所有的业务。

那么你认为银行会借出总存款额的多少比例呢？你认为借出多少是安全的呢？一半？3/4或全部？实际上，连那些对这问题不以为然的内行人在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时，也会大为吃惊。难以置信的是银行借出的贷款也许是储蓄额的10倍。也就是说，银行保险柜里每存放1美元储户的钱，银行也许会借出或出售10美元信用货币。

并不是每个银行都会以金库中1美元的现金借出10美元的信贷货币；但是，假如你站在整个银行体系的角度看，它确实有推行信贷与现金10：1比例的潜在能力。美国财政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在反囤积金钱的行动中，就是采取10：1这一比例原则的。在全国的广播中，官方讯息劝说人们停止储藏，把他们的钱储存在银行，理由是在家里储藏每1美元的现金会导致国家信贷资源10倍的损失。而每1美元钱储存在银行中，标志着可以增加10美元可施惠于贸易和工商业的信贷。

所有现代社会信贷现象的开始都是由这种倍增的行为引起的，执行者是银行家。银行是如何借出高于现金储蓄10倍的信贷的呢？

也许解释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是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老金匠为他人安全保管黄金，然后给出收据。这些代表黄金的收据开始作为货币在人与人间流通。看到这些，也了解只要人们认为黄金是安全的，就很少会动黄金或者取回黄金，这个金匠开始在没有足够黄金在手的情况下，发行可兑换黄金的票据。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却是明智的或者至少它是可行的。而且假如金匠很诚实的话，那么他是有偿付能力的，因为要换取他承诺的可以随时兑换黄

金的票据，必须要给他有价值的东西，叫作担保品，以此作为抵押。这样，金匠手头上就有可以偿付票据的资产。假如人们拿票据来兑换的话，只要出售这些资产，购买黄金，然后根据先前的承诺兑换此票据，只要这些资产是容易变卖的，只要没有许多人同时来要求立刻兑换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的人会真的想要实实在在的黄金。只要他们信任金匠，他们就更愿意用他的票据达到所有的交换目的。这些票据不再代表实实在在的黄金，但是和黄金一样好，也被认为是黄金，因为每当人们想要黄金的时候，拿这个票据就可以换。现代银行业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这个流通着的票据本身变成了合法的纸币，法律和惯例要求银行储有一定量的黄金，即黄金储备，才能发行这些票据。接下来，你会发现在这个靠黄金储备支撑的合法纸币结构上，你还可以再添加一层票据——一种新的可自由流通的品种，可兑换黄金或合法纸币。这种新的自由流通票据就是众所周知的银行支票；在长期的习惯和需要中，用银行支票代替现钱的行为一直延续。此前我们9/10以上的商业交易都是用支票实现的，根本没有实际货币流动，或者几乎没有。例如，在1929年，全国各种实际货币总额为90亿美元；但是流通中的银行支票总额却是7 130亿美元，约为所有实际货币的80倍。

如今银行借出的信贷是空白支票本形式的。你可以通过填写支票来获取信贷。你可以写支票换取现金，或者提取实际货币黄金或者提取合法的纸币，可一旦你使用了提出的钱，那么钱还是会返回到银行。当你在银行借贷时，会发生什么？银行家不会递给你钱。他会在银行自己的账本中给你的账户写入一定数额的信贷，然后给你一本空白的支票簿。之后，你走出银行，开始通过写支票来获取信贷。你所写支票的接收者又把支票存入银行。当他们把你的支票存入银行时，

你为这笔钱埋单，账本上你的信贷会被相应扣除。整个过程不涉及实际货币。

假如上面最后这几段很难理解的话，可以把事情看得简单点，不要埋怨。所有那些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发现和发明中，这种完全难以置信的螺旋信贷结构是最狡诈、最有欺骗性、最难理解的，而且是除高爆炸药外最危险的东西。对此，银行家们真正了解的是它如何每天运作。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所知，就当这是潘多拉魔盒赐予的一个礼物。

但是你还没走，仍旧坐在当地的银行里。有必要的话，把以下的现象当作主观的现实：每1美元递入这些银行窗口进而留在保险柜里的实际货币，能让银行拥有6美元、8美元乃至10美元的信贷可以出借。银行到底把这信贷借给谁呢？又是如何借的呢？

你还要观察那个标有“贴现和收款”的窗口。在这个窗口交易耗时要更久些，需要签署和互换单据。来这个窗口的人都是借款人；他们来处理贷款、还清贷款，或者分期付款，或者延长期票的期限。你会看到一个当地的承包商来到这个窗口。他的票据显示他曾借过信贷以支付造一间房子所用的建材费和劳工费；房子已经建好了，他也从房子的业主手中拿到了工程款。现在，他用支票偿还了票据上的信贷金额。然后，窗口前又来了一个汽车经销商。他刚收到了一批来自底特律（Detroit）的汽车和一张付款通知单。通知单上写着“一次性付清”。为了支付这笔款，他必须来银行借取信贷；当他在社区内一辆一辆地销售汽车之后，他会偿还信贷——还是用支票。随后，窗口又来了一个录音机经销商。他允许卖家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录音机。现在，他在窗口借取信贷。有了信贷之后，他将写支票支付录音机生产商10台录音机的费用；作为这笔贷款的担保，他会递给银行自己的

期票，加上当地10个向他购买录音机的消费者的购买合同。他从买家那收到钱之后，再付清银行的债务仍旧是用支票。随后又来了一个农民。他已经销售了他的作物，现在他来偿还（还是用支票）六个月前借来的用于购买肥料和一些农场机械的信贷。

像这类借给当地居民的贷款，由于银行都私下认识所有这些借款人，因此这不仅对银行来说是最安全的贷款方式，而且是信贷使用最理想的方式。不幸的是，当地对信贷的需求还不能吸收银行全部的借贷能力。保险柜中日益增加的居民现金储蓄让银行拥有过剩的借贷能力。在“贴现和收款”窗口满足其顾客的信贷要求后，银行会怎么处理多余的信贷呢？现在，你会看到信贷是如何来自普通的当地源头，而后从这源头中溢出，开始寻找出口，前往湖泊和海湾——这就是信贷冒险的开端。

银行想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纽约市的一家银行借出部分剩余的信贷。

纽约的这家银行拿到信贷后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它也许会把信贷借给从事内贸或外贸的商人；也许会借给为投机者提供贷款的证券交易所的掮客；也许会借给欧洲的英格兰银行抑或是一家德国银行，德国银行的利息率是非常高的。想象一下美国地方信贷（来源便是你所观察到的那些储户）居然从这种单纯的来源跑到了一家德国银行的手上！事实上，确实有数亿的这种美国信贷被借给德国银行，而后在1931年信贷被困在那里，无法收回。这些德国银行表示它们无力偿还。这就是当时的还款大冻结。德国表示假如我们坚持索回信贷，那么它的银行唯有倒闭。德国建议我们“冻结”信贷，让它们作为储蓄待在德国的银行里，以此希望德国的银行在将来能够偿还。由于我们别无他法，当时也就听从了它的建议。

除此之外，当地银行还会如何处理剩余的信贷呢？它会购买一只美国政府债券，事实上就是把当地的信贷借给联邦政府。

那么联邦政府又会如何处理信贷呢？联邦政府也许会把它拨给联邦农业委员会（Federal Farm Board），以便支撑这些小麦和棉花的金字塔；也许会拨给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后者再把信贷借给铁路部门；也许会拨给老兵事务部（Veterans' Bureau），后者再把信贷借给战争老兵们；也许会用于完成华盛顿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上的纪念桥的修建，或者用于购买纸和铅笔发放到参议院和众议院办公桌上。

但是，这家地方银行仍旧还有剩余的信贷可以借。到目前为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它的投资都是很保守的。想要收回借给纽约市一家大银行的信贷，它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不必为此操心。想要收回借给美国政府的信贷，它只要把债券出手就行。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收购政府债券的市场，因此，这家银行想：何不冒点风险呢？这样就能获得更高的利息率。

你也许注意有个人非常真诚地走向围栏后面的行长办公桌。从他的神态姿势，你可以看出他是个推销员。是的，他就是推销员——来自华尔街的一名债券推销员。这次他推销的商品是外国债券。他有一些南美国家政府的债券，利率为7%，还有一些德国城市的政府的债券，利率为8%；鉴于银行只给储户3.5%的利息，这两个利率是非常诱人的。

“你也许会想，”推销员对行长说道，“像这种7%和8%的利率标志着一些风险。事实上这些债券没有风险，它们绝对是好债券。外国借贷者要在我们国家支付高利息，并非因为他们不是有偿还能力的好

债务人，而是因为我们对外国投资很冷淡。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对像您这样的小银行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高收益投资机会。”

被说服之后，这家地方银行用剩余的信贷购买了外国债券。购买一个南美国家政府的债券，也就标志着它向这个政府出借信贷，而它对此所了解的仅仅是推销员的一席话。这个南美国家政府会如何处理这笔信贷呢？它想做什么都行，因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可以用它来建造一座镀金的圆顶建筑。有许多国家利用这种美国地方信贷建造新的镀金圆顶建筑。

买了德国债券标志着这家银行向自由之城不来梅（Bremen）或科隆市（Cologne）出借信贷。不来梅会怎么利用这笔信贷呢？它可能用此拓宽港口的航道，建造一些新码头。原本我们可以用这些信贷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哈肯萨克河湿地边建设航道和码头。那么科隆市又如何处理这笔钱呢？它可以用这笔钱建造一座体育场或者一个大型泳棚，为它的居民带来幸福和舒适。这是多么的奇怪啊！这家银行借给德国信贷来完成这些工程。而其所在的美国社区却既没有体育馆，也没有游泳池，而且科隆市也许会用信贷在莱茵河上建造欧洲最大的桥梁，而它实际上并不需要这座桥，仅仅是为了在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我们原本可以用同样的信贷在旧金山金门建一座大桥。

在你离开这家银行前，再观察一点。这些信贷来源于储户们在银行窗口留下的现金，而他们与这些使用信贷的债务人相隔甚远！他们对信贷的用途知之甚少！假使你告诉那个在“储蓄”窗口下从旧手提包深处掏出小面额纸币的妇女，银行会将她的美元增值10倍，用于美化一个拉美小国的林荫大道，而这个国家她根本没听说过，或者她的钱被用于一个德国城市建造工人宿舍，而这个宿舍比她的住宿条件还好，那会怎样呢？假使你告诉那个随后而来的穿工作服的男子，他的

钱被银行增值10倍，借给纽约证交所的一名投机者，或者借给巴伐利亚（Bavaria）用于翻修一座大教堂；抑或是借给一家外国银行，而情况是假如欧洲的赔款事务没被处理好的话，这家银行也许会损失这笔信贷；或者是借给德国，以便德国能把战争赔款付给协约国，好让后者愿意支付一些欠美国财政部的钱，那又会怎么样呢？

在你离开银行时，请记住它只是全国25 000家大小银行中的一家。所有的银行都从事此类的资本倍增活动，都以同样的方式将倍增后的资本借出。你见到的这家银行仅仅是森林中的一个源泉。想想看，陆地上还有25 000个这样的源泉，所有的都持续溢出信贷。想想看，这些以获得利率为目的的地方信贷源泉遵循犹如地心引力般准确的定律，流向小溪，流向湖泊，流向海湾，再流到远方的海洋。假如你在脑海中定格这幅画面，你就会更深刻地理解还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会发生——虚幻无度地使用信贷力量必然会导致这个后果。

你会看到经济领域发生了改变。一些活跃的“明星”坠落。而在地面上，一些金字塔崩塌。在两三个星期内，华尔街记者称之为证交所大崩盘的新闻占据了报纸头版。接下来，有一天一家拥有40万储户的纽约银行不得不在其厚玻璃板的门窗上贴着“由州银行检查员下令关闭”。这40万被遗忘的人们储存的现金催生了过剩的信贷，而银行把太多过剩的信贷借给一些后来变为金字塔的项目——例如摩天大楼。

你还记得那家地方小银行“储蓄”窗口下的那个拎着手提包的老妇人吗？她有个纽约朋友正是这40万储户中的一个。这位朋友捎给她一封信，信上说如今银行已经不是储存钱财的好场所。老妇人把钱存放在许多自己想得到的地方会更安全，哪怕没有利息。比如说可以存放在面粉罐的底部。于是老妇人再次来到“储蓄”窗口。她想取出所

有的储蓄。然后那个穿工作服的男子来了。他也听说了类似的情况，也想要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对美国整个大型银行体系来说，这两个人的行为无足轻重。但是请记住，这只是25 000家银行中的一家。每家银行都有一些储户同时要求取回储蓄。那么，这就是先前谈到的所有信贷源泉、溪流以及水域收缩的开始。

与先前的倍增相反，现在发生的是通货紧缩，银行家无法控制。假如他曾以10：1的比率倍增信贷，那么现在，由于他的储户取走了钱，他必须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信贷。也就是说，储户每取走1美元，他必须从其他地方召回10美元的信贷。如此一来，巨大敏感且高速运转的信贷机器突然掉转车头，发出吓人的齿轮碰撞声。

再回到你所坐的这家小银行。由于储户继续取款，它必须要回信贷。首先，它通过电话或电报给那家纽约大银行捎了个消息：“请归还我们的信贷。我们需要。”

但是请记住，由于这家纽约银行把信贷借出去了，它必须也从其他人那里要回信贷。假如它把信贷借给了证券交易所的掮客，而掮客又转借给投机者，那么掮客们必须归还信贷。但是设想向证交所借出过信贷的所有纽约银行同时要求返还信贷，理由是作为信贷源泉的全国各地数千家地方银行正打电话要求收回信贷，那又该如何呢？

在这种情况下，证交所的掮客们受到了致命一击。他们返还这些信贷之后，没法找到新的信贷，因为信贷源泉正在收缩。既然事情已经如此，于是掮客们告诉他们的顾客，也就是那些投机者：“我们很抱歉，要告诉你们一个糟糕的消息，我们借不到信贷了。银行要求我们偿还债务。我们不能用信贷支撑你们的债券了。假如你不能在15分

钟内为这些债券支付现金，那么我们会将它们出手，来拯救我们自己。”

由此引发了证券交易所又一天的恐慌进一步的崩盘，报纸上充斥着令人惊骇的大幅头条新闻。于是，恐慌被传播了。由于没有信贷支撑，快速转动的证交所“金字塔”正在倒塌。这种结果又变成另一种结果的原因。由于衡量虚幻财富的证交所交易价的猛然下滑，以及其他不明原因，又有更多的银行倒闭了。排在银行门前的焦急的储户队伍一天比一天长。于是信贷湖泊继续加速收缩。

但是假如纽约银行把信贷借给了柏林的一家银行，根本拿不回信贷，那么它该何去何从呢？它要么偿还地方小银行要求收回的信贷，要么宣布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这家纽约银行必须出售其储备投资中的一些债券。但是假如所有的纽约银行都同时做着同样的事情，因为它们差不多都会这样做，那么证交所的情况会更恶化。银行将会出售债券，投机者将会出售股票。而债券大跌对全国上下的心理影响则更具有破坏力。

你现在看到是债务清偿的一幕。由于这些成千上万被遗忘的银行储户要取回存款，信贷源泉正在干涸；而由于信贷收缩，每个储户都同时要求返还存款。借贷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借贷者别无他法，只能出售资产来偿还信贷。

然而，即便这家地方银行从纽约银行中要回信贷，还是不够。它的储户持续取款；它必须要回更多的信贷——请记住，这个比例是10：1。储户每取出1美元，某地的某人就要还10美元的信贷。这家银行下一步想到的是出售手上的南美某国政府债券。这是收回信贷的另一种方式。当然，总有人会购买这些债券，但是这意味着无论谁从银

行手中买下这些债券，他都会代替银行成为发行这只债券的南美某国政府的新债权人。银行不必关心谁是买家。交易会在公开的债券市场进行。在那里，货物售出概不退换。需要谨慎的是买家。

但是当这家地方银行去出售手持的南美债券时，发现这些债券的报价是30美元——它买的时候可是付了90美元。这个南美国家政府目前深陷财政困境。债券市场所有的买家都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给出30美元的报价的原因。假如银行以3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债券，那么它将永远损失借给南美某国政府信贷的2/3。此外，假如出售这些债券只能得到这点钱，那么卖掉也无济于事。于是它把这些债券放到一边，转向手中的德国债券。但是德国债券同样暴跌。这些债券的情况也许与南美债券一样，或许还更糟糕，因为德国陷入危机之中。那么银行还能出售什么呢？它还可以出售美国政府债券，即便这些债券也遭遇了大幅跌价。由于成百上千家处于困境的其他银行都选择出售手上的美国政府债券，而不是那些它们无法承担损失的糟糕债券，因此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也下滑了。

通过出售美国政府债券，收回了持有的政府信贷之后，这家银行持续经营了一段时间，偿付了储蓄的存款，劝告他们不要继续取款，而且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抱以乐观的态度。又有一天，华盛顿审计局办公室的银行检查员突然来审查银行账本，以此决定这家银行是否有偿付能力。审查完银行的账本之后，他说道：“看这里！你已出售了所拥有的最好资产。现在要用那些不良资产来平衡收支，你却仍旧用当时买下这些不良资产的价格为它们估价。例如，你仍旧在账本上为这些外国债券标上90美元或95美元的价格，可你十分清楚它们现在只值30美元或35美元。你这不是一家有偿付能力的银行。你必须关门。”

然后，一张致命的白色封条被贴在银行的厚玻璃门上，所有在窗台前要求取款的储户被赶出门外。

1930—1931年这两年间，基本上一模一样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类型的3 635家银行中。这些倒闭银行的储蓄额超过25亿美元。

很容易被遗忘的事实是，这些站在银行外面透过玻璃读着银行检查员的封条裁决的储户才是最初的贷方。

想想储户的作用吧。显然，当储户来存款时，他是把钱借给银行。但是这些钱代表着什么呢？假如储户带给银行的是他赚来的钱，那么这些钱代表储户劳动所创造的同等价值的东西，一些自己使用后还能剩余的东西。这也许是一捆木柴。就先假设是木柴吧。

这捆剩余的木柴只能达到几个目的。假如你把它储藏起来，以备将来使用，那它代表的是多出的闲暇时间。假如你用它向邻居换取你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那么这是原始的易货交易。在这两种情况下，你不能获得任何增值。它一直都会是一捆木柴。你可以对其进行现金出售。假如你储藏了卖出木柴所得的现金，也还是不会有增值。但是假设你把钱拿到银行作为有息存款，这样你就把价值一捆木柴的剩余价值借给了银行。这就是增值的开始。一个没有工具的工人从银行借钱去买一把斧头、大木锤以及一些楔子。这些工具代表着你的那捆木柴。这个工人用这些工具砍下了三捆木柴。他给自己留了一捆，卖出了其余两捆。他用其中一捆的收益来偿还银行贷款。现在他手上还有第三捆木柴的收益，这就是利润或者是增值。假设他决定不把这笔钱花掉，而是储存起来。这样他把钱存入了银行。现在银行有了两捆木柴，而原先只有一捆木柴——银行并不是拥有木柴本身，也不是拥有

劳动，而是拥有代表劳动的金钱载体。除此之外，工人手上还有工具。所有的这些都是从一捆剩余的木柴中得来的。

这样，我们积累了财富，只要获得财富的劳动没有流失掉，那么财富的累积是没有限制的。

现在假设第三个人来借走了银行两捆木柴的钱，他用这笔钱建造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没有经济价值的玩具，或者用于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投机活动，或者在根本没有创造同等价值的情况下，用这笔钱购买了他迫不及待想要享受的东西，而享受止步于单纯的消费，并没能创造同等价值的东西；因此他最后无力支付利息或者偿还本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说金钱被流失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金钱还在，但是它所代表的东西流失了，也就是那代表着可以创造两捆木柴的劳动流失了。

金钱所代表的东西具备价值或力量，而它本身却不具备这些。所以，每1美元的实际货币表示的是价值1美元的财富在某地被以某种方式创造了；银行家在这笔钱的基础上倍增的每1美元信贷表示的是价值1美元的财富在某地以某种方式正在被创造。

假如这些钱遭受贬值，从而缩小了所占总体财富的比例，导致购买力下降，那么那些把劳动借给银行的储户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要限定只有政府才有发行货币的职能，为什么制定严格的法律限制政府行使这一职能，又为什么规定制造假币是犯罪呢？其实不难理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货币的价值保持稳定，假如货币增加的速度比我们用货币标价物质财富的增速要快，那么与货币对应的劳动的价值将像一捆在风吹雨淋中逐渐变质的木

柴，使它原有的价值缩水。所以当政府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规定假币制造合法时，当它开始发行与任何已有或正在产生的财富没有一丝关联的假币时，结果就显而易见了。慢慢地通货膨胀会出现。一旦出现，人们将无法制止或控制它，最终灾难也将发生。也许，到最后人们一辈子的储蓄也买不起一顶帽子。

我们能模糊地从货币中了解到这些。而我们还会了解关于信贷的内容，不过那将会更模糊。

假如有人建议政府大肆印刷货币，让全国充斥着法定货币，那么只要是有经济头脑的人都会断然拒绝这一建议。也许会有那些思想上或政治上不理智的人才采纳这一建议。但假如政府中不理智的人通过民主的方式投票迫使政府这么做的话，那么每个人，包括那些不理智的提建议的人都会储存黄金，因为它是一种政府不能制造也不能稀释的货币；或者假如有人提议让每家银行有权决定它认为合适的货币量，完全让银行自主发行，那么我们也会深知其中利害。所以，每家银行都会对这一提议说“不”。这不仅因为人们不愿让私人银行家拥有这一特权，各私人银行家也同样不愿让同行拥有这一特权。

然而，虽然货币的发行如此戒律林立，但是信贷却不同，银行可以自由地创造和倍增，每家银行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控制信贷数量的，尽管货币通胀和信贷通胀是同样的魔鬼，会引起同样的苦难。信贷通胀会使投资人和社会出现狂喜、错觉以及虚幻的财富积累状况；通货紧缩则会带来萧条、危机以及悔恨。一种状态接着另一种状态，谁都无力避开，因为通胀和通缩一个是原因，而另一个则是结果。

第三章 拯救欧洲（大冻结）

“借人小债，他成了你的债务人；但是借人大债，他成了你的敌人。”

——《格言集》

下面摘自《纽约时报》1931年6月23日星期一刊登的文章：“纽约引领下的巨大购买热情席卷了全球证券和商品市场。这是在周末外界对胡佛总统的一年内冻结战债和赔款表示好感后，市场作出的反应。世界范围内价格的攀升为公开市场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价值，可以看出市场对股票、债券、谷物、棉花、蔗糖、银以及铅有着巨大的需求。德国债券列表上的债券有了明显的增幅，涨了2~13.5个点……美国政府的债券却均不尽如人意，所有的美国证券、债券均以跌幅收盘。”

撰稿人把最后这点信息放在文章末尾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而这却是对这疯狂的一天中最重要的事实所投以的全部关注。事实就是，世界市场上所有的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只有美国政府债券是例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美国政府债券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是响亮地讲给所有那些愿意听的人。它们以报价作为语言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下面就是它们要说的：

“又一次用美国信贷来拯救欧洲！你计算过你已经付出的代价了吗？代价越来越高了。此外，你也许根本在做无用功，你救不了欧洲，你的努力也许只是在让它膨胀而已。那种种好的迹象也许到头来反而更加糟糕。”

事实确实如此。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价格都涨了，只有美国政府的债券没涨，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假象、一个幻觉。更糟糕的还没有到来。

胡佛政府实施的债务假日计划就是为防止德国的金融崩溃，以此来避免一个注定要以惊天动地的方式震撼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灾难。我们为此而付出的第一笔资金估计有2.5亿美元。我们必须从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欠美国财政部的战争债款中放弃这个数额。我们不能简单地提议，假如让德国在一年内停止向其欧洲的债权国支付战争赔款，那么，会给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造成更加巨大的损失，这是它们的经济所不能承受的。假如它们在没有得到德国的赔款的同时，仍旧要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战债的利息，那么这将会破坏它们的金融体系。因此我们提议，假如德国的欧洲债权国愿意将赔款期宽限一年，那么相应的，美国财政部也将给予它们一年的宽限期。

仅做这些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些困难需要解决，因为这个提议就是让欧洲付出一些代价来拯救德国。事情是这样的，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每年从德国获得的赔款略大于4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每年还给美国的债务略小于2.5亿美元。这样，国际性的宽限期会让它们产生两者的差额那么多的损失，也就是大约1.5亿美元。英国每年从它的战债债务国收取的金额会比偿付给美国国务院的债务高出5 000万美元，因此它愿意接受这个提议。但是法国与英国相反，从德国获得的赔款要比支付给美国的债务多出1亿美元，因此它不情愿接受这个提议。经过艰苦冗长的协商后，各国为了顺利实行债务假期计划以拯救德国经济，同意让法国获得特殊的待遇。所以，结论就是：德国要向巴塞尔（Basle）的国际银行支付一部分不可减免的对法国的赔款，然

后法国再按照新协议把这笔钱重新借给德国。当时每个国家都对德国的承诺信以为真。

于是，这个计划生效了。我们损失了2.5亿美元，事实上还要更多一些。当德国的欧洲债权国们仍就这一计划争论不休，仍在为它们各自可能损失的金额讨价还价的时候，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直接贷款给了德国国家银行，避免它的倒闭。所以，最终看来，我们总共付出了3亿美元。这个代价小吗？

当时，我们确实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丰功伟业。每天早上的报纸都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欧洲的外交官和大臣们也在各种新闻或媒体上做如此表达。美国的驻外记者们通过电报把他们的原话寄给我们。但电报机上打出的这些文字是那些外交官和大臣故意献殷勤讨好的。他们真正想说的却与此大相径庭。比如，他们在说：“我们要开始停止向‘夏洛克财政部’支付可恶的战债了。”

保守的英国媒体用比以往更加主动的姿态迎合了唐宁街的官方曲调，这恰好是一个英国讨厌法国的时机；所有的主流报纸都是讽刺挖苦的调调。

法国的民意则表现得非常刻薄：这些美国人总是说他们不会插手，现在又笨手笨脚地插手欧洲事务，真让人难以理解。他们居然插手去管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事务，还想着利用他们那信贷的力量来规定法德之间的条款。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以一种单纯的金融方式借出他们的信贷，然后给债务国充分的自由呢？除此之外，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没礼貌，在没有先与法国协商的前提下擅自提议让法国在一年内放弃德国的赔款。

德国的评论则是在一片无情之中夹杂着一丝欢跃：为了保护它已经借给德国的那25亿美元贷款的安全，美国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德国走向破产。它拯救德国、拯救欧洲，事实上目的就是拯救它自己。

尽管如此，我们仍对这一计划评价甚高。不管怎样，粗略算来，假如这一计划真的顺利实施下去，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花费了3亿美元就让欧洲避免了破产。但是很快到来的事实说明了情况：我们没能拯救欧洲。在两个星期内，3亿美元信贷全部被吞噬了，就是这样，欧洲还是对我们说：

“看看现在的状况！胡佛计划是没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原本这个计划就不可能达到拯救欧洲的目的。而随后，很不幸，相关国家对此公开冗长的讨论使得全世界都了解了德国现在的状况。现在德国所有的私人债权人都慌了。美国的银行家们要取出他们在德国银行的存款。德国人自己都不愿意用马克（德国货币——译者注）了。美国下一步想要怎么做？假如这一计划被执行后，未能拯救德国，它还是破产了，那么你当初就不应该插手进来。而假如德国破产了，整个欧洲都会崩溃。”

因此这时拯救欧洲需要第二个胡佛计划。第二个计划是：美国银行要停止从德国取回存款和短期信贷，把这些钱按一定期限重新借给德国，比如说六个月。这就意味着可能需要额外的6亿美元信贷。拯救德国的成本突然变成了原来的3倍。尽管如此，必须采取这一行动。这一行动由一个美国银行家带头执行。为此，他被传唤到欧洲商量此事。

然而，谁能说为了德国和欧洲而拯救德国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呢？这个成本不再是低价。尽管如此，想想所有处于危险中的美国对

德国的巨额投资，也许这些投资的价值在10亿美元——也就是说，前提是我们能挽救这个颓势。但是我们做到了吗？没有。

又过了几天，情况变得明朗：美国所有信贷只是在延缓这个灾难的到来。处理德国危机还是需要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不然在胡佛债务假期结束之后，或者甚至在假期结束前，当美国银行重新借给德国的六个月期限贷款到期了，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呢？德国想到的唯一的极端应对措施是拒绝支付战争赔款，同时再借入更多的美国信贷。而欧洲其他国家脑海中浮现的唯一解决方案是美国免除它们的战争债务。

但是还没来得及开始构想这些极端措施，又一个危机出现了。英格兰银行出现了一个黄金挤兑的国际风潮。它的黄金储备就要被耗尽。“针线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绰号——译者注）该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拯救它的信贷呢？只有美国信贷有这能力。因此英格兰银行派人来到纽约，从联邦储备银行获得了一大笔贷款。

美国的信贷救了德国两次，一次是为了德国，另一次是为了欧洲。而今，美国贷款又拯救了英格兰银行——所有的这些发生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这些拯救行为的成本约为12.5亿美元。

谁又能说这是得不偿失的呢？

但是，我们没来得及喘息，又有新情况发生。付出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危机。德国没有被救起，它只是浮在美国信贷的木筏上而已。由于德国未被拯救，整个欧洲也还处于危险中。由于这些原因，英格兰银行将立即发现它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借来的贷

款并不够。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也没有被拯救。它低估了脱困所需的金额。现在该怎么办呢？

每个人的脑海中同时浮现了同样的东西，好像这些想法是新鲜的一样——同一种魔力、同一种圣水，那就是更多的美国信贷。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要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是，英格兰银行的贷款需求太大。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手上拿着欠条再次去纽约借钱会损害它的信誉。美国银行家们也许会很不高兴。另一个主意是让英国政府自己来借美国信贷，以此拯救英格兰银行。这个想法唯一的缺陷是，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信誉不是很好。这是一届福利主义政府，它每年的国家财政都处于赤字状态。它把如此多的资金投入社会福利项目中，尤其是为失业人员提供公共工资，以至于它不能平衡财政预算。它已经入不敷出，而且无力平衡预算，那么英格兰银行又如何能仰仗它去借美国信贷呢？

事实上，英国政府试探了美国银行家们的口气，看他们对此是否介意。而这些银行家并没有动怒，只是说：“在我们发行英国债券为你筹款前，你需要处理一下你的账本。外界为此议论纷纷。你就不能在为人称道的社会项目上少花点钱，然后平衡预算吗？假如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外界就会停止议论你们的财政状况，到时候在美国筹得贷款或为英国财政部提供任何额度的银行信贷就很容易了。”

于是，英国人决定更换他们的政府，采取社会经济计划，平衡他们的预算。他们早该这么做了。正是由于工党政府失去偿付能力等一些问题的损害了英镑的声誉。尽管如此，削减公共开支这一不受欢迎的任务被拖延到英格兰银行失去借入美国信贷的能力后进行。在那个时候，英国财政部才会迫切改善自己作为借贷者的声誉。

当英国人更换政府并准备平衡预算的消息从伦敦传出时，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已经在讨论为英国提供贷款了。“他们重申已经准备好，”《纽约时报》8月26日的文章指出，“为新政府提供大量贷款，假如它有需要的话。”文章进一步指出：“银行家们说，要提供全国所有银行能立马提供的所有贷款，而且还款周期至少一年。许多银行家相信长期贷款能帮助大不列颠，也有少数银行家相信哪怕在目前债券市场萧条的情况下，为坚挺的英国信贷举行公开销售也是可行的。”

第二天，华尔街传出消息，有关贷款的协商正式开启。第三天，华尔街宣布美国银行家将向英国财政部出借2亿美元的贷款，还款期限为一年。

而英国公众对此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美国人又用信贷的力量来插手英国的政治，甚至达到了要求工党政府下台的地步——这就是英国人的看法。此前一直执政的英国工党的机关报《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指出：“麦克唐纳（MacDonald）先生对全国最不幸的阶层推行新一轮剥夺政策的原因之一是‘国外民意的压力’。谁的民意？不是同样被失业和财政窘迫所困扰的欧洲或美国这些民主国家的民意，而是外国银行家们的民意。他们向英国政府列出了许多条款，包括改变英国失业福利的计划。只有条件满足，他们才能为英格兰银行提供金融援助。”《每日先驱报》的文章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用手枪顶着英国的头颅。

言外之意就是，美国人无权在对英格兰银行提供贷款进行援助或拯救英国财政部时设定条款。他们应该在借钱之后，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国事。

在我们之前，英国曾是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而懂得债权人思考方式的英国人怎么会变得如此不理性呢？

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强烈的政治情感扭曲了事实真相。虽然确实如此，但是这些是金融方面的事实，而金融已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它已分不清该继续走哪条路，该如何往回走。在把国际债务堆到新的万丈高度之后，金融界现在面临的是同等壮阔的国际破产。金融界震惊了，它无法控制这些现象。它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继续堆高欧洲债务，继续借出美国信贷。国际金融无法创造更多的债务。假如说私人信贷的源泉尚未枯竭，债权人的信任之泉却即将干涸，但是欧洲仍旧能借到一些公共债务。在这个时候，金融界采取的思维方式就如同街上行人所想的那样：让政府去处理吧。让所有的欧洲政府增加它们的债务，来拯救自己和他国。这是缺乏想象力的。

借助于国际金融机构，德国在六年或七年内共借了将近40亿美元。这远远超出了德国的偿还能力——可是它从未想过自己的偿还能力。在设法把钱借给德国之后，在耗尽德国各种可以发行的债券之后，走入死胡同的国际金融界却说道：“德国必须得到更多的信贷，不然它的整个金融体系将会崩溃。假如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国际金融界将无法应对，结果会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德国没有更多的证券可以提供了。因此国际金融界不能为德国发行债券筹款。但是假如德国的债权人愿意集体担保德国的债券发行，那么国际金融界就可以为其发行债券了。”

想想看接下来事情会如何演变吧。假如德国的欧洲债权国们，即英国、法国、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愿意担保在美国发行德国债券筹款，当这笔信贷也耗尽了，会发生什么呢？也许到时候，为了继续向

欧洲提供贷款，我们只能自己担保借出的贷款了。不然你能得到什么更好的担保？美国人借给欧洲的贷款居然要美国人作担保！

事实上，为什么认为这个想法很奇怪呢？所有美国对欧洲的战争贷款和战后贷款都是由美国政府作的担保。美国政府发行“自由债券”向大众借钱，然后自己担保债券。假如欧洲真的不愿偿还这笔债务，美国政府将会替它还。这笔债务不能被抹掉，不能取消，也不能打折。它只能从欧洲纳税人的肩膀上转移到美国纳税人的肩膀上。

假如说美国债权人不是旧世界金融安全的一大威胁的话，那么至少对他的定义是：他对欧洲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欧洲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家们说我们是最坏的债权人，因为我们仅凭冲动就抛出借款，而且是以一种无度的、饱含情感的方式，毫无系统性可言。事实确实如此。的确，作为债权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行为，别人也毫无头绪。除了经济上或金融上的考虑外，有一股奇怪的拯救欧洲责任感压在我们的头上。

在战争期间，这种情感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它把我们带向战争。它要我们把欧洲从德国的战车下拯救出来，把德国人民从霍亨索伦王室的统治下拯救出来，把小国从大国的压迫中解脱出来，使欧洲人民永远摆脱战争的诅咒。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动机，比如协约国方面还欠我们钱，虽然与我们现在动用的援救金额相比，那只是小钱。我们对协约国饱含同情。我们憎恨德国人发动战争。我们中的有些人还对德国统治下的欧洲有些担心。协约国让我们加入战争的宣传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有这些原因，然而假如我们没有这种情感上的幻想，我们是不会参与到冗长的拯救活动中去的。

用战争来结束战争，这在哪里可行？在欧洲。用战争来捍卫世界的民主，哪里的民主处在危险中？在欧洲。用战争来解放受压迫民族，在哪里可行？在欧洲。我们参与战争不是为了对付德国人——我们说过与德国人无冤无仇，而是为了把德国人从坏蛋军阀的独裁下解放出来。从任何现实的角度看，这些都与我们无关。

协约国对我们脑海中的这些画面不感兴趣，或者假如说有的话，它们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因为这与它们有关，那就是把弱国从强国手中解救出来，也就是给弱小的民族自主权。协约国并不关心我们参战是由于什么。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怀揣着浪漫想法，只要我们站在它们这一边，因为假如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它们要输掉这场战争。它们并不是为了捍卫世界民主而战，不是为了永远结束战争，也不是为了解救德国民众，更不是为了让弱小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是为了击败德国而战。得到美国的帮助之后，它们确实打败了德国。我们所怀揣的那些参战目的后来都没有实现。有的只是我们对欧洲的一种持续的责任感。

参与到这个本不应该卷入的战争让我们损失了250亿美元。除此之外，我们又在后来通过美国财政部向盟友借出了100亿美元以上的贷款。在这之后，又开始了私人借贷——也就是美国银行和美国投资者借出的贷款。算上我们在战争中的直接开支、战争贷款、战后贷款以及此后的私人贷款，我们在15年不到的时间里花费了至少400亿美元用于帮助欧洲。这笔数目代表着我们1914年全国总财富的1/5。

我们付出所有这些成本去参与战争，美国财政部把“自由债券”筹得的钱借给盟国，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有这样的道义责任，无论这些钱能不能收回。然后是美国财政部经手的战后贷款，用于清理欧洲的战后残局，这些钱是战争债务。因为这些债务，

欧洲人憎恨我们，而毫无疑问这些债务在后来又值不了多少钱。财政部本来持有的是协约国给出的债务期票，后来又换成了长期债券。假如财政部去华尔街出售这些债券的话，能在原先1美元的基础上收回20美分就很幸运了。

那么就只考虑私人债务——战后美国银行和投资者为欧洲提供的贷款。这些贷款都是属于金融层面上的，金融具有自私性。因此，关于在过去八年中涌向欧洲的这些50亿或6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我们有权去问：我们到底在借款后得到了什么？

确切地说，首先我们没有获得欧洲的友谊或善意。相反，欧洲人出现了一种反对我们的丑恶负债人心理。也许，你会说人性就是如此，债主必须为此做好心理准备，也必须宽容负债人的这种心理。但是有人用偏执的方式对此加以利用，使欧洲的负债人心理变得更加邪恶，也为这种心理铺上了一层凶恶的政治重要性。利用负债人心理的人不仅是媒体和政客，还包括那些负责任的政治家、无力平衡预算的财政部长，以及那些需要提高税收的政府。

德国政府告诉它的人民，假如他们不用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德国人称之为“进贡”），德国的工资就会上涨，德国的税收就会下降，德国的贫困就会消失，代表德国强盛的太阳就会升起。

曾经的协约国对德国说，它们很抱歉，假如它们不必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战争债务，它们就可以免除德国的全部赔款或者至少免除大部分赔款，也许是2/3。但是它们不停地对自己的人民说，由于每年要偿还美国财政部巨额战债，它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可它们却没强调这笔钱是从德国获得的赔款。而事实上，德国根本没有支付赔款，协约

国也没归还战债，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美国的信贷归还的。而它们却毫不理会这一事实。

是美国的贷款才使德国有能力支付赔款。而协约国每年用德国的赔款来向美国政府偿还战债。我们从欧洲收回的都是自己后来借出的钱，而每次借出后拿回来的少得可怜。但是假如你跟一个欧洲人说这些，即便是对一个知道实情的人说，他也会被触怒。事实上，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实情。人们更容易相信那些利用负债人心理的人说的话。

长久以来，大家认为欧洲把美国贬低为“夏洛克之国”是因为这笔债务的性质——这是一笔战债，有着公共性质。显然，假如这笔债务是欠私人债主的话，欧洲不会出现这种无理的情感。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要继续向欧洲借钱，直到私人债务的数目超过战争债务。由于有着巨大的数额，私有债务开始带有公共性质。于是，欧洲民众又开始对此产生一种同样骚动的大众情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人这么富裕？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这么多信贷？他们想要用黄金来奴役整个世界吗？

这是国际金融界始料未及的后果。当金融界突然失去信贷资源时，正如1931年所发生的那样，它只能请求政府干预。政府介入后，所有关于金融应该独立于政治的话语都变成了无稽之谈。

1931年夏天，德国真正的危机是在所有国家都在胡佛计划下一年内免付战债后发生的。7月，七大国首相级会议在伦敦召开，讨论德国对其私人债权人的偿付能力问题。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代表美国方面出席大会。会上决定推行第二次胡佛计划，避免德国在债务上违约

——是针对私人债权人的违约，而不是对其他政府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国际金融界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必须介入。

后来当英国人为了从美国借款拯救英格兰银行而更换政府时，私人债权人进行的金融交易再次被涂上了一层公共属性。英国政府并不是从美国政府借款，而是从美国的银行家那里借。然而，由于美国的银行家们要求英国削减公共开支、平衡财政预算，英国的工党便可以借此向大众说：美国人利用手上巨大的金钱力量来摧毁大不列颠的工党政府。然后成千上万的英国失业者将会认为是美国银行家们的行为导致他们每周从英国公共财政中收到的救济金变少。

国际私人债务是很容易定义的，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从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手中借钱。国际公共债务也是很好定义的，它是一个政府持有另一个政府的债务。但是也许借贷双方中，一边是私人，另一边是政府，比如一个国家的政府从另一个国家的私人贷方借钱。但是假设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债务，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债务人，债权人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假如债务的数目大到足以危及负债人民的偿还能力和经济自由，或者大到足以恶化双方的经济关系时，这笔私人债务就会套上一层公共属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后果。

我们对欧洲有着各种形式的贷款。有的是欧洲国家政府从美国政府那借的；有的是欧洲的民众和私人机构从美国私人债权人那借的；有的是欧洲国家政府、州、市从美国的私人债权人手上借的。这些贷款形式的差别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每一部分美国债务都仅仅是美国债务大集合体的一个特定部分。这些纯粹的债务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在1931年9月的一期《回顾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中，法国前驻美大使以及美法梅隆—贝伦杰战债偿还协议的起草人之一亨利·贝伦杰（Henri Berenger）写了一篇措辞优雅的评论，用法式逻辑分析了美国人外交政策的变化。文章写道，145年来，美国人的外交政策都是以华盛顿对美国国会的离职演说为基础，只有寥寥几字，那就是“孤立主义”。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第一个宣扬另一种主义的总统。美国人排斥了他和他的主义。因此他们向欧洲委员会派驻官方的观察员。“后来，”贝伦杰先生写道，“胡佛总统向全世界释放了他的讯息，并且派遣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与欧洲的大臣们谈判。这是在6月20日总统向外界释放信息后发生的。从各种角度上看，这些都是关于插手外国政治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让大西洋对岸的这个国家成功背离华盛顿的孤立主义，而且如此受欢迎呢？”

他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他写道：“七年来，美国的银行家们一直致力于把美国和欧洲缠绕在一起……事实上，美国撒在欧洲身上的钢铁和黄金网络由于太重，把自己卡住了。柏林的破产能在华盛顿立马感应到，法兰克福的每一次恐慌都会撼动华尔街。当危机进一步加剧，延伸到与美国缠结在一起的伦敦时，美国有着被勒死的风险。”

法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金融界把美国卷入外国事务中。而在此前的150年间，美国人民一直拒绝卷入外国事务。

既然给欧洲的贷款不能为我们带来友谊，只会带来更多的厌恶；既然贷款让我们陷入外国缠绕网，违背了我们原有的智慧，那么这个未被回答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

这时，传来了外贸界的声音：“可是我们对外放贷确实增加了我们的出口贸易。我们借给欧洲的贷款让它能够从我们这大量购货，假如没有贷款，它是无力大量购买的。我们的工厂也因此正常生产，我们的劳动力也能保住工作。”

“确实如此，但这只持续一小会儿。只要你一直借出钱让别人买你的商品，那么你的出口贸易会一直膨胀。但是假如你借出钱给国外顾客来买你的商品，你一卖出商品就会想你到底收回了什么，除非你继续借出钱让他们来付款或者免除他们的债务，不然你什么都得不到，这能算是好买卖吗？假如这也算是好买卖的话，那么常识变成了愚笨，唯有国际金融了解这一切的奥秘。”

接着另一个声音响起了：“但是请记住，现代世界是一个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享繁荣，美国也不例外。作为有剩余资源的国家，我们应该关心战后憔悴的欧洲……这一理由足够把美国信贷置于欧洲的控制之下。此外，我们也有义务这么做，我们这么做也是明智的，因为我们不再自私。”

这些崇高的思想所代表的是现今世界尚不能提供的和谐社会。首先，不同立场的人对此的看法很也许是不一致的。贷方有着一一种热情，而借方却怀着另一种想法。他们间的交易不是由简单的“谨慎、判断以及道义责任”所支配的。而且，当你谈到借钱是一种义务时，你指的是什么？假如这是义务的话，那么你怎么看待你的合同呢？更有甚者，这种想法也许会被降格成这样一种言论：仅仅因为比他国富，富国必须把钱分给那些心存忌妒的相对穷国。事实上，欧洲许多政治经济学博士宣扬了这个想法。他们要么不知道国际借贷也许会因此变得无度和不负责任，借方很快会把这种借贷与古老的掠夺想法连在一起；要么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第四章 援救德国（8月大危机）

战争到现在已经16年。

德国根本没有罪孽。

《凡尔赛和约》是现代历史中的一项滔天大罪。

战争赔款乃进贡，。

1917年美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是因为协约国欠它钱。

在所有的国家中，债权国总是会关照债务国。

1931年的胡佛债务假期计划是为了保护德国欠美国的20亿美元的安全，因为现在德国欠美国的债务使美国不得不成为德国的政治盟友。

——摘自德国时下流行语录

德国再次威胁要在破产的汪洋中和它的债主一起沉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再一次，是债主们在疯狂地操作着抽水机，防止下沉。它们比德国更加担忧，为何？原因很奇怪，因为在这片海洋中，只有债主会被淹死。

假如德国沉没了，它还能再浮上来，因为它的债主被淹后德国之船的负荷就减轻了。它的债主们此前两次都无法让它持续浮在水面上，虽然已经把许多大包的债务扔下海。刚开始抛弃这些债务是很容易放弃的，因为这些债务是政治性债务。它是以战争赔款的名义收取

的。而如今，在这第三次危机中，船上有两种债务，两种债主，它们都面临同样的窘境。一种债务是原先未还清的赔款债务，而另一种债务是巨额私人债务，这不是德国政府欠其他政府的，而是德国政府、州、市、德国银行和德国工业欠全世界的私人出借者的。这是在过去的六年或七年中形成的一笔新债务。债务总额达到近40亿美元。其中约有2/3是美国银行、美国投资者、美国私人贷方出借的。

对德国来说，这笔巨额私人债务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德国可以借此来抹掉政治债务。

看着它的债主们在抽水机旁工作，德国不停地说：“抛弃剩余的这些赔款债务吧，这才是我们要下沉的原因。扔掉这些，我们就不会沉没了。”

然后，德国又悄悄地对它的私人债主说：“你还不明白该如何解救自己吗？只要与我们合作，然后让我们彻底摆脱这些赔款债务，保证我们不会沉没。”

这一建议使债主阵营发生分裂，他们开始争吵起来。但是他们不能确定在抛弃赔款债务后是否就不会沉没。关于德国所有的一切，他们都不确定。因此，无奈之下，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既从德国的角度检查这艘船能承受的债务负担，也从债权人的角度检查，然后综合这两种结果。德国同意了。

第一届国际专家委员会潜入水中对船只进行检查。而在1924年，德国完全沉没了。德国此前一直过度发行货币，直到货币不值分文，这是一种会导致国家彻底破产的行为，无论是对内破产还是对外破产。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如此，专家们发现这艘船本身是完

好的，专家们在报告上也是这么陈述的。这艘船只需要有一股信心的浪潮就能再次浮起。一旦它浮起，那么它能承受每年6.25亿美元的赔款债务。

这就是道威斯计划。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德国政府从英国、法国以及美国手中借了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以开展“履行和约政策”。然后，整个德国立马开始了数额巨大且无度的借债生涯，这在国际金融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它先前因通货膨胀直至破产的情况可以比拟外。这就是私人债务的开端。

五年后，道威斯计划压垮了这艘船。本身让德国每年支付6.25亿美元数目的赔款就是灾难性的，可是让情况更恶劣的是，道威斯计划并没有阐明德国这艘船要承受这笔债务负担多少年。它没有规定一个应还赔款的总额，只是让德国每年分期付款。假如债权人没有确定一个债务总量以便德国至少知道什么时候赔款能结束，那么它只有绝望地选择再次下沉。

随后，第二届国际专家委员会分析了德国的资源，然后得出结论：德国每年只能支付4亿美元。这就是杨计划（Young Plan）。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德国政府从英国、法国、美国手中借了3亿美元，以实施第二次“履行和约政策”。

但是在杨计划实施前，德国国家银行前行长和其他德国人一道奔走于全世界，做了真实的宣传活动。他们宣称，赔款正在把德国带向毁灭；假如它不能摆脱这一重负，那么它必然会沉没；假如第二次国家破产行为是唯一解脱的办法的话，正如先前的道威斯计划那样，虽然这一切听起来很可怕，但德国的损失却会少点。

想来非常奇怪，在这种宣传愈演愈烈之后，德国仍旧能继续从国外借取史无前例的债务数目。美国的投资者们继续购买德国债券，因为德国债券的利率很高。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的银行继续把剩余的资金存放在德国的银行中。这些人都说：“哦，那些都是关于赔款的政治宣传，与我们的私人金融或私人投资无关。”没有人想到德国人在抨击他们的信贷时，说的居然是真话，也没有人想到德国第二次全国破产也许是有的。这有点像当年人们关于路西塔尼亚号沉没的警告。

这就是冷酷而真实的事实，可是无人相信。

突然在1931年6月，“德国损失少点”的情况即将来临。德国正处于国家破产的边缘，呼吁它的债主们保持克制，避免灾难降临到它的头上。德国膨胀的金融系统将要崩塌了，德国国家银行将要倒闭了。如此一来，它只能在所有的外债上违约，包括政治债务和私人债务。这笔不是欠他国政府，而是欠外国投资者和银行的私人债务达到将近40亿美元的庞大数目。国际金融界能让德国破产吗？难道德国的债主们不是应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拯救德国吗？

最同情德国的债主是英国，这不是因为它将是德国破产的最大输家——美国所受到的资产牵连比它大得多，而是因为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在那个6月，英格兰银行行长每天打电话告诉纽约的美国银行家们德国的情况是如何的危急，如何一天天加重以及为何美国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施以援手。只有美国有能力拯救德国，英国单凭一己之力无法避免这场灾难。法国起不了什么作用。美国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因为假如德国破产了，那些在德国拥有巨额储蓄的美国银行该怎么办呢？美国各地的银行和私人投资者所持有的德国债券该怎么办呢？投资储备里含有德国债券的那些美国银行该怎么办呢？当英格

兰银行行长没给纽约打电话时，英国政府自己又打电话给华盛顿，叙述了同样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佛总统提议开展国际债务假期。在一年之内，德国不必向前协约国支付赔款，而欧洲也不必向美国支付战争债务。这就等于借给德国4亿美元——原本每年它要向协约国赔款4亿美元。除了这一效果外，国际金融界还直接向德国国家银行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助其应对紧急情况。这笔贷款是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英格兰银行以及法兰西银行联合提供的。完成这一天的工作后，国际金融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至少这防止了德国走向破产。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各种证券类的德国债券，甚至包括德国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奇迹般地涨价了。

而紧随其后发生的是，大家疯狂地逃离德国货币马克。原先为了高额利率把钱存放在德国银行的英国、法国、荷兰、瑞士以及美国的私人银行转念一想，焦虑异常地收回存款，毕竟一年之期很短，没人知道债务假期结束后会发生什么。

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德国人自己也远离马克。他们已经偷偷地挪离它长达一年或更久。现在，他们开始奔跑了。他们把德国的马克带到德国国家银行，以此购买纽约的美元、伦敦的英镑、巴黎的法郎。他们可以通过外汇机制来进行交易。当他们在德国国家银行用马克换取了可以在纽约提取的美元，可以在伦敦提取的英镑以及可以在巴黎提取的法郎之后，他们只要打个电报到纽约、伦敦、巴黎，然后把美元、英镑存入相应的银行就行了。那些不知道如何通过外汇机制把马克外币转存到外国银行的人还发现了简便的办法。例如，他们会到最近的边境去，然后用最大面值的马克购买一小张火车票。他们并

不想短途旅行到国外去，只是想换取荷兰的货币荷兰盾或者瑞士的法郎，然后储藏。

胡佛债务假期在6月30日生效。从这一天起，德国不用支出4亿美元赔款，同时还借来了1亿美元新信贷，也就是德国的财政突然多了5亿美元。尽管如此，在10天内，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卢瑟（Luther）博士乘飞机跑遍欧洲，去巴塞尔，去巴黎，去伦敦，到处说德国必须马上获得额外的5亿美元贷款。由于人们逃离马克，胡佛债务假期计划的所有成果都被抵消了。德国的金融困境比以前更严重了。德国人不愿做出牺牲，也就是说德国离破产已经不远了。国际金融界被吓坏了。到底哪是尽头呢？德国人拼命把钱撤离德国，而与此同时，德国却恳求债主们给予更多的贷款来拯救它。

“这就是漏勺，”法国人说，“完全是一个漏勺。此外，它还很可能是个陷阱。德国认为通过威胁拒还债务，它就能让债主们仅仅为了要回一笔固定的数额而继续撒钱吗？”

法国人的处境很好，比英国人好得多。长久以来，英格兰银行一直在流失黄金，它对此也深感忧虑。而法兰西银行有着世界上第二大黄金储备，而且黄金储备还稳定增加。法国人十分清楚，假如没有他们的维护，为德国提供第二次巨额国际贷款将会失败。于是他们说：“很好，我们将考虑参与为德国提供国际贷款，条件是德国人能表现得像一个债务人。债务人不应该对债权人滋生一种军国主义情绪。因此，让德国人解散钢盔部队吧，因为这代表着旧式的军国主义精神。他们不能继续把债主的钱花在所谓的‘袖珍战列舰’上，因为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海上武器。他们还要退出与奥地利的合并，因为这是与《凡尔赛和约》相违背的。”

听到这个消息后，卢瑟博士飞回了柏林。他仅仅代表德国国家银行，并不代表德国政府。因此他无权讨论政治事务。

他回来后，德国人的抱怨情怀爆发了。又是战争！又是法国人！他们将利用德国急需援助的状况，制定一些羞辱德国的政治要求。上次胡佛计划就是因为他们的阻挠，才导致这一计划错过了发挥功效的最佳时间，现在他们又要用他们的金融力量，在经济上奴役德国。

最担心欧洲金融体系瓦解的英国人还雪上加霜。他们提议在伦敦召开首相级会议，说服德国总理途中拜访巴黎，将德国最优雅的一面展现给记仇很深的法国人看。德国总理确实和他的外交部长以及一群杰出的专家顺道访问了巴黎。法国人在花环拱门下的火车站迎接他们。任何对法国人有一丝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这表明法国人仍保持逻辑性。在欢迎和拥抱之后，法国人会发现对方都不敢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他们却一直在提。事实确实如此。

然而德国人的这些话语足以让国际金融界毛骨悚然。德国人说他们没什么计划要提的，只有一些事实要陈述，然后由债主们考虑这些事实，继而决定是否为了拯救自己而救德国。德国人说他们提及的不仅是政治债务，也就是每年必须支付4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德国新的总额将近4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这笔钱是德国政府和它的人民在过去的六年间通过债券、票据以及短期借条，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瑞士、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其他地区的银行中借的钱。其中，美国人借出最多。美国人借出的有许多是所谓的短期信贷，也就是说，短期之内该还的贷款，假如天空持续放晴，那么这笔贷款可以持续续期，但假如一有出现恶劣天气的迹象，也许就要立马还钱。借取这么多短期信贷是很危险的。德国人说他们一直明白这一点。他们同样知道他们用不明智甚至奢靡的方式花费了大量的信贷；

他们承认这是事实。然而，人们还是必须面对眼前的现实。现在，德国的许多债主要求还钱。但是钱都花了，德国如何能还，如何能同时还清所有债主？是的，债务确实到期了，确实该偿还。债权人有权索回债务，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等待他们的是上万个空无一文的德国收银台抽屉。假如他们坚持索要，那么德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宣布破产，然后对所有债主一视同仁。这确实不是德国面临的问题。这是国际金融界要解决的。债权人人们要从德国收回利息、本金，又或者是战争赔款，唯一

的方式就是继续给予德国贷款，让其支付。

听到德国人作的这一点论述后，国际金融界开始颤抖了。六年来，它一直向德国财政部、德国工业、德国银行涌入资金，一直在说：“假如世界想要让德国支付赔款，那么就必须给予它巨额资金，助其建设国内经济。”而现在，德国对它的债主们说：“假如你们想要我还钱，你们必须再借钱给我，然后我用这钱还你们。要挽救你们的投资，你们必须先拯救德国。”

那么到底如何拯救德国呢？首先要免除德国的战争赔款。

但是德国人还没说完。他们接着说：假如国际金融界不为德国提供新的巨额贷款，那么即将发生的是，首先德国的外债偿还能力全面丧失。然后会发生什么？然后，民族主义——红色的德国，想想看这对它邻国的和平和安逸代表着什么吧。就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就算德国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避免在政治上走上一条红色道路，假如德国现在没能获得信贷来拯救自己的话，它将会在经济上走极端：它只要忘记它的债主们，忘记资本规则，忘记国际金融界在支撑德国高资本金

融体系时候所商定的协议，仅仅需要把无限数量的德国便宜货倾销到世界市场就行了。

这就是伦敦的首相级会议所要面对的情况。

首先，德国正在沉没，因为它缺乏助其漂浮起来的国际贷款：在正常情况下，国际贷款从其特征来看是国际银行家的事情，但是现在国际金融界已经不省人事了。德国造成的这个局面已经超出了国际金融界的资源、经验或者想象力。国际金融界并不是一个银行，不是黄金仓库，它是一种机制。它很愿意帮助德国再发行5亿美元的债券——前提是这些债券能卖得出去。但是哪个地方还愿意再买德国债券呢？全世界都充斥着正在大甩卖的德国债券，因为许许多多的持有者都在尝试卖掉德国债券。简言之，国际金融界江郎才尽了。也许这些首相、总理把智慧凑在一起能思考点什么出来。不管怎样，这是唯一的希望，也是这次会议召开的目。

7月的第三周，会议在伦敦召开了，世界上7个主要大国均有代表出席。其中六个是焦虑的债权人；第七个是令人震惊的债务人；美国方面的代表是国务卿斯廷森（Stimson）先生和财长梅隆（Mellon）先生。

看看吧。从各方面看，这都是战后高端政治家出席的最有气势的一次会议。想象一下会议的开幕、相互间正式的友好问候吧。想象一下英国首相会在演讲中说，现在每个人必须忘记自身的利益，要从整体利益出发，想想如何最好地为世界谋福祉，因为只有通过国际社会无私的合作，各国才能走出眼前的困境。

再想想假如接下来发言的是德国，它有任何要提议的计划吗？

没有。德国现在很无助。它没有计划。它仅仅呈现所有的事实，然后让它的债主们想出解决方案。它所想的仅仅是5亿美元的国际贷款能保全它。

能保全多久？

这它说不准。至少能度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几口喘息的时间。

德国用什么来借这笔贷款？

什么都没有。德国很无助。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了。

但是用什么担保呢？

什么都没有，除了它承诺会偿还。

可是先前承诺要还的已经超过了它的偿还能力，不就是因为这样才导致现在的困境吗？

当然，这是问题所在。德国人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德国愿意通过留置它的海关收据来担保这二次贷款，正如法国人所建议的那样吗？

不。

为什么不呢？

因为德国民众不会屈服于这种羞辱。他们会摧毁任何胆敢作此提议的政府。

那么德国做出政治妥协来安抚法国人，如停止建造军舰、解散令人忧虑的钢盔部队，可以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还是这个道理，因为德国民众不会忍受这种屈辱。他们会很快变成激进派的。

但是德国总可以同意停止修订条约吧？也许它会同意在危机结束后重新回到杨计划，严格遵守这一计划而不是尝试修改它吧？

绝对不会。德国将机智地提醒它十分卓越的合作者们，他们现在处理的是一场经济危机。把政治难题压在经济危机上是一个错误，甚至是违反协议的。

很好。但是提供不了什么，那么我们就给不了什么，不能提供那些两度被耗尽的贷款。德国有什么理由期待它的债主们能再借给它5亿美元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准备好了。德国认为它的债主们知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一定要这么做。假如他们拒绝提供贷款，让德国自生自灭的话，那么首先，由此引发的金融后果是无法遏制的。这些后果将不仅限于德国。德国也许会沉没，但它的债主们会与它一道沉陷，结果也许会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崩溃。其次，德国将不会有负责责任的政府。假设那时候极端的民族主义兴起该怎么办？不管怎样，德国肯定要拯救自己，虽然这么做需要拒还所有的债务，但这还不够。它还要

进行其他方式的经济收缩，如削减工资、削减物价、让德国的商品涌向世界等。

多么无助的德国啊！它居然能挑战它的债主，能威胁欧洲的政治体系，能威胁世界的经济体系。它是如何达到这种扭曲的高度的呢？通过利用世界的愚蠢？通过恰好有利于它的各种力量？用“威胁”来形容它的行为合适吗？凝视着德国人的与会者中，甚至连最后一个问题都无人能回答。

一想到德国也许会在经济上采取极端措施，英国人就非常焦虑不安，甚至比德国会在政治上走民族主义道路还不安。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此前刚就恢复世界价格水平问题写了篇幅宏大的专题著作。它的结论是，假如把价格稳定在低水平将是一个灾难。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或风险，哪怕需要动用科学的国际通胀，也必须把价格稳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否则代表原先正常利润值的资本将会被永远流失。因此，倾销——这个想法或这个字眼，让英国人惊慌不已。俄国人的倾销已经很恐怖了。此时此刻，伦敦的媒体正在进行禁止俄国产品进入英国市场的宣传造势活动。但是假如德国也走上经济极端道路，想想它的技术、它的经验，它那长期想控制世界市场的野心，以及它那强大的工业机器——欧洲最强大最有效的，这一切将是多么的可怕啊！而德国人居然如此礼貌地提出这一也许的结果！

但是他们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这种想法在德国日益流行。德国报纸宣称，在没有国际金融界帮助的情况下，出台一种自我拯救的经济政策将有利于“放宽那些不强制执行的政治协议和金融协议，这些协议只会遏制我们的发展”。而德国报纸是在德国政府进行严格言论审查的背景下说的这番言论。

英国人可以想象德国矿井口那些依稀可见的大量煤炭将涌向欧洲，奔向意大利，接下来毁了英国的煤炭贸易。他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制造品会在外国市场上以低价与英国商品竞争。英国媒体十分小心地触及这个话题，甚至根本就闭口不谈。但是《伦敦时报》报道称，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先生在会上把德国人拉到一边，告诉他们说，德国推行倾销的政策将会与英国利益发生冲突，英国将会报复。也许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报复。

这样，由六个焦虑的债权国和一个令人震惊的债务国出席的七大强国会议没能找到灵丹妙药。冗长的会议只带来了两个建议，宣布完会议的成果，接下来就休会了。这两个建议是：第一，由于眼下无法借给德国新的国际贷款，与会的每个债权国要向各自的银行家们建议把储存在德国的剩余存款继续留在那，不要取回。第二，成立第三届国际专家委员会，研究德国状况，分析它的需求，接下来报告结果。

这听起来没什么。从债主的角度看，这什么都不是。然而不能创造、不能给予、不能提供的德国却在三个点上获胜了。

第一，它得到了贷款，虽然这是债主们无意中给的。美国和英国各大银行以及那些可以被威吓或者说服的银行同意把早已到期的存款和短期债券留在德国银行，而不是要回。这等于是再次借给德国7.5亿美元的贷款。钱在它手上，它还可以继续使用。这无非就是它再次借了这笔贷款。

第二，第三届国际专家委员会能保护德国，使其免受债主的困扰。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是纽约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行长阿尔伯特·威金（Albert H. Wiggin）。他一直主张应该大规模降

低或完全免除战争赔款和战债，同时他还认为美国应该降低关税，以便欧洲能在美国市场销售更多的商品。

第三，德国最想要做的就是对杨计划阳奉阴违。它确实这么做了。

第三届国际专家委员会代表的是最后一次在相信德国赔款问题能在经济领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后以失败而告终。连德国政府自己都正式把赔款定义为进贡，怎么也许还能找到经济方案解决呢？那些相信赔款是进贡的人——德国人确实深深相信这一点，并没有表现得好像赔款是债务一样。而整个世界却希望德国把赔款当债务来处理。只要德国人一直推断“这已经是战争以来的第16年了”，或者“已经第17年了”，债权国们就无法对德国实施任何公共或私人的纯经济解决方案。记住，德国主要的债主们都是战争中的敌人。

想要对1931年德国的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层面上的分析是很容易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一直靠贷款资金而发展为欧洲最强大、最有效的庞大德国机器是依赖借来的汽油运转的。从这个事实来看，每个人都知道最终将会有什么后果。但是这个事实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德国机器是用借来的汽油运转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安全地把自己的汽油（信贷）存在外国银行，而从其他人那里借来汽油呢？到底为什么？

当7月上旬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乘坐飞机奔走于欧洲，寻求5亿美元的国际贷款（汽油）来让德国机器继续运转，使德国避免破产时，德国人自己的估计是，他们在纽约、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以及其他金融中心的存款总额是10亿美元。德国人在巴黎的存款数目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假如这笔存款在一天内被同时取走

的话，那么法国金融市场信心将会受挫。当然，并不存在这一危险。德国人不想取回自己的钱，他们只想要别人的钱。

你可以把这些列为引发德国危机的经济事实。它们解释了这次危机。但是人们又无法在经济层面上解释这些事实本身。假如德国人把自己的钱存在德国，那么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了。他们自己有足够的汽油来维持机器的运转。但是他们却选择把钱存放在别的国家。尽管清楚地了解这一切，可法国人还是无法用严格的金融眼光来看待德国危机。他们不停地问：“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人自作自受呢？”绝对与经济原因无关。

请记住，一直以来，赔款债务根本就不是德国的经济重负，也不是金融重负，仅仅是心理重负而已。它从来不算真正的重负。原因很简单，德国从未还过赔款。它让整个世界为它支付；它让债主们用自己的钱支付。

一开始，它采用幼稚的权宜之计：简单地印刷纸币马克，接下来在全球任何有买家的地方出售。人们确实购入了庞大的数量。马克的价格越低，人们就买得越多，而且购买者们一直在说，“德国永远不会拒绝还钱，违约是不可能出现的”。然后根据这一逻辑推断：买马克是一笔很好的投机买卖。这些将会被拒绝还款的马克买家们，还有那些收取马克作为持有德国债券的利息所得的持有者们，正是他们支付了第一笔战争赔款，而不是德国。德国先用纸币马克换取这些投资者们的钱后，然后又把他们的钱还给它的债主们。当最终成捆成捆纸币的印刷和运输成本超过这些马克所能换取的资本时，德国停止了印刷，停止支付赔款，然后宣布它彻底破产了。

于是法国人想出了一个冷酷的办法：用武力收取赔款。这样，法国人开进鲁尔（Ruhr），夺取了德国工业的中心。而法国人的行为仅仅证明了，一个人不能动用武力向不情愿的人收取赔款。德国人不愿意操作机器，为法国人生产“贡品”。他们发动了罢工、骚乱，更糟糕的是，他们威胁要毁坏机器或者通过破坏把机器卡死。想象一下吧，愤怒的德国工人放下手中的活动扳手会让法国人失去100万法郎的贡金。这就是法国人在鲁尔面临的困难。他们控制了德国的工业核心，可是就算法国人说“很好，那我们没收机器，自己来操作”，但是这就意味从法国调来工人和技术人员，如此一来就没有利润了。此外，假如他们真这样做，他们控制下的德国民众将会挨饿，会无所事事。进军鲁尔让法国人得不偿失。法国人无法用这种方式获得赔款。

在这种僵持的情况下，欧洲各国一致请求美国插手，它们说：“我们在情感和政治上已经疯狂了。我们拥有的唯一理性就是知道我们是谁。简单地说，我们无法在经济层面上思考了。在大洋彼岸的你们看问题应该能更清楚些，想想我们这些在欧洲的人下一步该如何走吧，因为假如你不能想出个办法，我们就要化为灰烬了。给我们提出个计划吧。”我们确实给出了计划。我们派美国专家去清理问题。我们为它们带来道威斯计划。德国对此表示同意，它还发誓执行“履行和约政策”，并且还借了2亿美元黄金用作执行计划的开工费。

自从道威斯计划生效后，也就是说自1924年以后，根据德国自己的数据，它的赔款净支出达到了23.5亿美元。

而与此同时，还是根据它自己的数据，它从其他国家借来了数目惊人的37.5亿美元。

也就是说，自1924年以来，它借来的贷款在支付赔款后还能多出14亿美元。

这些贷款中大约有2/3来自美国，第二大来源是英国。其他的贷款则来自法国、荷兰、瑞士以及其他借出国。共有3/4以上的贷款是来自德国上次战争中的敌国。

而仅仅说德国左手借入贷款，右手支付赔款，或者说它用每借来的1美元支付63美分的赔款，然后37美分留为己用，并不足以描述故事的全部。资金流通有一个循环运动。资金从一个方向流入德国，在那停留了九十天、六个月、一年或者更久以供其所用，接下来从另一个方向流出，就如同水车在水的作用下运动一样。记住这一原理很重要，因为这解释了许多原本无法理解的后果。资金并不是仅仅流入然后再次流出那么简单。它会滞留在那，然后为人所用。人们在讨论经济学时，说德国用借来的钱建设国内经济，以此获得赔款能力，接下来用增加的财富来支付赔款，也就是这个道理。德国的国内经济建设确实惊人。它知道如何把资金流用于机器的滚轮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如今是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美国是世界第一，德国是欧洲第一。

德国把借来的钱投入以下三个方面：①建造各类住房；②在工业方面，重建工业，使工业合理化，加强工业；③建造公共工程，如公园、公共浴室、市民娱乐中心、学校、体育馆、展览馆、新市政厅、新邮局、道路，甚至纪念馆。

德国人深深地怀有一股建设激情。在住房建设方面，他们在1930年一年时间内建造了30万间以上的住房。大部分新房是为工薪阶层、州公务员，或者其他中等收入人群建造的。每一个大规模的住房建设

区被称为聚居点。因此，德国出现了工人聚居点、铁路职工聚居点、邮局职工聚居点、单身人士聚居点。但是同样还有在特定地区为富人建造的聚居点。我们应该称这些为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这些住房数目是巨大的。观察这些住房的最好之处是在空中，因为一个聚居点或一系列的公寓住宅也许是一个城镇的大小。而且，假如你在地面上观察的话，你要开无止境的车程才能看完。这些广阔的新聚居点被建在新的开发区域。原有城市并没有得到重建，因此没有多少改变。德国人选择在新的地区建设新的事物。所有的改变都发生在城市的周围。

德国的建设热情超出了原有的需求，变成一种挥霍、一种试验、一种嬉闹。这些房子是在新的时间，用新的材料、新的外形、新的方式新建的。教堂都是用钢筋和玻璃做的。那些别墅、太平间、酒店、学校、摩天大楼以及商业建筑极具现代派特色，简直是一场建筑盛会。

看到德国挥霍借来的钱时，许多债主很是愤怒，其中英、法两国人民比美国人更愤怒，因为原则上美国人对德国的挥霍了解得要少些。德国人承认这一点。他们会实话实说，他们已经相互谴责这种行为。而说归说，他们并未停止建房。而且，他们老谋深算地把大量资金花在将来能发挥作用的项目上，比如在科隆市新建第四座横跨莱茵河的大桥，如今这座大桥是欧洲的建筑奇迹之一。

法国人说：“现在没有必要建设这座桥。是什么原因使得你们要造它？桥梁又不能充当赔款。”

德国人回答说：“我们在将来会用上它的，我们现在建桥能为人民提供就业岗位。”

这是德国人的直觉抑或是智慧——利用可用的资源来增强国家的力量，改善人民的生活，即便他们是用借来的钱来完成这些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建造的这些东西会持续存在。他们也许会失去黄金、失去信贷，但是机器、工厂、发电厂、桥梁、公共建筑、道路、实验室、条件改善的住宅、公园，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继续存在。它们不会飞走。似乎这些钱消耗殆尽后该怎么办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钱并不是实物，仅仅是实物的代币而已。毁掉这些代币后，实体物质仍然还在，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到物质上的伤害。人们可以创造新的代币来代表这些实物。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大约十年前，德国的货币不是被完全摧毁了吗？而这些货币所代表的东西，甚至包括无形的德国货币，都没有被摧毁。旧金钱代币被摧毁后，可以创造新的代替，接下来德国又恢复了声誉，整个世界又焦急地要成为它的债主。

此外，通过挥霍无度地使用贷款，德国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肉眼可以看见的有精致的住房、娱乐设施以及其他一些关系到人民福祉的设施。这些东西的存在似乎可以消除德国倾向民族主义的任何想法。德国有变成民族主义国家的危险这一观点本身是不足信的，再加上德国现在的工人们拥有的幸福舒适以及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这个事实也大大降低了德国走向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从所有的政治意义上讲，德国的红色危险很可能是“7/10幻想”



德国总共有四五百万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一个卓越的智慧人士。德国人认为，苏维埃俄国不希望德国变成民族主义国家，至少目前不希望。因为它很担心这对德国工业效率及生产力可能带来的后果。它此时此刻焦急地想继续利用德国的工业生

产力和效率满足俄国需求。无论这种想法正确与否，假如俄国人按照这种观点行事，继续让德国挂着一个民族主义的表面，继续成为一个在数据上很强大，在政治上很虚弱的国家，那么这是很明智的。

德国人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是带有讽刺的，他们会说：“这是我们手上的一张牌。”德国人的意思是当德国政府与国会发生冲突时，德国政府可以召集支持者们，挥舞红色旗帜或者威胁要寻求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当德国政治家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正如伦敦会议上那样，他们可以说：“负责任的政府在德国被逼到了墙角。为了你我共同的利益，请支持我们，因为假如政府垮台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将面临一个民族主义的德国。”这些话语达到了目的，战后以来便一直如此。

除了德国人外，没人能理解错综复杂的德国政治，而且我们有理由怀疑连德国人自己都不懂。各大党派原先是走中间路线，而后逐渐分为左翼、右翼，右翼中有左翼，左翼中有右翼，政党之间、政党内部分一直不停地争吵，争吵的内容不是关于某个想法，而是关于想法背后蕴含的哲学和理论。任何新想法都要首先从政党利益考虑，接下来才有可能从新想法的优点考虑。当你观察这些政党总是不怀好意地相互抱怨、排斥对方观点的时候，显然这些政党间的钩心斗角搅浑了一些单纯的事实，你会说德国没救了，要下沉了。这些政党怎么可能还会有方向感呢？但是当你观察在过去的十年它们经历了哪些，观察它们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来对抗世界，你几乎就可以想象有马基雅维利般的智慧在引导它们。回头再看看德国混乱的政治漩涡，你也许会想到各政党的分歧互相抵消，插手小事的激情被这漩涡吸收，以至于脱离现实领域，它们真正的智慧、民族直觉或者任何指引它们的事物可以更自由地牵引它们的命运，而不会有任何阻碍。

例如，在1931年7月的危机中，德国人把共和制政府转变为一个独裁政府，自己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宪法实际上被冻结了；统治他们的是法令；他们的国会却自我放弃权力；用人单位被要求扣留50%的应付工资；许多报纸被关闭；德国人要出国必须支付一笔25美元的罚款；媒体对德国总理在伦敦开会的相关自由评论“被禁止”，以防这些评论影响会谈结果，而这一切都没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独裁统治是必要的。独裁统治能自然而然地在德国建立起来。没有任何政党该对此负责，因此没有任何政党在意。而政治旋涡还是和以前一样发出无休止的争吵声。

假如德国真的在政治上走民族主义道路，那么这将与俄国的情况不一样。德国人不愿摧毁自己的东西。他们在推翻君主制后，并没有摧毁任何东西。他们从未想过要摧毁德国人的象征，即德国国王。国王在享有退休金的条件下被放逐国外，部分原因是要安抚世界。因为国王战败了，所以无人为他感到悲痛。但是皇储被迎接回国了，如今作为极右派的他活跃于德国政界。德国人更不想摧毁他们的工具，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业生产力，因为这是他们心中希望的首要来源。

然而尽管红色危险被降低（假设确有这一危险的话），尽管德国的社会得到改善（这倒是真的），许多债主还是很愤怒。他们一直说：“从德国人的角度看来，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德国人是用借来的钱完成这些的。他们把钱用在一些甚至连债主都无力消费的东西上。他们肯定知道假如他们把钱用在这些地方，那么他们将在债务到期时无力偿还。”

确切地说，德国人并不清楚这些。他们也许很少想到这些。而且，哪怕他们想过，他们也不在乎。要想了解其中缘由，我们还是要继续跟着德国人的思维进行探讨。

首先，德国大部分的贷款是从美国人手上借来的，而每个德国人的心中认为德国是被美国打败的，而不是欧洲协约国。要不是美国有着庞大的资源，要不是它先把资源借给协约国，接下来又自己直接参战，根据命运，德国肯定是必胜的。而美国的财力阻断了这一命运。

然后再想想德国每一个思维方式背后的情感信念。这种情感信念是怎么产生的并不重要。这个信念是外国要密谋摧毁德国，这一密谋失败了。然而假如《凡尔赛和约》不被摧毁的话，世界上就没有正义可言。而这部和约之所以特别不光彩，是因为它逼迫一个被全世界的武力战败的民族承认罪行。

还有，他们从不认为赔款是债务，仅仅是贡金而已。接下来，德国人有些秘密对其主要债主的描述用语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其中一些专指美国人。而他们正是从美国人手上轻易地借取贷款，以此上缴贡金。我们如何能期待他们会关心怎样使用借来的钱呢？这是他们敌人的钱。他们一边用这些钱来增强国家的实力，一边数着战争到现在已有多少年了——14年、15年、16年。这些放款人是多么愚蠢啊！

最后一点关于德国人的事实是，他们怀有的的是一个受伤民族所怀有的情感、思维方式以及动机。他们怀有的受害感挥之不去。这种情感是如此的深刻、丑恶，以至于这看上去像全国性的精神病——也许这就是事实。德国对抗世界这一观念使德国人团结在一起，这种观念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这种作用。德国人有着自我怜悯的情感。

当他们告诉你德国很贫穷的时候，他们自己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你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蒙骗。在这外表下隐藏着一种苦涩的悲伤，里面没有脂肪，或者就算有，也不是好脂肪。德国的身体组织是白色的，假使你能看得见的话。这些都是赔款导致的。德国很无助，它在

债主们的控制之下。它的中产阶级被摧毁了。你能在摧毁中产阶级的时候不造成苦难吗？于是外人过来探个究竟。他们看到德国人吃得、洗浴得都很愉悦，也尝试着过得开心。但这是一种绝望，是一种生活在灾难恐惧之下的民族所有的行为。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并不开心。假如商店很繁忙，那是因为德国人对自己的钱不放心，要把钱花掉，以便转而储存物品，他们还记得通货膨胀。假如他们外出美餐一顿的话，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有个人在柏林用餐时从一群严肃郑重的德国人口中反复听到这种主题的话语，于是他想要改变德国人的想法。

“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德国人，”他说道，“在1924年，我一直仰望天空。你还记得战后发生的这些吗？或者还记得当时人们说在战后德国出现了仰望天空的热潮吗？正是那时候，你们开始建造这些美妙的天文馆。”

“记得。”他们回答道，表情略带困惑。

“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1924年的德国人，”他继续说道，“我和每个人一样，在天文馆里，当我坐在那凝视天体的时候，突然我很清晰地看到了德国的未来，就如同一个梦一样。”

“你看到了什么？”他们问道。

“等等，”他说道，“首先，你还记得1924年是怎样的情景吗？敌人徘徊在莱茵区，控制这一地区，以此让德国顺从。法国人占领鲁尔区，压榨着德国的核心。外国委员会进驻柏林，观察并托管一切事务。德国处于破产状态。它的货币不值一分钱。100万的马克很难买到一餐冷饭。”

听到这，这几个德国人开始呻吟。

“接下来再说说我看到的，”他说道，“我想象作为一个德国人，我看到了德国在未来的六年内会发生什么。我看到在1930年，它会脱离外国控制，敌人们会撤出莱茵区，法国人会退出鲁尔区。我看到在1930年，德国会是欧洲设施最好的国家，工业实力欧洲第一，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我看到在1930年，假如不是在世界上，它也是在欧洲拥有最精致住宅的国家。我看到在1930年，它的出口将首次超过英国，这可是它毕生的雄心壮志呀。我看到在1930年，德国拥有大西洋两艘最新最快的舰艇，它的海上实力可与英国抗衡，它将再次拥有大型海上商船队伍，而且都是新型现代化的。此外，它还为其他国家建造船只，成功地与英国的造船业进行竞争。我看到在1930年，德国将在航空业上领先于欧洲各国。它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陆上飞机、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以及世上最优越的飞机场。我看到在1931年，当法国人在对德国的国际贷款上附加德国解散没有武器的钢盔部队并停止建造军舰时，足够强大的德国对法国人说了‘不’。我看到一艘新的1万吨级的军舰，这反映了德国敌人们的愚蠢。他们认为书写一个规定德国军舰不能超过1万吨级的条款就能限制德国的海上力量。事实正相反，这些激发了德国人的创造力，因为在这种限制下，德国建造了一艘虽然是1万吨级的军舰，可力量却可比拟世上2.5万吨级的军舰。我看到在1931年，足够强大的德国敢公开宣称‘赔款是贡金’，这等同于一张布告，宣布它已经强大到可以拒绝支付的地步。而且我看到与此同时，它在六年内从敌人手中借来的钱比支出的赔款

还要多，这就代表着它自己根本就没付赔款。我看到在1931年，没有武器的德国足以强大到威胁欧洲的政治和平，强大到通过释放其工业和研发能力足以威胁世界的经济节奏。画面在这戛然而止了。我

想象我正在睡梦中。这些仅仅是个梦。多么荒唐的梦啊！然后梦中的一切都变成了现实。”

“这些确实成了现实。”这几个德国人说道，他们阴郁的表情没有得到一丝缓解，反而显得比先前更加阴郁。“你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他们说道，“但是你不是一个德国人。你无法知道德国人的感受。德国现在的情况是很危急的。”

这些德国人的脑海中到底推断些什么？失去的殖民地？法兰西帝国？新的法国防御工事？他们被孤立？《凡尔赛和约》中认罪的词条？你将无法知道答案。也许他们推断他们一直借以支付赔款的美国资金突然枯竭让他们处境尴尬。假如美国不能继续提供资金，那么他们要么决定真正支付这些贡金，要么在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拒绝支付赔款。

第五章 金鸡下蛋（大冻结之后）

“外国尤其是法国对黄金的哄抢威胁着联邦储备体系。一直以来就存在这种危险、这种猜测。这纯粹是一种猜测。这种猜测认为法国想要以此来影响战争赔款以及它欠美国的债务。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猜测。事实仅仅是法兰西银行的官员们要比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官员们智胜一筹。”

——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前财政部长，于1932年2月17日在参议院提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是一项旨在保护美国黄金储备的紧急法。

想要进一步了解美国信贷在国外的情况，那么我们就看看以下这些秋季的场景和经历，那就是：

1. 我们借给欧洲大量的贷款，而欧洲却抨击美元的黄金信誉。

我们的债务人居然责难我们的信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贷款借得太随意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债务人知道他们用不稳定的担保物便可借来如此之多的贷款。

2. 发生了一个按常理来说不允许出现的场面：债务国哄抢债权国的黄金储备，而这个债权国签订协议，承诺不从债务国收取债务，从而自捆双手，十分无助。

3. 一个债权国居然奇怪地发现自己要感激其中一个主要债务国，因为它出于慷慨和提供帮助的目的，停止对债权国的黄金储备进行哄抢。它的哄抢差点导致债权国自己失去黄金支付能力。

4. 有这么一个场景：当一主要债务国的总理在访问我国时，说我们必须在国际友好的精神下把欧洲的战债转嫁到美国纳税人身上，我们居然公开为他的发言鼓掌；当他带着我们要考虑他的建议这一承诺离开时，我们还给予了更多的掌声。

5. 美国信贷的肉体变得麻木，而且有一种不幸感，也许精神上也是如此。

由于这一切，上述那种猜测就突然开始了。

考虑到美国在一年内冻结外国战争债务的偿还；为防止德国违约而重新借给德国的七八亿美元的短期信贷；接着，为拯救英镑的黄金信誉，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一笔现金贷款；紧接着，为了同样的目的给予英国财政部另一笔贷款。所有这些加起来，我们还在1931年的夏天为欧洲提供价值不少于15亿美元的黄金信贷，想要以此来避免金融的彻底崩溃。

我们为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提供贷款就是为了让坚挺的英镑保有黄金基准，也就是说，让英镑保持传统的黄金价值。英国人自己也决心要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假如英格兰银行不能满足人们用票据兑换黄金的需求，那么这就会导致违约、通货膨胀、英国货币贬值，即英国货币不再拥有原来的黄金价值。这将自然而然地标志着英国信贷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的羞辱。尽管如此，这些注定都要发生。没有人能阻止人们对英格兰银行进行挤兑。它在纽约如此绝望地借款只会增加人们的恐慌。美国的黄金信贷就如同一捆捆堆在一家注定倒闭的银行窗口的纸币，以此来让储户安心不来挤兑，而这却引起相反的效果，因为没人相信这些钱是足够的。而在英格兰银行从美国最大限度地借到黄金信贷后，在英国财政部为拯救英镑再从纽约借来2亿美元贷款

后，英格兰银行却中止了黄金支付。英镑的黄金价值突然下降了1/4，英国也被降为纸币基准。

如今，英国失去了黄金基准，德国的金融处于冻结状态，奥地利和匈牙利破产了，所有欧洲该支付美国财政部的战债也被冻结一年。基本情况是：欧洲可以用被贬值的货币支付我们战债或者根本就不用付，然而我们欠欧洲的任何东西一经要求就要用黄金支付，因为美国仍旧处于黄金基准。

让我来进一步阐明情况。假设你在银行里有两个不同的账户。在其中一个账户中，你欠银行100万美元的长期期票债务，你正在慢慢地支付利息和本金。另一个是经常账户，你在这个账户上借了一笔信贷，比如说5万元。你通过这个账号进行日常交易。现在假设你到银行说：“我不能支付那100万美元期票的利息。假如让我付的话，我会破产。”作了这番陈述后，你把自己交由银行处理。银行可以要求还款，没收你的经营业务和你的财产，但是银行不想这么做。于是它说：“那好吧，现在是艰难的时刻，我免除你一年的利息，期票继续有效。”你说道：“但是我的经常账户上还欠着5万美元，那该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处理这笔债务呢？”银行回答道：“好吧，你肯定还需要资金继续做生意。我们当你有偿还能力，继续像以前一样处理你的账户。你可以继续用这账户开支票，继续做你的生意。情况迟早会转好的。”很好，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但是假使第二天，你又走进银行，然后说：“我很担心这种借贷机制。这信贷条件太宽松了。我怕我的经常账户不安全。我要结清账户。这是5万美元的支票，我想兑换黄金，请你兑换。”

很难想象一个债务人会做出这一举动。他无力偿还欠银行的100万美元，而现在又要求兑换5万美元的黄金。然而，虽然这个事实很奇

怪，但是由于银行先前与他签订了这一协议，它必须支付给他5万美元的贷方余额，而且假如他要黄金的话，银行还要用黄金支付他，不然就只能宣布自己破产。

在个人和银行间发生这种事情是很荒唐的。而在欧洲和美国间发生同样性质的事情也是很荒唐的，虽然后者的规模以及高级语言让这个事实变得模糊。

欧洲欠了美国10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战债的比例不到一半，其余的都是欧洲私人和公共机构从美国银行和投资者手中借的。尽管如此，欧洲却在美国有着大量的贷方余额随时可取。这笔余额也许是10亿美元左右。这些结余是通过多种方式产生的。当美国银行为了获得高利率，纷纷把钱存入欧洲银行尤其是德国银行时，欧洲银行却把钱存入美国银行。原因恰恰相反，它们要保证存款的安全。

于是出现这一方面的贷方余额，欧洲随时可取。此外，欧洲的出口商一直有把利润存入美国银行的习惯。他们认为存在美国比存在欧洲更安全，尤其是德国的出口商。他们是十分明智的。出于几乎同样的原因，欧洲的资本家们一直用钱在纽约购买短期票据，一有需要，便可出售。除此之外，欧洲在美国的贷方余额仅仅是新借的美国贷款所创造的利润，甚至包括在夏天借出的旨在防止欧洲金融崩溃的紧急贷款。而如今，我们将看到欧洲人是如何处理贷方余额，或者如何对待我们的。

英格兰银行中止黄金支付是由于纽约的银行在它们的账簿上写下“项目，为英格兰银行提供由其期票做担保的黄金信贷”，欧洲的哄抢者们就跑到英格兰银行取走金币和金条。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银行就如同一个漏勺。当纽约银行停止在账簿上写“项目，为英格兰

银行提供的黄金信贷”时，英格兰银行就将立即停止向任何人支付自己的黄金。相反，它决定储藏剩余的黄金，包括金库中的黄金和纽约银行账簿上的黄金信贷。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示了国际金融异常的现象。欧洲把目光投向了西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习惯。将近450年来，它一直在西方寻找黄金，那里有着巨大的美国黄金储备，那里裸露着价值50亿美元未被保护的黄金。欧洲手握打开这批黄金的钥匙。钥匙就是它在纽约银行所拥有的可以取得黄金的贷方余额。而这些余额中许多是通过美国近期给予欧洲的贷款所赚取的利润。它所拥有的打开美国黄金储备的钥匙正是我们自己无意中递给它的。美国的黄金储备守不住了。无论它是如何取得钥匙的，我们已无法阻止欧洲使用这把钥匙。我们无法对欧洲提出相应要求以抵消它从我们这取走的黄金。是的，我们在欧洲确实也有银行结余，但是这些钱要么被冻结了，如在德国；要么现在只能获取纸币，如在英国。我们根本无法用这些结余获取黄金。但是欧洲可以要求我们立刻用黄金支付它在纽约的所有贷方余额；是的，欧洲每年要向美国财政部支付2.5亿美元的战债，这本来能大幅抵消它对我们的黄金索求，但是我们给了它一年债务冻结期，因此根本无法抵消它的黄金要求；是的，我们还在欧洲有着巨大的投资，尤以德国为主，但是我们出售投资项目无法换取黄金，而德国只要出售它在美国的投资项目，却可以即刻获得黄金；是的，我们可以在德国或伦敦出售美元，但我们无法获得黄金，而德国可以通过在纽约出售纸币马克得到黄金，英国也可以在纽约出售纸币英镑获取黄金。最终奇怪的现象是：一个持有英镑纸币的英国人不能在英格兰银行换取黄金，却可以通过在纽约外汇市

场出售英镑换取黄金。

一个流通黄金货币的国家必须准备好履行各种纸币债务，不是用黄金对等物支付，不是用黄金信贷支付，也不是用一些能转化为黄金的东西支付，而是直接用黄金来支付，假如对方如此要求的话。而且它在支付黄金时还不能抗议，不能犹豫。因此，一个黄金国家防备外国对它的黄金储备进行挤兑，唯一的保护措施是持续从债务国收回支出的同等额度；它从外国收取的必须等同于它支付给外国的金额，不然它的黄金会流失。但是我们已经减轻了它们的债务，放宽了它们的还债期，我们欠它们的债务却没有被相应地减少。这是单方面的恩惠。这异常的现象是，我们允许欧洲在一年内免还公共债务；我们不能从欧洲欠我们的私人债务中获得黄金，即便在那些没有违约的国家；我们同意不收回德国和奥地利欠我们已到期的短期信贷；我们在欧洲的银行余额被冻结了，所有这些加起来价值100亿美元。而欠了我们这些钱后，欧洲却仍旧可以要求我们用黄金偿还它在纽约的信贷余额，据我们估计，这笔钱在10亿美元左右。而我们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黄金流失，要么自动退出黄金基准。哪怕我们有一次拒绝支付黄金，那么从那一刻起，我们就退出了黄金标准。

多么荒谬可笑啊！债务国们欠我们各种各样无力偿还的债务，它们可以通过债务冻结和宣布破产保护自己。与此同时，它们居然能一拥而上，大量消耗美国的黄金储备。在7月和8月间，欧洲吞噬了15亿美元的美国黄金信贷，许多都没有担保物，仅仅因为它极度需要贷款；在9月，它在美国银行体系挤兑黄金，而美国银行体系却无法保护自己。

我们自以为是地准备流失一些黄金。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欧洲的问题，思考如何能帮助英国回到黄金基准。其中一个帮助的方式就是

不对从美国到欧洲的自然黄金流动设置障碍。我们愿意售出或借出我们剩余的黄金，但是我们没想到这会是一场哄抢。

欧洲不仅要求美国银行即刻用黄金支付它的存款，而且它还开始出售所持有的美国短期投资物品，甚至包括手上的美国债券和股票，而且要求以黄金作为交换。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内部本就已经存在洪水般的债券抛售，而且美国整个银行体系也处在高压之下。我们国内抛售债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欧洲的投资被冻结了，而且处于呆滞状态。例如，美国银行不得不出售所持的大量债券，甚至包括政府债券，因为它们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巨额资产不能清算。本来情况已经如此糟糕，而欧洲却又为了获得黄金而出售手上的美国资产。

在六个星期内，我们损失了价值7.5亿美元的金币和金条。这差不多是我们总货币黄金量的1/6左右。按照这种速度，不出一年，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黄金。

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欧洲对黄金的需求比我们大，也不是因为拥有黄金就能让它脱离经济困境。这一哄抢背后的动机是担心、恐慌，而不是什么经济需求，不是出于任何别的原因。欧洲为了自身利益攫取黄金，趁现在能拿到的时候尽量拿——也就是在它扯住“夏洛克”（指美国——译者注）头发的时候。只要黄金！只为拥有黄金后所具备的力量！美国的黄金！哄抢我们黄金的诱惑无法抗拒。

很快，表示黄金流向的每日数据让这个奇怪的现象变得清晰明了。这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确需要黄金，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英国并没有得到所需的黄金。我们在头六个星期流失的7.5亿美元黄金中，仅法国就获取了1/3以上，将近1/2，而它根本不需要这些黄金，

因为它手上的黄金比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要多。而且相对来说，法国比我们拥有的还多。

当英格兰银行中止黄金支付后，我们拥有的货币黄金量是50亿美元，法国拥有约23.3亿美元。但是我们的人口是法国的三倍，我们的国家财富至少是法国的五六倍。因此考虑到经济力量和排名，法国拥有的黄金比我们多。我们人均黄金量不到42美元，而法国的人均量至少有57美元。然而，正是法国率先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

为什么它会还想要黄金？难道它担心美国会抛弃黄金基准吗？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担忧是突然一下子涌上心头的吗？这不像法国银行家们的做派。从他们的一贯做派来看，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法国的长远利益。

不管怎么样，法国攫取黄金后肯定会储藏起来。为了这个目的，法国在战后建造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藏宝库。这一点毋庸置疑，每个国家都会建造巨大的防盗金库来储存黄金，但是法国人却决定建造一个很深很坚固，而且非常神秘的藏宝库，甚至连一支能战胜法国的现代军队也不能闯进去。你可以用炸弹把法兰西银行炸毁，但它的黄

金却是非常安全的。藏宝库的面积有2.5英亩 ，位于200英尺

深的地下。离藏宝库最近的一层是40英尺深的水层，这是一个法国人建造的湖泊，用于阻拦巴黎地下水的。然后在这水层上面，有着50英尺厚的坚岩层。进入这一层需要穿过六个钢塔。每个钢塔都有用电动引擎控制的旋转门。而在穿过这一层往下走时，会立马被洪水淹没。一听到警报声，一小队卫兵会立刻走过通道，然后上前拉动水闸，之后这一队卫兵会被忘却——被无限期地忘却，或者仅在战争期

间被忘却，因为里面有事先都已准备好的一切东西。藏宝室里有厨房，有差不多足够两三次北极探险用的食物，还有餐具、日用丝织品，以及其他的一切舒适生活所必需的设施。

从9月20日左右起，每艘从纽约开往法国港口的快船都会把黄金运往这个储藏地。这些快船或其他船只还为荷兰、瑞士、比利时以及德国运送黄金。德国冻结了美国价值10亿美元的银行结余和到期的短期债券，而连它居然也能从纽约运走黄金。

美国在六个星期内损失了7.5亿美元的黄金，它不知道这个挤兑狂潮什么时候会停止，也没有办法阻止它，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很危急的事情，尤其是其原本就已处于困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长期以这种速度或比例流失黄金后还维持黄金标准，哪怕它拥有全世界的黄金。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责怪自己：单方面的恩惠；事先没准备好自我保护措施。我们为自己设计了陷阱，陷阱里的夹子夹住了我们的黄金脚后跟，我们径直走入了自己挖的坑。我们原本可以保护黄金储备免受外国的无限哄抢。但是一旦我们没有事先采取保护措施，这股哄抢势头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后果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所采取的行为。例如，谁能预料到在哄抢美国黄金储备的同时，欧洲会出现贬低美元价值的谣言、暗讽以及宣传造势呢？但是这却发生了，而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再无知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在法国，这种造势是巧妙而又微妙的；在英国，是直率和无情的。当法兰西银行从纽约攫取黄金后，美国金融体系即将崩溃的谣言从巴黎传遍了整个欧洲。法国报纸不停地、异口同声地说法郎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黄金货币。然后法国又传出新闻称，胡佛总统让美国的银

行家们动员美国银行体系的信贷资源，以应对眼下纽约的清算潮流——大多数是欧洲为获得黄金而进行的清算。这一报道传出后，法国那些能带动民意的领军人物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判断，他们说，美国即将发生通货膨胀。人们现在会相信这一观点吗——法郎是世界上最佳的黄金货币？

一时间，在欧洲所有的金融中心，美元贬值了。在波兰，美元几年来一直是标准单位价格，甚至充当波兰货币的保护性货币，现在却出现了美元恐慌。《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在10月9日发电报说：“在巴黎传出美国政府决定放弃黄金标准，华盛顿正在讨论增发美元纸币的消息后，今早，这里的人们立刻开始逃离美元。”一天之内，没有遗忘通胀滋味的波兰人民以1美元兑95美分的价格向华沙银行（Bank of Warsaw）出售了100万美元。这种恐慌持续了几天，接下来他们困惑地发现巴黎传出的谣言是虚假的，这才恢复镇定。

英国造势活动的领军媒体是有着日发行总量达500万份的《陆社密尔报》（Rothemere）。这些报纸日复一日地刊登带有大字标题的社论文章，称美国的信贷崩溃即将到来，同时还劝告人们趁现在还能换黄金，赶紧出售手中的美元以及美元证券。例如：“把你的钱带回英国——美国方面的报道显示事态很严重。因此，现在是出手美元证券，把钱带回英国的有利时刻。”然后还有：“出售美元证券和法郎证券。不要被困在那。当华尔街崩溃的时候，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又一天：“谁是下一个失去黄金标准的国家？——美国的银行业状况未见好转。”诸如此类的报道日复一日，都是采同一种口吻，表达同一种意思。而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还欠纽约3.5亿黄金美元。

整个世界的金融神经处于紧张状态。这些被磨损的神经已经到达了一个爆破点。各种形式的破产隐约可见。在这时候，法国总理必须拜访美国总统，和他一起审查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寻找所有的解决方案。

法国想要什么呢？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它想要什么，甚至还知道一些细节。首先，它想要摆脱欠美国财政部的战债。它希望美国政府能免除这些债务，由美国纳税人来承担这笔债务。而在达到这一目的前，它想要继续从德国获得赔款。因此，它想要拯救杨计划，而德国、英国以及许多美国人在去年夏天的伦敦会议上，尤其是在威金斯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出炉后，就已经认定这个计划失效了。法国要拯救杨计划是由于该计划规定在任何国家重新收取赔款前，德国应向法国无条件地支付一笔年金。它不想让胡佛战债假期被延长到一年以上。它希望从德国收取赔款，然后向美国财政部支付相对小额的战债，正如以前那样。战债假期本来会让它一年损失将近1亿美元，即德国还款减去向美国财政部还债的钱。然而它要求作为德国的主要债主享有特殊待遇，由此它没有损失这1亿美元。由此推出，法国想获得任何能增加它的实力和世界声望的东西。

这些与当前的黄金危机又有什么联系呢？所有这些与黄金危机的联系马上就要浮现了。

当法国总理乘坐轮船驶向美国时，法国的报纸刊登大幅标题宣称这次访问的严重性。突然，一则关于法兰西银行对美国银行体系发出最后通牒的新闻令我们震惊。最后通牒的内容是：法国没有办法继续把信贷余额留在美国，除非美国银行能提高利息率。假如利息率没有上涨，那么法国只能取回剩余的信贷余额。这笔信贷余额价值6亿美元。

下面是《纽约时报》于10月20日早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在美国市场有着6亿美元短期信贷余额的法兰西银行昨天知会纽约银行，当地机构为外国央行存款支付的1.5%的利息率不能令人满意。这家法国货币发行银行表示，假如利率没有提高，那么它将把这笔巨大的美元余额投到别的地方。”

“法国人要求提高利息率，也间接地威胁要用黄金形式取走法国的美元余额，这在华尔街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有些银行家们认为此举是试图向美国市场规定法国不撤资的条款。他们坚称愿意看到法国撤资，并且说，尽管美国最近流失了大量黄金，但它不必害怕法国的此类行为，摆脱这笔没有办法控制的待付款还有许多好处。这些待付款假如不取走也许是非常令人尴尬的。其他重量级银行家们表示，他们相信稍微提高一点利率就能满足法兰西银行，也许提高2个百分点。他们强调这一观点是想指出，我们可以达成易于接受的条件来维持法国在美国的余额。

第一，这笔余额的数目是惊人的。长期以来，法国在美国和英国积累了巨额信贷结余。这笔数目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大大超出华尔街的了解，因为这些信贷余额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

第二，这些法国信贷余额代表着什么呢？除了代表法国储存在美国银行的商业利润外，还代表着美国游客在法国兑换现金的支票，以及德国从美国借的用于支付法国赔款的贷款。这些交易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法国银行用现金兑换美国游客的支票时，它们也就获得了美国银行的信贷。这些在美国银行的信贷属于黄金信贷。因此，法兰西银行把这些信贷视为黄金储备，以此作为担保在法国发行流通货币，好像这些就是手上的黄金似的。美国借给德国用于偿还赔款的信贷也是

如此。德国人把在美国银行账簿上的信贷转给法国，而法国把钱有息地存放在美国银行。

第三，法国作为我们的债务国，它欠我们左边口袋37.5亿美元，而它今年一分钱都没还我们，可它居然要求在我们右边口袋取走6亿美元的黄金，这是多么的扭曲啊！可是它有这个权利。假如它坚持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只能把黄金给它。但是它能这么做是由于美国财政部给予它一年的债务冻结期，一年之内无须还债。

第四，一个国家的央行由于利率太低或者其他原因而警告另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说，必须以黄金的形式取回全部的信贷余额，这是史无前例的。没人能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正常的国际金融状况下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信贷余额是持续转移的。假如纽约的利率比伦敦高，那么信贷余额会自动转向纽约，或者假如伦敦的利率要高点，那么它从纽约移至伦敦，这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不同的是银行数据。

如今，法兰西银行非常明白，我们已经有很多黄金流失到欧洲——其中大部分流向法国。假如我们再突然失去6亿美元黄金的话，那么美国会陷入一个很危险的处境。请注意，假如法国人相信他们在欧洲散布的关于美元和美国金融状况的消息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也相信一次性从纽约取走6亿美元的黄金将会把美国挤出黄金标准。当然，假如美元步英镑后尘的话，那么法国的法郎肯定会成为世上首要的黄金货币，并统治世界金融。

法兰西银行真的说到做到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假如把它的话当作纯粹的金融建议，那么你可以猜测，假如法兰西银行真的想以黄金形式召回6亿美元的信贷余额的话，它不会蠢到提前宣布自己的意图。任何一个小镇上的银行家都不会这么做。因此，事实上，法

兰西银行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法兰西银行在法国的地位等同于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它是金融意义上的法国。因此，事实上是法国在虚张声势，由此事情立刻被抬到政治的高度。

借口对纽约的利率不满，法兰西银行向我们、向欧洲以及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法国几乎有能力把美国的银行体系抛出黄金标准之外！把美元抛向英镑所走的老路！

这是法国总理与胡佛先生在白宫审查世界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所拥有的一张牌。但是这个被暴露的事实没有办法缓解世界各地的紧张态势，也没有办法阻止个人储藏黄金——这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令人害怕的潮流，很有可能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在华盛顿，人们度过了一段焦虑的时刻。公共言论被小心翼翼地审查，被缄口，以防人们大声讲出任何冒犯法国的话语。华尔街该怎么办呢？它能怎么办呢？假如它根据法兰西银行的最后通牒而提高利率的话，那么就是承认了法国的实力。但是假如它拒绝了，那么会发生什么呢？法国真的会取走黄金吗？

但是华尔街只有一句正确的话可以说。假如华尔街当时确实这么说了，那么人们会长久记住这句值得表扬的话。华尔街可以说：“这里是纽约，我们付的是纽约的利率，不管利率是高是低。假如法国想要取回信贷余额，那就来取吧。假如它想要黄金支付，那么黄金将会被准备好。”

非常受人尊重、在华尔街有着《圣经》般声誉的《金融新闻》（Financial Chronicle）称：“此举试图向美国施加金融压力，这是令人憎恨的。它与最近欧洲时不时的政治运作如出一辙。”

美国的银行家们相信，美国不惧怕这种举动，只要美国人自己仍旧处变不惊。我们认为这是我们银行机构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法国在德国金融崩溃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撤出了投资于德国的大量短期信贷，随后外国政府纷纷效仿，也撤走了信贷和存款。那时候外界认为法国的行为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但是后来，它又开始从英国撤走资金，虽然法兰西银行担心也许出现的后果会再一次为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提供新信贷。但是那时候为时已晚，已没有办法挽救英国脱离黄金支付的结局。

“如今，法国以同样的方式想要从纽约撤走巨额资金，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法兰西银行此举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管怎样，此举的后果是在整个欧洲引起了一种不信任感，导致其他重要的欧洲国家也从美国撤回资金，尤其是荷兰、比利时以及瑞士。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应对方式无疑是忽略所有的这些威胁（假如法国真的是在威胁的话），让法国使出最坏的招数，假如它真的如此一意孤行。”

法兰西银行的任何其他说法将会让美国信贷在世界眼中变得一无是处。这种强硬的说法即刻生效，在所有的外国金融中心，美元获得了更高的声望，它的价值也增加了。当我们仔细审查1929年的混乱事件时，也许华尔街那时意志坚定的行为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世界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稳定点。

后来，当法国总理来到纽约时，他手上的牌已经不是原先刚赴美国时的价值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用这张牌来显示法国的宽宏大量。他承诺法国会协助美国维持黄金标准。

10月25日，胡佛总统和赖伐尔（Laval）总理在白宫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有这么一段：“我们尤为相信稳定的货币是重塑世界

经济活力的必要因素。在这过程中，维持法国和美国的黄金标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那么法国会如何为世界的货币稳定做贡献呢？法国又如何帮助美国维持黄金标准呢？这也就是说：在对法国欠美国财政部的战债的重新审查，在杨计划下对德国偿还能力做重新评估时——其中法国是德国的优先债权国，法国将不再对美国的黄金储备做出反常的要求。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在10月26日对胡佛与赖伐尔会谈的新闻报道中写道：“联合声明以谨慎的方式让人们知道，胡佛总统和赖伐尔总理确定两国政府必须合力维持它们的黄金标准。会谈的成果包括赖伐尔总理保证纽约黄金的反常流动会停止；各方应该在现有的杨计划条款下展开对德国赔款偿还能力的重新审查；在杨计划委员会对德国的金融状况作出报告前，美国要延缓调查欧洲债务以确定债务国还款能力的行为。”

在一个国家要取回另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时，使用“反常”这个词是很奇怪的。当一个债务国要取债权国的黄金储备时，这显得更奇怪。而一个债务国居然能通过承诺不对债权国的黄金储备提出反常要求，以此来施惠于债权国，则显得越来越奇怪了。是什么原因使法国能对美国的黄金储备提出反常的要求？

再说，到底什么是反常？赖伐尔先生说的也许是原则上的反常？10月26日，他乘船离开美国。那一天，法兰西银行从纽约取走了2 000万美元的黄金；在星期二，它取走了1 8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在星期三，它只取走了350万美元的黄金。尽管如此，三天内取走4 150万美元的黄金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然而，那时候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扭转。虽然我们仍旧有大量的黄金流失到法国，但是我们再次从外

界吸收了黄金，因为美元最终自我调节，世界对美国信贷的信心上升了。

一个黄金国家就如同一个银行。它首先要对自己负责，要保持自身的金钱、信贷以及资产的完整性。而假如不得不考虑对别人的责任的话，那么无论意图是什么，它最终无力对他人负责，因为它忘记了自己首先要对自己负责。这是唯一的定理。

在去年10月全国处于困境的时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的一名成员说：“这不仅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我们缺少了一些一直都在的元素。整个世界都感觉到缺少了些什么，比如说一块熟悉的岩石、一个不动摇的原则、一个平衡轮，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英格兰银行。英镑的价值很不稳定，每小时都在波动。我们此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到底什么原因使英格兰银行中止支付黄金成为如此惊人的金融事件。英镑不再等同于4.86美元的黄金，不再是衡量所有东西的通用价值单位。如今英镑自身都由别的东西来衡量，比如说美元。那么假设美国遭遇同样的情况，那会如何呢？美元刚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价值单位。假设美元不再在世界上值100美分的黄金，而是90美分、80美分，抑或是70美分的其他东西，比如说法郎，那又如何呢？

长期以来，除了战争时期以外，占主导地位的英镑在任何金融环境下都是通用的价值单位，这为英国带来了每年三四亿美元的收入，其中包括从世界其他地方赚取的银行利润、贴现、佣金、利息和手续费等。美元代替英镑在世界贸易和交流中占支配地位，将为美国带来

每年三四亿美元的收入。或者说，假如法郎获得了这种主导地位，那么法国每年也能赚三四亿美元。

因此你可以看到，仅仅从国家收入上看，美元和法郎间就牵涉一些利害关系。你还可以了解英国失去了什么。同时你还可以理解当英国人说英国离开黄金标准是件好事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仅仅在说英国能及时地吞下这颗苦药丸是好的，因为假如它继续等待的话，那么它失去的财富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如今英国人要更努力地工作，更努力地贸易，更节俭地消费，更单调地生活，直到英国再次具备偿还能力。英国的商品出口将会增加，以下是几点原因：英镑贬值代表着英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变得便宜，换句话说，其他国家的人们手上的黄金货币能在英国买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英国的物价会上涨，但是涨幅小于英镑在国外的跌幅。由于英国的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会降低。因此生产英国商品的劳动力成本会下降，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至少暂时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失去货币完整性的国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的确，你会听到一些英国经济学家说，不是英镑辜负了黄金标准，而是黄金标准辜负了世界。因此，他们称，世界最好用其他标准代替黄金标准，看看是否新标准能运转得更好些。在英国，这是一种新颖的想法，可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这已经老掉牙了——把责任推给货币！假如英国未曾失去黄金标准，它会是世界上最不愿说黄金标准在过去的三年中运行得不好的国家——过去的三年中，这一标准确实一如既往地糟糕地运行着，但它也只是司其本职。假如英国没有失去黄金标准，而其他国家都失去了，那么英格兰银行会说：“这很难接受，但黄金标准就是如此运行的。”这种说法是很冷酷的，也是很自私的，但却是非常正确的。当初英镑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主导

地位的？英镑获得如此声望是因为英国人一向是首先对自己负责，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货币和信贷的完整性负责。事实上，就如同这个定理表明的那样，英国人越对自我责任精心呵护，他们越不会辜负对世界的责任，包括维持平衡轮的正确运转。如此一来，英镑成了稳定的象征，而稳定是全世界的重要财富。

第六章 黄金发明

人类总是追逐自身利益，留下了一地破碎的律法。

黄金标准的真正意义不是在于黄金本身，正如一张纸币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其表面的雕刻图案一样。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契约，我们必须持续忠于契约，一种信贷的契约，而非黄金的契约。黄金是表示这种契约的一种偶然象征。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这种象征，仅仅是因为在长期的经验中，人们发现黄金比其他东西更适合做象征，它仅仅是象征而已。白银也曾充当过象征。1英镑最早是由1磅白银表示的。最早的美元也是白银。然而用白银做象征物时，这种契约还是不变的。因此违背这种契约信仰的后果也是一样的。

黄金的价值是主观确定的，1码  的长度也是如此。但是正如销售时用码来衡量布，用吨来衡量煤炭是必要的一样，我们同样需要主观确定一些价值单位来为1码布和1吨煤标价。假如能用一些绝对不变动的价值来为它们标价当然是很理想的，但是世上没有这种东西。由于黄金供应是稳定的，金属的耐用性好，而且在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岩石中挖掘黄金的劳动消耗也变化很小，基于种种诸如此类的原因，黄金是人类至今发现可用作货币的最稳定的东西，因此人们选择了它。

仅仅作为货币的时候，黄金的量在以前是很重要的。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了。我们用一个小仓房就可以存放世界上所有的货币黄金。然而假如信贷机制和交换机制是完美的，而且人人都遵守契约，人人都

彼此相信，1吨就是1吨，1盎司  就是1盎司，那么事实上这样能服务现代化的各项目的。黄金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延伸性。在两片由牛大肠为原料制作的优质皮革之间，我们可以把黄金挤压至几乎感觉不到的1/300 000英寸  的厚度，这样一个金衡格令  就能覆盖56平方英寸  的面积。

古代金匠的技艺也许让我们十分震撼。更让我们震惊的是黄金在虚构尺度上的延伸能力。人们能通过同样一块温顺友好的金属，打造出一块纯粹虚构的黄金，也可以说是黄金功能，而这种虚构物或者黄金功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无限分割的。这种虚构物或黄金功能的全名就是信贷。这种延伸和分割黄金功能的业务——也就是说创造并释放信贷的业务——是由银行家、银行体系以及政府操作的；这种契约，即黄金标准的真正意义，仅仅是他们的业务，也就是创造并释放的信贷数量应该与他们手上黄金的数量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称为比率。比率是会经常变化的。假如世界上贸易的增长速度比黄金供应的速度快，以致人们对货币和信贷确实存在需求，那么这一比率会被提高。

可想而知，这个比率本身并不重要，尤其是许多债务人想要用便宜的货币来支付他们的债务，或者债权人想要获取昂贵的货币。以下三点是很简单却是很重要的。

第一，必须有一些确定的比率。

第二，应该在所有人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共同决定这些比率。

第三，要坚决遵守这些比率。

而黄金的现代职能是限制那些被故意不负责任地创造和释放的货币以及信贷的数量。

在经济领域中，有条理的信贷发行相对来说是一件奇怪的事。人们持续创造一些新的、试验性的信贷，而且我们喜欢用这些信贷来欺骗自己。我们忘记了任何形式的信贷都代表着债务。我们知道我们会出现一阵阵的狂喜以及群众性的错觉；我们知道在某个时候，人们在诱惑之下会疯狂开动货币机器，通过无限增加债务来让人人变得无限富有，正如1928年和1929年所发生的那样。由于我们对自身有着这种聪明的认识，于是我们在事先制定了一些理性的条件。我们规定，不能让货币、信贷以及债务膨胀到超出与黄金的特定比例，否则我们就要接受特定的令人憎恨的处罚。如若不然，我们还会在将来受到更大的处罚。

只要人们相信信贷，在合理的程度上遵守契约，那么没有人会想要黄金。人们知道什么是虚构的事物。他们也许在阅读银行公布的数据时知道，银行的负债超出了其黄金总量的20倍，可他们不对存款的黄金价值表示忧虑；他们也许在阅读公共财政数据时发现，黄金储备只有现有流通货币总量的1/2或者是1/3，然而他们仍旧会把纸币当作黄金对待。没人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能用黄金来偿还自己所有的债券。然而它的债券仍旧被人们当作黄金对待。假如有人想要黄金，那么他们很自由地可以取走黄金。只要人们遵守这种契约。

难道这正如愚蠢的教科书上常说的，意味着依靠一个虚构的平均法则在冒险吗？不是的。这表示一个十分确定的东西。这代表着假如每种物质财富能用黄金标价，而且把这些东西列在一个库存单上，那

么其总价值会超过人们手上所有的货币、信贷以及信贷抵押品的价值。

但是假设人们的信仰被打碎，假设人们幻想这种虚构的财富是真实的，假设人们不遵守信贷限额，随心所欲地发行信贷，于是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对任何东西标价，没有办法确定它们的价值。

在短期内，所有东西价值的不确定性反而让人们愈加狂喜。人们会标高任何东西的价格，以保证价格是足够高的。然后人们会出现一种错觉，认为东西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少。事实上之所以这些东西变贵，是因为为它们标价的货币和信贷的价值下滑了；之所以它们似乎变少了，是因为人们认为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因此都在购买。突然疑虑笼罩着人们，继而是觉醒之后的恐慌。麻木的通货膨胀已经让黄金代表物贬值了。人们失去了对黄金代表物的信仰。所有人都跑去争抢黄金，因为它是唯一真实的东西。不仅个人要争抢黄金，连银行、偌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和人们一起争夺。这就是金融危机。

上面描述的这些情况都发生了，而它们并不是由黄金标准引起的，而是因为人们对黄金标准的信仰破灭引起的。假如换作其他标准，这种情况也还是会发生。

信仰破灭责任在谁？我们国家没有人该为此负责。美国的银行业是有法律管制的。出台相关法律是由于我们不相信银行家们不会做出破坏自己和储户的行为。因此我们国家监督银行业的法律比任何国家都多。尽管有这么多法律，我们的银行破产数量却也高于其他国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雇用了数千名检查员在全国范围内审查银行的私人账簿，看看它们是否有偿还能力，是否依法行事。法律规定，当检查

员发现银行失去偿付能力时，他们会立刻关闭这家银行。可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银行倒闭了。

我们还假设，银行更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自身的偿付能力。假如不监督它的话，那么它会毁在自己的贪婪之下。因此，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监管。握有专断权的检查员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银行中，接来说：“打开你们的账本。”然后，这些银行就倒闭了。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通过制定法律来避免银行破产。法律为银行用人们的存款从事的风险设定了上限。事实证明，这种法律是最不安全的。一个好的银行家不是因为法律如此规定而不冒险，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另一方面，一个鲁莽的银行家总会找到方法来走他的贪婪之路，不管法律如何。他甚至有办法在合法的前提下从事贪婪的活动。

第七章 债务账簿

“抹去所有的债务。”

——英国首相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这是他在1931年选举演讲中关于战争债务和赔款的一句话。

“这种艰难的工作被滑稽地称为债务偿还。”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这句话出现在他于1932年写的《战债和赔款的真相》一书中，描述的是英国与美国财政部的协议。

在1917年春天，德国人正逐渐走向胜利。珀欣（Pershing）将军在他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中写道：“没人能说德国人对最终胜利的期待是不切实际的，不管是在那时候看来，还是在历史上看来。协约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给养耗尽，它们的军队损失惨重。不但人民对战争十分气馁，而且这支军队中也是如此。”

协约国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它们眼看着信贷就要用完了。

在3月份，那时美国尚未参战，美国驻英国大使向他在美国的兄弟发了一封信。信上说：“我的同事们和我正在问每一个人，美国如何能为协约国的战争提供最好的帮助。人们的观点并不令人吃惊，而是非常有趣。杰利科（Jellicoe）说：提供更多的舰艇、商船，各种各样的船只。巴尔福（Balfour）说：美国的信贷足以维持现有的汇率。波纳·劳（Bonar Law）说：同上。军事人员们说：提供一支远征军，不管规模多小都行，只为达到美国国旗插在欧洲所带来的效果。”

巴尔福说的用足够的信贷维持汇率的意思是，动用一切资源来维护英镑的兑换价值，也就是说维持英镑在其他国家的购买力，最重要的就是维持在美国市场的购买力。美国信贷会带来更多的给养、更多的军需品，甚至能带来杰利科想要的船只。虽然信贷不能带来人力资源，但协约国现在更需要的是信贷。派遣一支小型远征军把美国国旗插在欧洲，哪怕只是一个团，也能提高协约国的士气——是的，这是十分值得做的。但是首先，协约国需要的是信贷。

“他们自己承认，在我们参战的时候，协约国已经才思枯竭，不知道该向谁求救以获取所需给养。当美国打开它的钱库，一切都变了，这带来了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结果。我们的援助结束了战争。我们为协约国提供了无限量的军需品，让它们能继续作战，与此同时我们还招募并训练士兵。当停战协议被签署时，我们大约有200万士兵在法国。在六个月内，在法国的美军数量会翻一番。为了让这些士兵能乘船到彼岸作战，我们从欧洲买了大量的军需品。我们支付这些商品的价格高于我们国内的价格，甚至还要加上海洋运输费，但这是正确的行为，因为这样我们的士兵就可以乘商船到彼岸了。”（摘自哈维·E·菲斯克（Harvey E. Fisk）的《盟国间的债务》一书。该书由银行家信托公司于1924年出版。）

在1917年4月6日，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而不是作为同盟国。直到战争结束，以及在停战期间与和平会议期间一直是在协约国一方。

四天后，筹款委员会在国会提出了第一次“自由债券法案”。它说：“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未有人把如此大的债券发行法案提交给任何一个立法机构。”

这项法案允许财政部以美国政府作担保来向民众借取50亿美元。财政部筹集的这笔50亿美元中，有3/5用于购买相同票面价值的外国政府债券。这些都是与德国交战的国家的政府。协约国急需这笔信贷——这就是战争债务的开始。在两个星期内，这项法案被通过了。

“自由债券”的准备阶段和销售阶段需要耗时，而协约国迫不及待地等第一笔款项。于是，美国财政部通过自己的票据借钱为英国提供第一笔贷款。

这对英国意味着什么呢？驻英大使佩奇于3月4日在伦敦给威尔逊总统写了一封信。他用引人注目的手笔写下了这笔贷款对英国的影响：“我听了国会两院所有关于同意参加战争的演说。虽然演说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却说得很好，说得很到位。他们（指英国人——译者注）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确实想要在他们善意的岛国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善待我们。他们正在改变。我没有办法描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变化。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将变得很温顺。我们对他们的帮助正是时候——确实如此。假如我们没有伸以援手，那么他们的汇率将会很快下跌，他们了解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和巴尔福先生以及波纳·劳一起就此讨论的那个下午。”

由于协约国需要信贷，在后来的法案中，国会又投票决定把“自由债券”筹款中的70亿借给外国政府，外国政府暂时用期票代替债券，以此作为抵押。后来，协约国用债券换票据。那些债券的数量可比拟“自由债券”。美国政府就是靠“自由债券”借的钱。加上上次借出的，国会总共批准的贷款是100亿美元。然而，后来所有的法案都仅仅是增加贷款。人们知道我们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信贷，于是这种交易类型也固定成型了。

从1917年4月到1920年11月，美国财政部借给外国政府的贷款接近110亿美元。贷款主要是以下三方面：

（a）停战前的贷款；

（b）战后贷款；

（c）战后用于救济、重建、清理废墟，以及让欧洲政府能购买大量美国在欧洲过剩财产而出借的贷款。仅仅在法国，美国的剩余财产就达到了4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在停战前直接借给外国政府的现金贷款超过70亿美元，在战后直接借出的现金贷款超过23.33亿美元。

所有的这些贷款都是美国政府通过“自由债券”筹款以及税收筹集的，接下来再转借给外国政府。到目前为止，贷款最主要的部分是来自“自由债券”的筹款。而美国人民仍旧持有未到期的“自由债券”。国会从来没有想过要用美国税收来偿付这些债券。国会想当然地认为外国政府将会还清这些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当这些政府还款后，财政部便可自动偿还相应的“自由债券”。

“偿债基金并未理会美国由于为外国提供贷款而所负的债务。国会认为外国的还款能还清我们的债务。”

——摘自1920年美国财政部长报告，第64页。

“债务人应该笑着还款。”

——古老的箴言。

关于这些美国财政部借给外国政府的贷款的性质，欧洲在战争结束后立刻制造了一个争议。这个争议在战后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越来越带有敌意，越来越混淆事实，越来越带有情感上的抱怨。这些贷款从性质来看是国与国之间正式的交易吗？它们受金融惯例的条款和处罚的约束吗？或者它们需要支付利息、审计、清偿以及令人厌恶的还款吗？在无止境的纠纷和宣传后，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今都是否定的。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解读这些贷款的呢？

假如答案存在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能在下列事物中找到：

（a）在法律中；

（b）在合同中；

（c）在借贷者当时的态度中，假如借贷者的态度有人记录的话；

（d）在借贷者对贷款的用途中；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借贷者是否在花这些贷款的时候有还清本息的打算，认识到对贷款有着全部的无限责任的，还是其他情况。

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

《自由贷款第一法案》（First Liberty Loan Act）第2条规定：

“为了更有效地加强盟国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更有效地作战，美国愿意为外国政府提供贷款。因此在总统的同意下，财政部长被授权代表美国，以平价从与美国的敌人作战的外国政府手中购买在此以后发售的债务。这些债务与美国在本法案授权下通过的债券有同等的利率，包含同等的条款和条件。”

在把这项议案提交国会时，国会筹款委员会发表了全体委员通过的声明：

“这项议案批准用（自由）债券的销售所得来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利率以及条款和条件都与该法案批准的（自由）债券一致。这项议案规定，假如用美国（自由）债券购买的外国债务被转换成有更高利率的美国债券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持有的外国政府债务应该被转换成拥有与上述美国债券同等利息率的债务。因此，被提议借给外国政府的30亿美元债务将会自己照顾自己，不会在将来成为需要用美国税收来支付的债务负担。”

在该议案的辩论期间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其中一个反对的声音是：我们提议平价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然而它们的债券已经以折扣价出售。关于这个问题，筹款委员会主席是这么回答的：“假如它们的债券跌至原有价格的80%、75%或者是50%，那么我们更有必要以能力范围内最低的利率为它们提供这笔贷款，因为它们正对我们的战争事业做出贡献。”

另一个反对的声音是：这项法律没有在贷款的用途方面限制借贷者。比如，它没有要求借贷者在美国使用这些贷款，也没条款防止借贷者用美国财政部借来的钱去偿还其在华尔街的债务。关于这一点，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回答道：“为什么要阻止它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力，选择最利于战争胜利的方式来花费这笔钱呢？”他说道，它们需要把大部分的钱花在美国，至于它们是否会用这笔钱来偿还华尔街到期的债务，他还没想到答案，但还是说：“为什么限制或限定这笔钱的用途呢？”

在辩论中涌现了许多感人的语段，这是意料之中的。那些对贷款的安全过于担心的人会被其他人指责。那些人会说，我们考虑的不应该是贷款安全问题。一些人不停地说借贷者正在为我们的战争而战。对此，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绅士说道：“有人说我们提议用债券所得为它们提供贷款是因为要奖励它们‘为我们的战争而战’，我不认同这一看法。我的观点是这些外国政府是为自己战争而战，我们只是帮助它们。我们为这些国家提供贷款，这是在援助它们，而它们却没援助我们。”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绅士说，他希望能在法案中写入“宽容和免除任何由美国政府购买的法国债券”。大家赞扬了这种情感。

参议院的辩论也是这种情况。

事实是，国会没有把这笔贷款当作礼物或补贴的提议，也没有把这笔钱当作严格本息俱还的贷款。然而上面引述的这项法案在国会两院全体通过，变成了一项法律。

所有的相关合同都是正式的。然而，这些合同与这项法律有所偏差。法律规定，我们要用与美国政府为筹款销售的“自由债券”相同的条款和利息来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但是当时没有时间准备外国债券，由此美国政府接受外国政府用它们的期票代替债券。期票如下：

“（国家名称）政府为偿还收到的价值，承诺会支付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在美国有要求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美元数字），从今天开始，每年支付（空白处）%的利息……根据美国国会的法令条款规定，这张单据将会由（国家名称）政府以平价转化为（国家名称）政府可兑换的黄金债券，利率将会被调高，假如美国的财政部长有此要求的话。”

（由美国代表签名）

“写给（国家名称）政府”

日期为某年某月某日。

当美国财政部于1920年11月停止直接提供现金贷款时，它手上的此类期票面值将近有100亿美元，分别由11个外国政府签署。以下是本金：

大不列颠：4 277 000 000美元

法国：2 997 477 000美元

意大利：1 631 338 987美元

比利时：349 214 468美元

俄罗斯：187 729 750美元

至于借贷者的态度，在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从未表示这些条款是苛刻的或者是吝啬的，或者说这些贷款不是严格金融意义上的需要俱还本息的贷款。那时，法国公开拒绝特殊待遇的建议，拒绝以礼物或补贴的形式为它提供贷款的想法。

1917年4月11日，《自由贷款第一法案》在国会待审，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绅士说他希望能在该项法案上写入一些“宽容和免除”法国方面贷款的条款。与此同时，美国驻法大使在巴黎给在华盛顿的国务卿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

“（法国）总理私人向我表达了他的想法，他不希望在（美国）国会提出或辩论任何关于美国向法国政府提供馈赠贷款的决议，然而法国人民会对这些提议背后的友好情谊表示感激。”

还有更多表达同样意思的记录。巴黎《晨报》发表了法国总理和法国驻美大使间的电报往来，内容如下：

“外交部，巴黎1917年4月12日

“我刚刚与美国财政部长就我方的金融需要举行会谈。他对每月133 000 000美元没有异议。加上我们在美国之外开支的费用，总共218 000 000美元在他看来太高，但是我们也许还是有获得这个数目的……

“至于还款的条款，我提出（假设这是可取的）15年期限。麦卡杜（Mcadoo）先生没有反对。

（署名人）贾瑟兰德”

“1917年4月17日

“我会尽最大努力争取25年的还款期限……我以前以为15年还款期是令人满意的。

（署名人）贾瑟兰德”

“巴黎，1917年4月19日

“法国大使，华盛顿

法国总理坚持要求还款期应为30年，在此类贷款中，这是最快的正常还款期。

（签署人）里伯”

在这些颇具争议的条款中，法国确实受到了特殊待遇。事实上，它只需要偿还战后的贷款就行了，而还款期不是法国人自己建议在这种贷款中最快的30年正常还款期，而是用62年替代了。

在美国作为协约国参战后，英国和法国很快就派代表团来美国讨论合作事宜。英国代表团团长是亚瑟·J·巴尔福（Arthur J. Balfour），他是英国外交部长和前总理。他来谈论的是外交事宜。与他一同到来的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坎利夫（Cunliffe）勋爵。他负责财政事宜。法国代表团团长是司法部长维维安尼（Viviani），和他一道的是他的助手兼金融顾问西蒙（Simon）先生，他是法国检察长。这些代表团首先要谈的是财政。

为了销售“自由债券”，美国财政部于1917年发表了一个受欢迎的长篇声明，阐明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要把“自由债券”所得借给外国政府以及这些贷款的意义：这笔钱不是奉献给协约国，也就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是把钱借给它们，它们最终会偿还全款。这是毫无疑问的，协约国的还债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协约国急需现钱。假如这些贷款能起到支撑协约国的贸易和商业的目的，那么将会更好。对我们来说，帮助协约国支撑它们的工业活力和商业繁荣是明智的经济政策。这使作为参战国和债务国的它们变得更强大。

外国代表团由衷地认同这些观点和表述。他们毫无疑问是非常真诚地同意的，每个人都是。这些都被记录下来了。

“财政部要求外国政府陈述贷款的用途，以便它能判定这些用途是否与《自由贷款第一法案》所规定的一致，是否该提供信贷以及该提供多少。当然，财政部并没有为外国政府的这些用途埋单。它只是把债券的购买价借给它们，这些用途的开销是它们自己出的。”

——财政部长1920年年度报告，第69页。

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财政部看来，几乎所有能提高协约国士气和繁荣的，甚至是它们工商业上的繁荣，都被认为是相关用途。这就涉及协约国到底是如何花费这笔钱的——好像因为协约国打算将来偿还本息就可以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似的。

在美国财政部长1920年的年度报告第340页中出现了下表，是对它们贷款花费的概括。

开 销	
为自己的政府购买军需品	2 493 610 325美元
为他国政府购买军需品	205 495 810美元
汇兑以及购买棉花	2 644 783 870美元
谷物	1 422 476 706美元
其他食品	1 629 726 803美元

香烟	145 100 821美元
开销	
其他物资	613 107 429美元
交通费	136 083 775美元
船运费	173 397 084美元
还款	1 872 914 604美元
利息	730 504 177美元
债务到期还款	648 246 317美元
救济金	538 188 330美元
购买白银	267 943 389美元
为北俄罗斯提供食品	7 029 966美元
从中立国购买物资	18 718 579美元
由于美国在意大利消费而产生的特殊信贷	25 000 000美元
其他东西	168 530 576美元
总开销	13 740 858 551美元
扣除	
美国偿还欠其他政府的信贷	1 872 914 604美元
美国政府用美元购买的外国货币	1 490 557 908美元
卢比信贷的收益以及来自印度的黄金	81 352 908美元
总扣除额	3 444 824 623美元
外国政府报告的净开销	10 296 033 927美元

它们确实用美国财政部的美元来偿还欠华尔街的贷款。这些贷款是它们在美国参战前与华尔街私人银行家签下的贷款。这就是上表中“债务到期还款，648 246 317美元”一项的解释。

“利息，730 504 177美元”这一项代表着它们用新期票所得支付美国财政部持有的期票利息。也就是它们借钱来支付先前贷款的利息，接下来谨小慎微地继续以这种方式支付利息，只要贷款继续被提供。当财政部停止提供贷款时，它们也就停止支付利息。本来，在一些临时情况下，用借来的钱来支付贷款利息在金融领域是可以理解的。提及这一点是为了进一步表明当时借贷者们的态度。这些交易在严格意义上讲是属于金融范畴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解读的。

“还款，1 872 914 604美元”一项代表着一个外国政府从美国财政部贷款，接下来还款给另外一个外国政府。白银是为印度买的。其他一些开支项可以自我解释，只有其中最大的一项例外，那就是“汇兑以及购买棉花，2 644 783 870美元”。

评论这一项时，财政部长在其1920年年度报告第71页中说道：“在战争初期，英国所有的商品购买由此与外汇混合在一起，除了军需品和糖的购买。因此，英国开支表中的外汇项反映了从（英国）政府控制下的地区购买小麦、食品、棉花、皮革、石油，以及私人购买者在美国的所有交易。”

任何谈及外汇事项的财政部报告或者银行家报告肯定都会使用术语。这不是因为金融人士喜欢用术语，仅仅是因为他们通过术语能更了解对方。但是事实上这些术语蕴含的意思都是很简单的。当巴尔福勋爵对佩奇大使说当前迫切需要用足够的美国信贷来支撑外汇时，他是指支撑英镑的购买力。记住，自战争开始以来，英国就一直充当协约国的银行家。就英国这个角色对协约国所发挥的作用而言，英国除了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外，英镑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再者，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英国银行家是最精通外汇行业的从业人员。

英国银行家们做的，尤其是在财长提到的“战争初期”，即在美国参战初期所做的是：他们不是用美国财政部提供的美元贷款直接购买美国商品，他们用这些美元在纽约交易市场购买英镑（或者，银行家们会说英镑汇兑，事实上是一样的）。一方面，他们用美国财政部的美元来创造英国信贷；另一方面，他们用这些信贷来购买美国商品。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要用美国的美元来购买英镑汇兑，又以此创造英国信贷来支付，而不是直接用美元来购买美国商品呢？答案是，因为这样他们就能继续用英镑控制国际汇兑，维持英国信贷的力量。这些优势是非常重要的。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英镑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兑换价值和购买力至少超过自身实际价值的1/4。有了无限量的美国财政部的美元支持后，他们把英镑与一人造价值“挂钩”，也可以说是稳定在这一价值上。这样，在世界各地，假如英国人需要支出英镑，那么他们用英镑兑换的钱会高出本身价值。当美国政府在伦敦购买英镑来支付其在英国所花费的战争费用时，或者用来支付英国船只把美国士兵运送到法国的费用时，它要支付的费用大大高出实际费用，而自己收回的钱却又大打折扣。最后，通过把这些交易归入汇兑项目下，他们只需向美国财政部报告说有这么多钱被用于“汇兑”就行了，如此一来，他们在汇兑后的钱的使用上有了更大的自由。

“显然，想要完全分析汇兑的购买总额是不可能的。”

——财长1920年的报告第72页。这句话上面的标题是“外国政府报告的开支”。

正如财长所说的一样，财政部所全部了解的仅仅是“英国开支中的汇兑项包括购买英国政府控制区内的小麦、棉花、皮革以及石油，以及个人购买者所进行的全部交易”。这就代表着利用美国财政部的

美元在纽约外汇市场创造的英国信贷不仅被用于为英国政府购买美国商品，而且在未知的领域，还被用于为英国私人购买美国商品。换句话说，后面一项是被用于私人账户而不是公共账户。只有当我们认为在这种战争情况下，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包括这些私人贸易时，私人账户和公共账户的差别才被缩小。事实上，美国财政部在其受欢迎的解释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要把“自由债券”所得借给外国政府的公告上所表达的正是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下，我们该关注的问题不是外国政府如何花费贷款，而是我们能借多少。

“成千上百万美元（‘自由贷款’金额）在战争停止后被借给英国，使其能重建出口贸易。这些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同时（美国）还为新建国家提供大量贷款，以帮助它们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这也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摘自哈维·E·菲斯克（Harvey E. Fisk）的《盟国间的债务》一书，该书由银行家信托公司出版。

这些在当时都是没问题的。无论借贷的外国政府如何处理美国财政部的美元都是没问题的，从来没人对此提过异议，只要它们继续用原先大家所理解的概念来对待这些贷款，即这些贷款是需要偿还的。但是当战后它们开始宣称这些贷款与金融交易唯一的相似点是在法律形式上。在它们发动由英国领导的有组织政治宣传后，只要人们说英国人把美国财政部的美元用于纯粹战争目的以外的其他用途时，英国人就会感到很愤怒。

在1926年7月14日，时任财政部长的梅隆先生给美国一位呼吁取消债务的人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解释了是什么原因使在偿还条款上英国受到的待遇没有法国那么优厚。他在信上说：“我们必须记住，

英国把很大一部分的美国贷款用于纯粹的商业目的，而不是战争目的，包括偿还在美国到期的商业债务，为印度提供白银，购买食品后转售给英国民众，以及维持汇率。”

对此，英国财政大臣于1926年7月19日在议会中发言称：

“在美国参战期间，英国在美国的开支超过70亿美元。在这70亿美元中，有40亿是我们借来的，而另外的30亿是我们从自己独立的资源中获得的。关于商业到期债务，财长梅隆要么是被外界误读了，要么是被误导了……人们对这些贷款怀有憎恨和不满，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事实的误解会增加这种憎恨情绪，这是很不应该的。”

作为回应，第二天，也就是7月20日，美国财政部发表了以下声明：

“从英国报告的1917年4月6日—1920年11月1日在美国的开支总额中，有 1 853 000 000美元应该被扣除。在这笔开支中，英国仅仅是充当其他盟国的购买代理人。其他盟国是用从美国借来的贷款支付这些开支的。这笔钱不是来自英国‘自己的独立资源’。扣除后剩余 5 366 000 000美元。在这笔钱中，有1 682 000 000美元代表‘汇兑和购买棉花’。这笔开支余下的更大的那部分开支用于维持英镑汇率，不是用在美国，而是让英国能在其他国家以估值过低的汇率进行购买。然后，2 643 000 000美元被用于购买食品和香烟。其中一部分食品和香烟很可能包含在盟国付还给英国的开支费中，一部分是被英国转售给英国民众。由于转售数量巨大，英国无须在本国发行债务。然后是507 877 000美元用于支付英国在美国到期的商业债务本息，261 000 000美元用于购买白银。美国在战后借给英国的本金是581 000 000美元。”

于是，英国财政大臣缓和了语气。下一个提出批驳的是英国财政部。这不是基于事实上的批驳，而是关于对事件的解读上。它说：

“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提供英镑和中立国货币来支付其自身的需求，此外，还要背负其（欧洲）大陆盟国的英镑需求。假如美国早点参战来缓解这些额外的负担，英国就能利用支撑盟国的资源来支付其自身在美国的开支，如此一来，英国绝对不需要向美国举债。”

英国财政部想表达的是，假如美国财政部先前能为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提供贷款，使它们能在英国消费，那么它们就不必在我们参战后，再在英国借取任何东西了。它们原本会用来自美国的美元在英国消费，这样当然就会大大缓解英国的状况。

“最后一声拒还债务的声音是一种诉求：在现代民主条件下，政府依靠人民存在，也必须依靠民众在政府连任的选举中投票才能继续存在。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同意把偿还战债的重负压在它的人民身上。对此，我只能说假如政府的真诚被人民的背信所吞噬，那么这个世界即将面对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幻灭。”

——班布里奇·科尔比（Bainbridge Colby）。

科尔比曾任威尔逊内阁国务卿，这是他在1932年4月13日反对取消债务的演讲中的发言。

“在停战前，关于各国全面调整所有战争债务的问题并没有出现。最初，这问题是由英国财政大臣向（美国）助理财政部长克罗斯比（Crosby）非正式地提出的。当时在欧洲的克罗斯比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一建议显然被暂时放弃了。”

——摘自财政部长1920年年度报告，第63页。

这一句“显然被暂时放弃了”证明了财政部在算术领域之外的准确用词。对债务国政府来说，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微妙的。它们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对抗美国这一共同的债权国。让美国同意债务国根据自己的能力还债的最佳方式是让它立刻加入一个全面的战债取消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由于美国是最终的债主，因此它将是最终的输家。它们要趁现在美国人非常大方的时候，立刻提出这一计划。假如可能的话，可以把这一计划嵌入和平条约中。但是，它们仍旧在战后借着美国财政部的美元贷款。假如它们操之过急，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许会突然变得很现实，接下来合上账簿不再借出。

在1919年1月15日，法国驻美高级专员给财政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由于战争，盟国间的财政变得十分密切。英国和法国政府都从美国借贷过，但是法国同样也是英国的债务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又都从美国借贷过，但是意大利同样也是法国的债务国。虽然法国是美国和英国的债务国，但是它为盟国提供了约100亿法郎的贷款。我国政府认为，假如将来在调整这些共有账户上制定不同的协议的话，那么也许一些国家会受到优待，另外一些国家则受到损害……简言之，法国政府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所有的盟国，因此要求开展全面且同时进行的债务偿还。”

对此，财政部长回应道：

“我同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协约国政府对同一个外国政府提供过贷款的情况下，哪个政府都不能在还款上寻求不公平的优先待遇或

者寻求相对于其他政府的优势……除了美国，只有英国对法国提供过贷款，因此我不认为两国的财政部在达成公平无歧视的还款协议上存在任何困难。”

几天后，在金融起草委员会（Financi Drafting Committee）的一次会议上——由巴黎和会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任命成立，美国财政部听到法国的委员会成员克洛茨（Klotz）先生支持一项提议，那就是把合并并且重新分配战债这一问题搬到和平会谈的桌面上。助理财政部长在1919年3月8日的一封信中询问身在华盛顿的法国助理高级专员是否确有此事。信中说：“你将明白，假如协约国政府为了支持任何计划而在对美国财政部的到期偿还上创造不稳定性的话，那么财政部不会考虑继续向任何协约国政府提供贷款。”

法国助理高级专员回应说，这是意大利人在巴黎提出的建议，金融起草委员会中的法国成员仅仅是出于礼貌，而没把这个建议抛出窗外。“而且，”他说道，“关于法国官员对此问题所涉及的原则的态度，法国政府从未宣布要支持意大利的建议或者任何相似的提议。”

财政部长1926年的年度报告第66页中重印了美国财政部与法国助理高级专员在1919年间的这种信件往来，而且附加了一段不客气的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助理财长拉思伯恩（Rathbone）在1919年3月8日写给法国助理高级专员德·庇雷（De Billy）先生的信中表示，假如协约国政府为了支持任何计划而在对美国财政部的到期还款上创造不确定性的话，那么财政部不会考虑继续向任何协约国政府提供贷款。德庇雷先生在其1919年3月8日的回复中移除了关于还款的不确定性。在1919年3月18日后，美国向法国提供的现金贷款总计 690 000

000美元，此外在战争债券的购买上，法国还欠下美国 407 000 000美元的额外债务，合计总额约1 100 000 000美元。”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人再也没有表达什么意见。而继续发表意见的是英国人。

在美国人看来，有两封值得注意的信件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了，但却非常发人深省。其中一封是助理财长诺曼·H·戴维斯（Norman H. Davis）在1920年2月23日写给总统威尔逊的信函（此信于1921年12月6日被重新打印在参议院86号文件中），信的内容如下：

“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怀疑英国借给法国和意大利的贷款与我们借给协约国的贷款不是同一级别的。我记得劳合·乔治先生曾告诉我，英国没有办法强迫这些国家归还债务。《伦敦条约》第11条规定：‘根据意大利的国家实力和战争贡献，它应该享有一笔相应的军事贡献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它很有可能与英国政府持有的意大利政府债务有直接的联系，很可能是英国人想要各国全面取消政府间的债务，以此来撤除秘密的条约条款。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英国人也许会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来免除它们在条约中的债务。”

另一封信来自尊敬的奥斯卡·F·克罗斯比（Oscar F. Crosby）。他在担任助理财长期间，在美国和欧洲密切地接触这些事务。英国的财政大臣正式向他首次建议合并战债。基于他在欧洲的经历，克罗斯比先生写道：

“欧洲各国间的关系很复杂，绝不简单。金钱考虑、领土转让、商业特权，所有这些一直都在变化。在盟国间，贸易是最重要的事务。贸易问题在战争前很久就已经长期出现了，而且在战争中继续浮

现，最活跃的是在和平谈判上，也许这个问题在战后多年的调整期中会继续存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金钱问题仅仅是两国间许多问题中的一个。法国绝对会用上每一项政治资产和物质资产，法国可以在十分合法的贸易过程中获得这些……虽然英、法还在这些事务上纠缠，但是英国很可能不等冗长的结果出现，决定作出慷慨的举措，即提议取消法国的债务，只要美国也同时取消它的债务……假如我们拒绝此类提议，那么对英、法两国街上的行人来说，我们扮演的又是铁石心肠的角色，等等。”

这番陈述十分准地预测到了著名的巴尔福照会的内容。英国的债务政策就是以巴尔福照会为基础的。

取消战债成了和平会谈桌上一个被禁止的话题。然而尽管如此，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们用所有旁敲侧击的形式提及这个主题。在和平会谈后，其中一个代表布莱克特（Blackett）先生于1920年2月4日在给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的信函中写道：“正如你所知的，（英国）财政大臣表示随时愿意采取措施缓解外国政府欠英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美国也可以就其所持有的外国政府债务提出此项建议。”

然后在1920年2月9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向美国财政部传递了一份直接来自英国财政大臣的消息。他在消息中坦率地说：“我们十分欢迎全面取消政府间的战争债务。”

对此，财政部长在1920年3月1日的回复中有以下这段话：

“当然，我了解全面取消此类债务会对英国有利，而且英国很可能不会有任何损失。由于在这种计划下，美国政府根本没有可以被取消的债务，因此结果会是，鉴于美国政府取消所持有的英国政府和其

他盟国政府的债务，英国政府将免除法国、意大利、俄国以及其他盟国的债务。这种提议并没有让相关国家相互作出牺牲。作出贡献的主要是美国……这个提议中的全面取消债务将……把债务利息压在我国人民的肩膀上，而且也会让我们最终失去借给盟国政府的贷款本金。我国从未从这场战争中寻求或得到巨大的好处。而相反，协约国虽然损失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但却通过和平条约及其他途径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人口、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因此，假如考虑到全局所有的情况，协约国不应该也没有理由让我国政府继续作出贡献。”

如此一来，英国财政部和美国财政部陷入了僵局。进一步的交流也是徒然的。下一个阶段则是更高级的。在1920年8月5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先生给威尔逊总统就债务问题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想在信中和你谈论另外一个问题，即盟国间债务这一棘手的问题……在过去的四个月中，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一直在讨论是否为德国的赔款设定一个确凿的数目。英国政府坚信，把德国的赔款设定在德国的合理偿还能力之内是至关重要的……艰难地说服国内民众后，米勒兰（Millerand）先生认为自己可以接受这个想法，但是他指出假如法国欠盟国的战争债务没有受到同等待遇的话，那么法国是不会免除自己持有的债务的。在英国政府看来，他的这个声明是非常公平的。但是在一番仔细的斟酌后，英国政府最终认为，英国不可能免除法国所欠的债务，除非这笔债务免除是盟国间债务全面清偿的一部分……据此，英国政府已告知法国政府，它将同意任何削减或免除盟国间债务的公平协议，但这种协议必须全面实施……我非常欢迎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提出的任何能让美国政府与盟国一道考虑和解决整个问题的建议。”

这也许是整个记录中最重要的一個文件了。英国首相表示法国将同意让德国支付其合理能力范围内的赔款额，只要法国的债权国们免除法国的债务。而英国政府认为法国的想法非常公平，只要美国政府免除英国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

威尔逊总统于1920年11月3日回复了英国总理，内容如下：

“为了让英国政府部分或全部免除法国或其他盟国欠它的债务，美国要同意免除所有的英国债务，美国国会或民众同意这一想法的可能性很小，也不大可能会同意通过免除或减少任何盟国政府欠美国的债务，来让各国对赔款制定现实的解决方案……美国政府……无法理解这一建议的逻辑。在这个建议中，事实上要么是美国为德国的还款部分埋单，要么美国要为盟国政府提供好处费，以便让它们设定德国力所能及的赔款数目。”

威尔逊总统的这封信发出后将近两年内，官方再也没有谈及这一建议。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政治和经济论断没能达到效果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宣传，其宣传力度和造成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在欧洲的媒体中，在美国的媒体中，在受到政府补贴的书籍中，在公共演讲和议会演说中，欧洲来访者在美国的演讲中，所有这些都包含这种宣传，而且都达到了同一个效果——假如说这不是出于有组织有预谋的意图的话。这些宣传掀起了针对美国的一股受伤情感的浪潮：美国是一个“夏洛克”国家，坚持要求收回其借出的美元价值，不顾欧洲为了共同的事业而牺牲的生命。而在他们宣传的同时，美国财政部内的欧洲本票却在渐渐失去价值。债务国政府无视这些本票。这些本票也没根据合同被转成长期的债券，它们也没支付一分利息。

突然，在1922年7月，所有在欧洲蓄势待发的反美情绪被聚集在著名的巴尔福照会中。照会中的文学风格以及方言的微妙使用使其足以成为英语政治报纸中典型的蛊惑民心的政治招数。

当时，巴尔福勋爵担任外交部代理外交大臣。他把他的照会递交给法国，接下来分别递交给每一个英国的债务国。他告诉这些国家，英国政府支持的政策是“放弃它们那份德国赔款，一次性抹去所有盟国间的债务”。如今，英国经过“极度的勉强”以及在“厌恶”之后，不得不采取另一个政策。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美国政府要求英国偿还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如此一来，产生连锁效应，英国“很遗憾地被迫”要求它的债务国们偿还债务，但是它仅仅要求债务国们偿还足够让它支付美国的数目。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提议，”巴尔福勋爵说道，“让我们的债务国们支付大于我们支付债权国的数目。虽然我们不要求多付，但是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不愿意被少付，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虽然有时候被忘了）我们的债务是为他国借的，而不是为自己借的。”

接下来他解释了是什么原因使英国会为他国而负债于美国财政部，而不是为自己。原因是“美国坚持（假如形式上没有坚持，至少本质上坚持了）虽然我们的盟国需要贷款开支，但是只有在我们担保的前提下，美国才会提供贷款”。

这样，这种思想被重重地印在欧洲人的脑海中：要不是因为美国政府要求还回美元贷款，德国就不用支付赔款，一个政府就无须向另外一个支付战债。与此同时，这个思想也向所有英国人灌输：英国欠美国政府的所有债务都是因为美国政府在战时要求只有在英国作担保的前提下，它才向盟国提供贷款。

美国对巴尔福照会的反应是深深的震惊。美国驻英大使在“朝圣者晚宴”上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相信英国政府会消除巴尔福勋爵所引起的误解。对此，英国政府保持沉默。但是巴尔福勋爵在一次公共演讲中回应了这位美国驻英大使，他说道：

“据我所知，美国大使把这次伟大战争中盟友间的融资安排当成是许多个可个别考虑、个别解决的独立项目……我自己倾向于少用一些商业化的眼光……我无意批评那些与我观点分歧的人，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的意见是，假如真的像我设想的那样，那种观点（指美国大使的观点——译者注）在所有与我相左的观点中第一个代表美国民意的，那么美国在执行其不容争议的合法权利时也许更会伤害我所乐见的两国人民间的甜蜜关系。”

至于巴尔福勋爵声称的英国是为他国而负债于美国，而不是为自己，这种说法仅仅是英国财政部原先理论的一种进化版，即假如美国财政部先前为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其他盟国提供所需的美元贷款使它们能在英国消费，那么它们就无须向英国借更多的贷款了；相反，它们能用美国贷款在英国购买商品，而英国将有更多可以在美国消费的美元了。

在1923年3月9日的一份给美联社的声明中，作为战争时期的财政部长，尊敬的奥斯卡·F·克罗斯比说道：“巴尔福勋爵说：‘我们向美国政府解释过，我们有办法筹到用于购买战争物资的所有美元，无须向美国或任何国家借款。’我确定我当时没有听说过此类声明。”

至于巴尔福勋爵声明中所说的“美国坚持（假如形式上没有坚持，至少本质上坚持了）虽然我们的盟国需要贷款开支，但是只有在我们担保的前提下，美国才会提供贷款”——事情绝非如此。美国财

政部的政策是要单独向各个外国政府提供贷款，让它们用于自我的安全防御。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巴尔福自己都忘了，在他把这些误解写入他那著名照会的18个月前，英国财政大臣在接受下院的质询（1921年2月22日）时说：“我们没有担保任何美国借给外国政府的贷款。”

唯有在英国（也许还是世界）经济报刊中排名第一的伦敦《经济学人》杂志诚实地（于1925年2月14日）说道：“巴尔福照会试图让人们觉得我们欠美国的债务不属于战争开支中可偿还的那部分，照会中用两个错误的事实来支持这一说法。第一个是我们借的美国贷款不是为自己所用，而事实上这些贷款主要用于为我们的民众提供食物；第二个是美国不愿意直接借钱给盟国，而是先把钱给我们然后转借给它们，而事实上美国借给了欧洲盟国13.15亿英镑的贷款，而借给英国的是9.4亿英镑……我们欠美国的贷款与其他战争开支没什么两样。”

但是巴尔福照会所引起的情感能量是十分巨大的。假如说巴尔福鄙视美国的这些功绩的话，那么他更鄙视金钱、汇兑以及始终如一的品性，因为正是亚瑟·詹姆斯·巴尔福在1917年对佩奇大使说，他们最需要的是用足够的美国信贷支撑英国的汇率。如今，当这些都已过去时，现在身为代理外交大臣的巴尔福勋爵说：“的确，许多盟国间要么是对方的债主，要么是债务人，要么互欠债务，但是其间涉及的远不止这些。它们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是盟友，而且现在在处理善后事务时也是盟友。它们借进了债务，它们借出了债务，这些都不是为了某一些国家的个别利益，而是为了它们所肩负的共同事业，而如今这项事业基本上被完成了。”

“把这项伟大事业中的金钱部分单独列出来看待，把它从历史背景中拆分出来，仅仅把它看作借方是贸易者，贷方是资本家的商业交

易，这对那些慷慨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出于国家的某些原因，有可能是必要的。”

这一段话在美国造成了无穷的反响。随后，英国的政论家们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巴尔福主题，比如杰出的 J·M·凯恩斯（J. M. Keynes）所作的以下表述：

“只要美国把物资和军需品运送给盟军士兵使用，它就为此收费，而这些费用就是最初我们欠它的债务。但是当后来美国也派出自己的军队时，自己使用这些军需品时，美国没让我们付费。显然，让我们欠美国这笔债务是没有多少逻辑可言的，这不是因为它能对我们提供如此多的帮助，而是因为它最初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就人力资源而言，它最初给的帮助太少了。”

这些话语在许多美国人身上达到了想要的效果，包括一些对事实不熟悉的美国人。

事实上，假如说全面取消战债有任何合理的依据的话，那么只有一个，那就是巴尔福勋爵在其高尚的演讲中所说的这在原则上是一项共同的事业，一项在当时和未来超越金钱、超越战利品、超越利益的事业，所有相关国家也是如此看待这项事业的，只有美国除外。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感到羞愧。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战争结束前，没人暗示说这些贷款会被视为补贴，或变成对一个共同事业的贡献金，又或者是会成为战后全面取消的对象。”

——摘自财政部长1926年年度报告，第60页，内容标题是“外国政府的债务”。

在战争期间，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盟国们发现在相互的国家进行大量开支是必要的。在我们参战前，它们之间的规则是，在能力范围内相互提供贷款，然后每个国家用这贷款在债权国内消费。

这样，英国向盟国们提供英镑贷款，以满足它们在大英帝国的开销。法国向盟国们提供法郎贷款，以满足它们在法国的开销，等等。结果是，在战争之后，所有的国家都互相负债。然后债务和债务间会抵消，只要简单地弄清楚账簿中的贷方和借方即可，接下来只考虑净余额。

当我们参加战争时，美国财政部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它开始向盟国们出借它们所需的一切费用——在食品、军火、物资以及服务方面。但是在另一方面，盟国们没有对我们也实施这一原则。为了支付我们在大英帝国的战争开支，我们不得不用现金购买英镑。为了支付我们在法国的巨额战争开支，美国财政部不得不用现金购买法郎。在意大利也这样，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情况。美国那时向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提供贷款，好让它们能支付在美国的开销。与此同时，它还用现金购买英镑、法郎、里拉等，好让我们支付在相应国家的消费。此外，我们用更高的成本购买英镑和法郎等货币，因为在纽约交易所市场上，英国人用从美国财政部那获得的贷款把英镑维持在一个人为的价值上，法国也用法郎做着同样的事情，虽然规模要小点。

“美国并没有借入英镑、法郎或者是里拉，去支付其在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消费。我们的财政部不得不购买这些货币以供国外的军队使用。我们从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政府手中购买了英镑、法郎和里拉，接下来在美国用美元对它们进行支付。”

——摘自助理财长拉思伯恩1926年年度报告，第61页。

“我们用数亿美元在法国和大英帝国购买物资和服务。我们必须用法郎和英镑支付它们。我们不能用信贷方式获得这些法郎和英镑，我们是用现金支付它们的……换句话说，我们用现金支付必要的物资和服务，使我们能够为共同的事业做出贡献。我们的盟友们在美国用信贷的方式购买物资和服务，使它们能够为战争做出它们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在战争结束时成为每个国家的债主，而没有负债于任何国家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被敦促取消这些债务，因为据说这些债务是为共同事业而欠下的。国内外没有一个人认为假如这样做了，我们能要回在法国和英国花费的美元，以便让我们使用的这些物资和服务也变成对共同事业的贡献……我们当时提供美元贷款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法郎和英镑维持在它们的正常价值上下。换句话说，我们向盟友们提供美元，让它们用这钱在伦敦和巴黎购买纸币，以此来稳定汇率。当我们不得不购买法郎和英镑来满足我们在巴黎和伦敦市场上的开支时，我们是以人工价格购买这些货币的。而人工价格是通过我们借出的贷款来维持的。”

——摘自财政部长梅隆先生在1927年3月15日给一些特定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的书信。

我们还要提到的是，盟国们用借来的美元在美国购买的物资和服务是被限制价格的。它们支付这些物资和服务的价格和美国政府支付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美国政府用现金在盟国购买的物资和服务是非限制价也可以说是公民价。

当有人说我们向盟国提供物资和军火时收取费用，而当我们派去的参战人员在消费自己的物资和军火时我们分文不收，以至于如今我

我们在谈论收回欠我们的物资军火债务时，我们好像对物资设定价值而忽视了我们自己都愿意贡献的生命的价值，这么说看似有理，却是十分不合情理的。

当我们开始派兵进入盟国时，我们并没有收取出兵费。相反，我们还要支付费用。

我们支付了运送美国士兵越过海洋的英国船只的运费；我们用美元购买了英镑，用现金支付了英国的服务。我们在法国港口要为停泊那些载有自己军火物资的船只支付港费；我们用美元购买了法郎，用现金支付法国入境费。我们在法国国内运送士兵要付费，美国军火和物资通过法国铁路运输到前线也要付费。我们用美元购买法郎，用现金支付把我们的士兵和装备运送到战场的费用。盟国在美国买的所有东西都是赊账的，而我们在盟国买的所有东西都是支付现金的。在所有关于战债的争论中，盟国政府从未向我们详细地提及这些事实，也从未向它们的民众提及。

巴尔福勋爵那超越金钱或利益的共同事业到哪去了？在盟国身上能找到这些吗？在和平会议中利益的争夺异常激烈。英国人认为法国人在和谈中获益了。

当然，盟国们在关于分配各自的利益上抱着古老的信念。它们通过内部的交易和物物相换，分割了德国在亚洲和非洲超过100万平方英

里  的土地，以及所有法国政府及其国民在世界各地的财产，还有太平洋上富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这些岛屿原本自然而然地属于美国的海洋前线。而这些我们都没有碰。但是当我们拒绝《凡尔赛和约》，与德国签订独立的和约，接下来向外界公布要让德国赔偿特定

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比如在卢西塔尼亚事件中所遭受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时，盟国们反对我们从德国获取任何东西，因为它们对德国的赔款要求已经超过了德国的偿还能力，而它们的索赔要优先于我们的。

关于还款，美国游客年均在欧洲花费的美元就足够偿还欧洲欠美国财政部每年的债务。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

美国财政部于1920年，也就是停战两年后，停止了为外国政府提供贷款。最后一笔贷款是给法国的10 000 000美元。但是外国借贷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外国政府转向华尔街，开始从美国的私人贷款资源那里借债。它们在华尔街的借贷非常自由。通过发行债券，它们在华尔街借钱，接下来用于任何一个可想的目的——公共工程、重建、避免增加国内税收、推迟平衡预算以及支撑它们那通胀后的货币。

在这个时候，残存的理性也消失了。那些因为我们要求它们履行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而斥责美国的国家，却在同时在华尔街借贷越来越多的美国资本。这就是后来欧洲欠下的巨额私人贷款的开始。在几年内，这些债务如此庞大，以至于欧洲现在说：“我们无力同时支付欠美国财政部的私人债务和欠美国投资者的债务。美国希望我们还哪个？”

在美国停止对外国政府出借公共贷款前，财政部长在1920年3月8日给英国财政大臣的信中写道：“自从停战以来，美国政府向外国政府提供的金融援助多达40亿美元。这届政府已经倾其所能为债务国政府提供直接的缓解。而如今它们需要的是私人信贷。盟国相互欠下的以及欠美国的债务尚未对债务国政府造成负担，因为它们现在无须支

付利息，或者据我所知，这不但不是负担，它们还在预算中计入本金或利息的偿还。”

当美国财政部在最后切断对这些政府的贷款时，它宣布对它们的债务实行三年冻结期，并提醒它们要在财长的要求下，按美国政府发售的用于筹款的“自由债券”同等条件，把草率给出的本票转换成长期债券。而这一提醒所得到的唯一回应便是对方开始宣传取消债务。巴尔福照会便是这一宣传最清晰的体现。

巴尔福照会发表后的一年里没有什么新动静，除了英国前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来纽约参加美国银行家会议外。他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论点：除了英国外，战债超出了任何债务国的支付能力。英国能支付，在长期的外国投资积累中，它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假如所有的债务国都像英国一样有能力支付，那么美国也无法获得还款，因为外国政府是用商品的形式来支付这些贷款。巨额的还款转化为外国商品后涌入美国，会摧毁美国的工业。

正如欧洲其他的想法一样，这种想法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虽然支持的面不是很广，但这种想法在人们的精心支持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从这次事件以后，我们一直听到这种古怪的谬论：像我们这样的债权国没有办法收回贷款。这种论点变得很冒昧。这些巨额债务的本金不能用黄金偿还；整个世界的黄金都不够支付，而且黄金也不是用于这个目的的。因此，债务国必须用它们的商品还债。但是由于我们自身也从事制造业，对外国产品设置了贸易壁垒，那么我们怎能让债务国用它们的产品还债呢？假如没有关税壁垒的话，它们倒是可以用商品支付我们，但是那样会使问题颠倒过来，因为接收这些商品会毁灭我们自己的工业。

没有人想过比这个更稀里糊涂的理论了：假如我们不移除关税壁垒，那么我们的债务国不能还款。一方面这涉及自由贸易。但是假如我们取消关税，让它们用商品支付，那么我们未受保护的工业会因此崩溃。这在另一方面又涉及严格的保护措施。假设这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提议，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国际债务都可以如此偿还，而不仅限于战债；假如在理论上真能如此的话，那么这样的国际债务显示的是出借人逻辑上的愚笨。为了拯救理性，我们有必要在“商品”一词前加个形容词。

也许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或者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真的没有办法收回竞争性的商品作为还款。令人一目了然的事实是，国际贸易中只有4/10左右是在竞争性商品领域，另外的6/10是在非竞争性商品范畴。在后者中，也许会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而增加非竞争性商品的流动。英国是一个大型债权国。它在海外的投资比我们早得多，投资规模也比我们大得多。它从未在收回债务人的还款上发现过任何逻辑上的困难。长期以来，它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没有对外国商品设置关税，因为最初以及长期以来，它的工业在世界上都没有受到有力的竞争。它的债务人不会用它在谢菲尔德（Sheffield）生产的那种刀具来支付债务，也不会用它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生产的那种纺织品来支付债务，也不会用煤炭来支付，因为它自身已有过剩的煤炭。但是它却很愿意对方用铁矿石、原棉、原毛、动物皮以及小麦来支付债务。但是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英国工业现在要求对有竞争性的外国产品设置保护壁垒。于是自由贸易的理论被抛弃了；正如美国的关税一样，英国的关税开始上涨，但是你却不会听到英国银行家说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债务国将无法还款，或者英国无法收回债务。

假如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英国用汽车来还款，这也许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假如英国的汽车比我们的便宜，那么这会损害我们的汽车工业。但是我们非常愿意收到英国的锡、橡胶、黄麻等，因为我们本国没有这些资源。此外，对外贸易商有大量的三角交易存在，比如英国向巴西出售汽车，而巴西在美国出售咖啡。巴西可以用在纽约的咖啡信贷来支付英国的汽车，而英国，假如它愿意的话，可以用这笔咖啡信贷支付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麦克纳先生对美国银行家们说的那番话唯一的道理是：债务国假如用债权国不需要的商品支付，那么债权国是不会获益的。事实上，这不是一个惊人的想法。从概念上来讲，这个说法没能推进欧洲的取消债务事业。

于是英国在1923年向华盛顿派遣了一个代表团，来解决英国的债务问题。最终英国以80美分支付原先1美元的方式进行偿还。这是主要还款中的第一笔，也是金额最高的一笔。

这个还款协议是英国代表团与世界大战外国债务委员会达成的。这个委员会是国会为与债务国根据其还款能力而不是根据合同达成还款协议而成立的一个机构。在1926年1月4日，兼任债务委员会主席的财政部长就总的债务清偿以及英、美债务协议，对国会筹款委员会作以下表述：

“由于外国债务的清偿方式不能让人清楚地理解，我希望提及一些基本的事实。财政部持有的债务（即原先外国政府给的期票）原来是一经要求就须归还的，而现在债务国没有办法还款。我们必须制定现实可行的还款条件。现在，假设我们持有的债务是62美元，而且今天就能得到还款，那么我们能收回贷款的全额。假如我们以每年1美元的速度分62年无息收回贷款，那么我们会损失一部分债务。到底损失多少则要根据主观制定的贴现率。假如我们把贴现率设为4.25%，那么

62年每年1美元的现值总额略大于21美元。假如我们把贴现率设为3%，那么现值是28%。然而，假如我们在62年中每年收回1美元和相应利息，那么我们就能全额收回贷款，因为我们可以今天借入62美元，用每年收回的本金和利息来抵消我们所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从美国的立场上看，某个偿还协议是否是债务的减免取决于整个还款期内我们所收的利息是否小于这笔贷款在同期内对我们造成的年平均成本。债务清偿的灵活性体现于贷方所收取的利率……”

“英国是第一个认识到需要进行内部整顿的国家。它欠我们约4 600 000 000美元的随时可要求偿还的本息。美国债务委员会提议的清偿方式是：62年内付清本息，前10年每年的利率为3.5%，此后每年的利率是2%。国会批准了这个清偿协议。考虑到协议签订时的现行利率，与英国的这个清偿协议并没有偿还全部贷款。假如我们用4.25%的贴现率计算这个清偿的现值，那么我们等于免除了20%的债务。然而，这个清偿协议完全是依据我们对英国偿还能力的估计值而设定的。这为以后以还款能力作为清偿标准提供了先例，而随后那些偿还能力比英国低很多的国家并不是按照这个标准偿付的。”

芬兰（Finland）是第一个清偿债务的国家，但它只是战后才进行借贷的国家。在我们的主要债务国中，英国是第一个清偿的。它急着重建英镑的黄金标准。为了这个目的，它在美国财政部达成清偿条款后，向华尔街借了3亿黄金。

“和平时代最大的一笔用于帮助外国的银行信贷在纽约被签署。

“这笔信贷的金额是3亿美元，是一年前为法兰西银行提供信贷的3倍。这笔给英国的信贷中，2亿美元来自联邦储备银行，另外1亿由私人银行公司摩根大通公司提供。信贷中的这两笔钱的受益者都是英格

兰银行，以及经由英格兰获得贷款的英国政府。这笔信贷的目的是帮助英国重返黄金基准……对英国政府的任何维持英镑面值的努力表示同情。美国人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英镑将会获得财政部的批准。”

——《纽约时报》1925年4月29日。

此前一天，英国财政大臣就预算对下议院的演讲中说道：

“最终，虽然我们相信我们足够用自己的新资源来完成这个重要的变革，但是为了加倍确信我们能成功，我已安排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从美国借取3亿美元以上的信贷，假如有需要，还会借更大的数额……这些从大西洋彼岸借取的大额信贷是为了郑重警告全世界的各类投机者，假如他们试图破坏英国现在建立的黄金对等标准，那么他们将遇到巨大的抵抗，也会承受这笔准备金的压力。”（欢呼声）。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另外三个主要债务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继续忽视华盛顿世界战争外国债务委员会的存在，继续忽视美国财政部的金库里藏有的期票，同样继续在华尔街从美国的私人信贷资源那里大肆借贷。

于是——

“根据其管理政策，在债务国和我们协商好一个解决债务的协议前，财政部决定拒绝任何债务国在我们的金融市场借钱。”

——摘自财政部1926年报告第214页中一封财长写给总统的信函。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宣布，任何拒绝承认欠美国财政部债务的国家无权从美国私人信贷源借款，包括所指国家的政府和公民。在此之

后，假如这些政府和公民再来华尔街寻求新贷款，那么华尔街就必须对他们说：“不好意思，你要先去美国财政部一趟。”

于是，他们纷纷前往华盛顿。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债务委员会十分忙碌。当他们偿还了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后，原先的禁令被取消了，他们又开始在华尔街借贷。意大利在华盛顿与财政部约定以每美元26美分的价格偿还债务之后，又辗转来到了华尔街，从那以市场价借走1亿美元。最后一个来偿还的债务国是法国，时间是1926年。而最后一个未偿还的债务国是南斯拉夫（Yugoslavia）。

没有一个债务国全额偿还债务。每个债务国把一份关于其自身状况和资源的声明递交给债务委员会，而债务委员会根据这份声明，得出了这个国家能支付的估计值。为了假定美国债务国都能说它已经全部偿还本金，62年逐年偿还的款项（第一年偿还额很小）被武断地分为本金和利息（利息非常低或者只是象征性的），以便在本金偿还的那一栏能显示收到全额。但是在每一次偿还协议中，美国财政部通过“自由债券”进行筹款所花费的本钱比这些协议中收取的利息要高。这些本金偿还协议的大致结果是，除英国外，我们只能对战后借出的贷款收回本息。

“让我们看看债务清偿协议所带来的重负与我们战后借出的贷款之间的联系……比如说英国，它战后欠美国债务的本息总额是6.6亿美元，而整个债务清偿的现值是32.97亿美元。我们必须记住英国欠美国的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用于纯粹的商业，而不是战争目的。

“法国战后欠下的债务本息是16.55亿美元。贝伦格大使与美国债务拨款委员会（American Debt Funding Commission）商定的偿还协议的现值是16.81亿美元。

“比利时战后欠下的债务本息是2.58亿美元，而偿还协议的现值是1.92亿美元。

“它与意大利的情况类似。意大利的战后债务本息是8亿美元，偿还协议的现值是4.26亿美元。塞尔维亚也是如此。”

——摘自财政部长1926年年度报告，第261页。

加上利息，我们与债务国约定的年偿还金的现值或者现金价值是非常划算的。这就如同利息表一样无可争议。财政部长上述所提到的现值仅仅是指这些清偿协议在一种不可能的情况下所拥有的价值。这种不可能的情况是，美国财政部能找到一个人用现金全部买下这些外国政府债务，一个拥有这笔巨额资金的想象中的投资者，他要相信他每年都能准时收到还款直至还清，还要同意支付62年每年4.5%的利息。只有这样计算，英国才算在清偿的时候1美元还了80美分，法国1美元还了50美分，意大利1美元还了26美分。

这些清偿协议饱受指责。有些人批评这些协议太宽厚；有些人批评这些协议太苛刻；而另外一些人批评这些协议不公平。支持免除债务的那些人批评得最激烈。他们说这些协议太苛刻了。

“人们认为（债务）委员会没有把慷慨之情融入谈判中去。这一点毋庸置疑：与意大利签订的协议是非常宽厚的，法国的协议也不算苛刻，因为法国仅需偿还的战后债务本息，利息为5%。法国报纸承认综合考虑所有因素，英、法协议比美、法协议带来的负担更繁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没有对协议的慷慨与否进行评估，但是人们认为美国是苛刻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之所以抱怨，是因为美国不是用同一标准对待所有的债务国。他们是指英国的协议是偿还现值的80%，而意大利的却是现值的26%。难道他们提议为了公平，把意大利的还款额提高到与英国一致吗？显然，意大利无法承受这个负担。难道他们提议英国的还款被降低到50%，把意大利的提高到50%吗？这样英国很容易还款，可是意大利还是无力偿还。难道他们提议把英国的还款降至与意大利一致的26%，然后让英国毫无还款压力吗？假如他们建议的是最后一个，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意大利不能说它的26%应该被降低至零？因为我们没有对另一个国家收回任何债务，比如说亚美尼亚（Armenia）。 ”

——摘自世界战争外国债务委员会委员、参议员斯穆特（Smoot）在1926年12月20日写给哥伦比亚一些大学教授的信函。

而到头来，这些偿还协议并没有解决什么。与以前一样，欧洲还是斥责美国想要收回战争债务，这种指责从未停止过一天。唯一的改变是，这些指责变得很激烈。在清偿协议前，欧洲人说假如一定要欧洲偿还，那么欧洲会被摧毁。而在协议后，各国开始还款时，他们说欧洲正在走向毁灭。

正是由于美国信贷的援助，英国才能在1925年重建了英镑的黄金基准。“英镑汇率回归平价后，”身为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斯穆特说道，“英国在支付国际贸易逆差时节省下来的钱比每年还给美国债务的还多。”

尽管如此，数月前在预算演讲中戏剧性地提及“这些大西洋两岸间的巨额信贷”的用途和价值的英国财政大臣再次在下议院发言，无缘无故说了以下这番话：

“当法国和意大利在偿还欠我国和美国的债务时，当其他小国在偿还债务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将直接或间接地从赔款中收取债务，获得意大利的赔款抵偿款，获得英国以及经由英国之手的法国贷款和意大利贷款的赔款，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款项，至少占德国赔款总额的60%。然后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情：在所有的这些链条网络下，债务偿还的压力会迫使被战争摧残的欧洲国家流出财富，这些赔款会源源不断地穿越大西洋，流向那个富裕繁荣的伟大共和国。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美国人或者欧洲人都明白这些事实。”

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被战争摧残的欧洲流向美国——这幅画面完全是虚假的。

这位财政大臣在演讲时，他应该知道真正的情况是，美国财政部每收回1美元的战债，华尔街就会向欧洲借出3美元。资本是大量地从美国流向大西洋彼岸。每个人都知道的真实情况是，德国是用美国的贷款来偿还赔款的。完全是因为德国从美国私人信贷源借的贷款才让它能向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支付赔款。我们仅仅借给德国的贷款总额就达到了财政部从上述这些国家收回的战债的两倍以上。然而英国财政大臣的演讲也许会向世界传达了充满憎恨的信息：美国从被战争摧残的欧洲国家收取赔款。

正是这些如硫酸般的扭曲事实的话语才让欧洲如此憎恨我们。而由于欧洲的憎恨，如此多的美国人说：“不管错与对，我们不能再索要战债了，这会招来太多的恶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花钱买回欧洲的善意。而假如我们这么做了，最终战债只是一个借口，这对我们来说该是个多大的玩笑啊。

“最终，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们一道敦促美国人民重新考虑与盟国间的债务偿还协议，‘因为我们的欧洲盟国们越来越用憎恨的眼光来看待美国’。我怀疑欧洲国家到底有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么恨我们。但是我知道假如他们确实恨我们，那么就算免除他们那部分尚未被取消的债务也不能让他们变得喜欢我们。无论是国际关系中还是个人生活中，喜欢并不是一件买得到的商品。我从阅读历史中观察到，一个国家几乎不可能牺牲自己的正当利益而获取或者维持其他国家的尊重。”

——摘自财政部长梅隆先生在1927年3月15日写给普林斯顿大学一些教授们的信函。

最终，旧世界式的政治误解，美国人担心欧洲憎恨，美国那些借过私人贷款给欧洲的人士私下希望以损失美国纳税人利益为代价取消战债，他们表达了倾向于欧洲的言论，所有的这些原因让这个话题变得如此不理性，以至于几乎所有受欢迎的假设都与事实不符，所有的事实变得难以置信。显然，许多美国人假设战债偿还的负担对债务国来说太繁重。但是我们该如何衡量这些负担呢？

“按照协议，英国年均偿还额是其国际贸易总量的1.9%，比利时的是占本国的0.88%，意大利的占2.87%，法国的占2.64%。英国年均偿还额是其国民收入的0.94%，比利时的占本国国民收入的0.8%，意大利的占0.97%，法国的占1.47%。”这是财政部长于1926年3月20日向国会筹款委员会陈述的报表。

这是1926年的比例。在1926年后，所有的比例都下降了，因为欧洲的对外贸易以及主要欧洲国家的国民收入都增加了。现在在世界经

济萧条中，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反常的，因为大萧条本身是反常的。

在与欧洲各国签订还款协议的前五年，美国财政部平均每年收到的总额是213 523 120美元。在1931年，要不是大冻结，它大约能收到2.5亿美元。这些还款对欧洲来说绝对不会造成毁灭性影响。其中，英国还了1.65亿美元；法国低于4 000万美元；意大利低于1 500万美元；比利时低于750万美元；波兰低于650万美元；其他债务国的则更少。英国还的最多，因为它的实力最强。然而对英国来说，这笔还款还不到其海外投资收益的1/10，大抵是每个英国人支付美国财政部3.5美元的战债。而英国1928年的海外投资收益是人均29美元。（《国际贸易与收支平衡备忘录》，国际联盟，1927—1929，第二册。）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衡量的方式。

英国与美国财政部在1923年商定的偿还协议的现值略大于32.5美元。自那时起，伦敦金融市场为外国发行的新债券达到了45亿美元〔根据伦敦米兰银行（Midland Bank）的数据〕。而自从开始偿付战债后，英国加大海外投资，增加额比与美国财政部的清偿协议的现值还要大。

法国与美国财政部在1926年商定的偿还协议的现值是16.55亿美元（根据财政部1926年年度报告，第261页）。自那时起，法兰西银行拥有的黄金量增加了20亿美元。也就是说，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增加量，仅此一项就比法、美偿还协议的现值多3.45亿美元。1931年，法兰西银行在纽约的黄金余额等同于它欠美国财政部本金现值的1.5倍。

美国让债务国根据自身能力，而不是根据合同偿还债务的后果之一就是，每个债务国都声称自己很贫困。人性本是如此，因为它们是在交易。它们的贫困声明越令人信服，那么它们就越能从美国债务委员会那获得一个有利的交易。这是可以理解的。债务委员会尽可能深入地审查这些声明。但是毕竟你是从那个国家自己的数据来了解其经济状况的。

而且，这些贫困声明被美国和欧洲媒体的宣传以及各种国际场合的演讲所夸大。这种夸大几乎无法避免。此外，当时每个人都倾向于低估世界的恢复能力。推动复苏的是一种新力量，只有战争中那惊人的毁灭力量可以与之相比。同样巨大的力量如今已投入世界的重建中去。

欧洲目前的贫困要么是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要么是虚构的，正如偿还美国财政部的债务会带来毁灭性后果，抑或是由于与美国对比产生忌妒的想法一样，这些都是虚构的。在其自身的世界里，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生活水平比战前高出如此之多，以至于重返战前水平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法国的黄金储备更多了，英国的投资也大幅增加。整个欧洲拥有更强大的物质力量和设备，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某些方面，1925年标志着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欧洲的生产很可能在这一年达到了战前水平。世界贸易总量首次超过1913年……此前发生的调整为1925—1929年这五年期间的惊人经济发展做好了铺垫，下表阐明了这一点。

国家工业指数 (基准：1925年为100)				
国家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法国	116	102	119	130
德国	95	120	102	122
波兰	98	123	138	138
英国	77	111	105	113
美国	104	102	107	114

1925年后经济活动的主要促进因素来自工业技术、农业和制造业管理方面的伟大进步。同样重要的是，汽车和电力的广泛使用推动了交通及通信的进步。最后一点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逐渐稳定它们的货币，商业基础上的国际信贷大规模出现。

“当然，这种进步远远不是普遍的或统一的。欧洲比其他大陆发展得更快。在1925—1929年，欧洲的粗制品总量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而其他大陆总的年均增长不到2.25%。甚至这些数据都低估了欧洲的发展。因为在1925年，欧洲有非常好的收成。于是在1929年，欧洲重获了前几年所失去的，并且基本上恢复了在战前欧洲与世界的平衡。”

——摘自《世界经济萧条的过程和阶段》，国际联盟，1931年。

最后一点，在美国于去年宣布冻结战争债务前，欧洲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负担从未真正影响过它们。原因是这些国家从美国私人信贷源借的新贷款大大超过了它们对美国的还款。它们在偿还美国财政部的债务的同时，又以更快的速度从华尔街借钱。在正常的情况下，这

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因为美国对欧洲的贷款每年都会比欧洲偿还美国的战债更多，因此，债务偿还的重负从来没有影响过它们。

债务并不是它们的重负。真正的僵局出现在精神层面。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旧世界的外交方式、操纵他国的激情、错综复杂的政策以及其阴谋的破坏力。所有的政治协议都是复杂的，所有的交易也是如此。旧世界没有简简单单的事实。

我们以为战债只涉及美国财政部和各个债务国。我们坚称这与政治无关。然而，这些债务被卷入了欧洲的政治交易。例如，我们主要的债务国和德国在争论如何分配美国财政部进一步免除的欧洲债务。这种政治交易体现在杨计划“特殊冻结”的第2条，其英语文本是“专家委员会关于赔款的报告”。这是由皇家出版社于1919年6月在伦敦印制的。内容如下：

“2. 对于债权国作出的任何关于战债的免除，在对物质和金融条件的考虑后：

关于前37年——

(a) 德国应该享有2/3的债务减免，在它此后每年的还款中扣除。

(b) 1/3的债务减免应该由德国的债权国保留享有。”

也就是说，假如美国政府降低或取消欧洲剩余的战争债务，减免额的2/3由德国享有，德国可以在赔款时少付这笔钱，而1/3由德国的债权国所有。或者是，我们每免除我们的债务国1美元，它们就免除德

国 美分。这种有趣的分配如何达成的或者其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交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假如接受你无法偿还的贷款，那么这就是欺诈。

——普布里乌斯·西鲁斯（Publilius Syrus）。

著名的巴尔福照会对美国来说非常不公平。它是欧洲外交上的一把强大的“双刃剑”。毫无疑问在外交上，它比任何仇视美国的观点都要重要。当英国财政大臣就战债发表演讲，说美国正从被战争摧残的欧洲抽取赔款时，我们理解的是其直接的意思，而法国解读的是其间接的政治意味。英国更倾向于支持德国吗？假如法国这么认为，那么它也许会改变对德国的语气。英国对法国有一套政策，对德国有一套政策。而法国对英国和德国也各有一套政策，德国也有对英、法的各一套政策，等等。所有这些与欧洲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或多或少地缠结在一起。

然而，最重要的是，整个欧洲对债务抱有同一种态度。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其中原因很也许不是仅仅憎恨债务，也不是像宣传者一直在说的，他们一直坚信这些债务是不道义的，而是他们对美国突然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所滋生的自然仇恨。不管怎样，这都注定会发生。然而，这却在战争期间就已发生，这就是欧洲人心中的联盟。这件事比战争本身还要重大。对欧洲来说，这场战争没有什么新鲜点，除了规模大以外。战时的敌人曾是战前的盟友，而战时的盟友曾是战前的敌人。只有战争带来的伤疤是新的。但是在欧洲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欧洲大国出于自身原因，介入欧洲事务，对欧洲争吵的问题作出裁决，它的原因不是征服，不是夺取物质，只是因为它不能再忍受欧洲的争吵，想要为世界民主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想要

为中立国获得安全的海域，徒劳地想要把和平强加给欧洲。它的每一个目标都失败了。它输在了和谈的谈判桌上。旧世界的外交手段打败了它。然而它的力量却被暴露了。许多世纪以来，欧洲都保有世界权力，从未受过挑战。而在一场关于哪个欧洲国家该掌握世界权力时，权力自身却溜走了。它跑到了另一片大陆，一片无法征服的大陆。由此政治中心转移了。假如说战争以来，欧洲通过外交手段，通过所有外交智慧和经验，在寻找和利用这个新兴大国的软肋和弱点，以此获利，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到的让其得利的便是债务。这些债务仅仅是提醒欧洲，它已经失去特权的信号。

不管怎么样，尽管所有主要的债务国勉强地签订了偿还协议，但是它们从一开始就对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抱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既不是关于如何偿还债务的，也不是关于如何拒还债务的。旧世界的外交面临一个问题。拒绝偿还债务很简单，我们也无法对债务国作出任何处理，它们很安全。但是不幸的是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原因有二：其一，它们发现，假如拒绝偿还战债它们就没有办法从美国私人信贷源借取贷款，它们就不能继续在华尔街借贷。其二，拒还债务会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先例，这是十分危险的。英、法两国在海外有着巨额投资。英国的海外投资很可能有200亿美元。因此由于担心给债务人树立一个反面的榜样，它们没有办法拒还债务。只有德国能这么做。

因此欧洲的债务政策升级了，但却从未改变过。这不仅仅是英国的政策，不仅仅是法国的政策，也不仅仅是英、法两国的政策，这是一个欧洲政策。其目的就是通过政治上的一招抹掉这些战债。免债的宣传并不是这政治上的一招。这只是个准备阶段。真正的招数是让美国政府签订一份协议，规定债务国在能力之内偿还债务，前提是德国

向它们支付赔款。假如德国停止支付赔款——毫无疑问德国绝对会，那么它们也就不再偿还我们的债务。

美国政府一贯坚持，战债和德国赔款是无关的。然而，欧洲坚持这一主旋律，依靠时间、事态的变化以及它的外交技巧来建立两者的联系。